

漢城 · 台北 · 民主路

——對於即將解嚴的一點看法

本刊

六月的東亞，漢城和台北兩地的人們爭自由、求民主的熱情，一如六月的氣溫一樣熱烈昂揚。

漢城

從6月10日反對派在全國舉行聲討大會，到26日的全國和平大遊行，爲了鎮壓2145次大小規模的示威，警方在17天之內，共發射價值約70億韓圓（約合新台幣3億餘元）、35萬1,200多發的催淚彈，根據警方統計，一共有83萬民衆走上街頭，參加遊行示威，有1萬7244名學生與市民在衝突中被捕，警察在鎮壓過程中共有6305人受傷，學生與民衆則有146人受傷。在財物的損失方面，有164輛汽車被燒燬，262個警察或派出所，35個公共機關或民主正義黨黨部被破壞，估計全部損失在韓幣19億圓以上（新台幣4000萬以上），雙方衝突之激烈，可謂熱火朝天，勢成燎原。

自從朴鍾哲被判刑至死的真相揭發之後，暴露了全斗煥政權殘暴的一面，而一向對學生運動懷疑懼的南韓中產階級，乃轉而同情學生，因此，這場歷時半月的暴烈的反政府示威，已非以往單由深具抗爭傳統的學生所支持、推動、甚至連家庭主婦、工商企業人士、宗教界以及廣泛的中產階級都對這次的反政府示威紛紛表示支持，顯示了民意所向以及大勢之所趨，已到了無法壓抑或扭轉的地步，而執政黨當局也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窘之境。

情勢發展至此，乃有美國總統雷根的親函全斗煥，以及助理國務卿席古爾的啣命訪韓，傳達了美國方面希望南韓執政當局向人民的民主要求讓步，採取具體的改革及妥協措施，於

是而有29日盧泰愚的發表「民主化宣言」，其內容包括：

1. 加速進行經執政黨與反對黨協議後的修憲工作；以促成1988年2月全斗煥下台前的大統領直接民選的實現。

2. 修行選舉法，俾確保大統領選舉的公正與公平。

3. 特赦反對黨領袖金大中，恢復其所有的政治權利；除了被控叛國與刑事罪名者外，全體政治犯應一律釋放。

4. 保證尊重人權。

5. 放寬新聞自由，包括允許報社在各大省城設立分社，並撤銷引起爭議的「言論基本法」。

6. 實施地方自治，允許社會各階層享有自由與自治權利，解除中央政府的嚴格控制。

7. 確保各政黨享有合法的自由權，建立以和平的政治途徑解決歧見的政治風氣。

8. 展開掃蕩犯罪與貪污的全國革新運動。

經過30日青瓦台的全、盧會談，這一突破性的政治宣告也得到了全斗煥的初步首肯。包括金大中、金泳三在內的反對勢力方面，也一致表示歡迎。南韓政局從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台北

40年來，戒嚴一直是台灣人民政治生活上的夢魘，但自今年以來，因爲內外條件的變化，終於有了解嚴之議，雖然這解嚴是以制定「國家安全法」爲交換條件，但無論如何，總標示了一個新里程的開始。

但就在戒嚴令即將解除的前夕，却爆發了多場街頭衝突，使今年的六月成爲近來最熱鬧

的月份，先是10.11.12連續三天，在立法院前發生的反對制定國安法的群眾和警察的對待，其中穿插「反共愛國陣線」的騷鬧，引發連串衝突，最後終以警察使用警械追打，驅散手無寸鐵的民衆而收場。

接著，在6月20日當天，在台北發生大批鎮暴警察攔阻民進黨籍國代連袂前往總統府拜會蔣總統的衝突。民進黨國大黨團11位國代為向總統表達無條件解嚴、廢除臨時條款、回歸憲法的政治要求，攜帶員林蜜餞、埔里甘蔗、屏東椰子、台中太陽餅、雙冬檳榔、新竹米粉以及〈中華民國憲法〉、〈民進黨黨綱〉等或為糖尿病所不宜、或為年老無齒所不便，或為立場不同所不喜之物，步行前往總統府，要求進謁總統，致送禮品表達心願，却在半路上遭到了警察與蛇籠鐵絲網的阻攔。民進黨國代試圖突圍，却被包圍，雙方推擠拉扯糾纏了一個上午。

也同樣是6月20日當天的下午，前省議員、美麗島受刑人張俊宏欲經台中回南投家鄉，却在台中火車站遭受數千名鎮暴警察的圍堵，以致歡迎的群眾與圍堵的警察發生小規模的衝突。

最後，是6月23日，台北地方法院傳訊民進黨黨員謝長廷、洪奇昌及江蓋世等三人，警方如臨大敵，除了法院大樓四週防哨密佈，大樓之內也隨處可見警察站崗，甚至鎮暴部隊也開進地檢處大廳中，而謝長廷等三名當事人却一直被困在外，無法出庭。

另一方面，6月23日在立法院，國民黨籍立委不顧民進黨籍立委以靜坐抗議所作的既強烈又無奈的杯葛，強行三讀通過引起以上種種風波的「國安法」，並緊鑼密鼓地加速擬訂「民間團體組織法」「集會遊行法」以及修改刑法總則，以期於解嚴之後規範政黨、管制遊行。凡此種種，固然引起民進黨對國民黨解除戒嚴之誠意，抱持強烈不信，甚至也引起一般民衆對政府所宣稱之民主開放的決心持疑觀望。

民主路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比較出台灣與南韓在民主路途上的差距，但我們在看到南韓政府大步退讓的同時，也應看到南韓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奮力爭取，不怕警棍盾牌，不怕催淚瓦斯、不怕逮捕監禁、不怕刑求流血，只要義之所在，無不全力以赴，因此才能每次示威遊行動輒幾萬、幾十萬人，反觀台灣，不免令人有小巫之嘆！

台灣自二二八事件以來，民風畏縮，不必以死懼之，監獄即足以懼之。因為沒有人民挺身抗爭，所以政府也就基於慣性而不作退讓調整，任令人民的委屈與憤懣在黑暗中滋長。這固然損及人民權利，可却也非政府之福。

但近年以來，這種形勢已經有了初步的改變，經過一段從議會到街頭的不斷爭抗之後，終於啓發了執政黨「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我們也要變」的觀念。這種從單方面的民心思變到政府也思變的過程，是政府與人民之間互相調整適應的過程。雖然，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只是民主路上的「民權初步」，我們很欣喜地看到，雙方在沒有重大損失的情況下，就已經取得了這「初步」的成就。

至於某些人對於政府解嚴、開放的民主誠意，抱持相對的審慎，甚至憂疑悲觀的態度，我們認為這是一種不必要的心理負擔。我們知道，形勢是人創造出來，又回過頭來規範人的活動，而法律只不過是政治的結果，所謂「形勢比人強」，所謂「政治高於法律」，因此在人民民主的道路上，比的是形勢，講的是政治，大勢所趨，繁瑣偏苛的法條等如無物。試看秦法漢律，於今安在哉？

在目前台灣政局興革開闢的變局當口，我們寄望執政黨當局能有真正的民主——以民為主——的心態，而人民，也應對本身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充滿信心，在民主的路上毫無疑懼地繼續前進。

前方雜誌

第6期

吳鳳神話的系譜

抗日五十週年專輯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底流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經濟基礎
石塚友子訪問記

形左實右的民間學者

日據時代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風潮
從安那其到普羅的周合源

民國76年7月號

前方雜誌 第6期

Correction
Page 0

〈社論〉	漢城·台北·民主路 ——對於即將解嚴的一點看法	/ 本刊	1
〈觀念探索〉	形左實右的民間學者 ——「民間社會」理論的大體解剖	/ 汪立峽	4
〈特別企劃〉	抗日五十週年專輯	策劃 / 王墨林	16
之一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底流 ——從靖國神社的結構談「靖國」精神	/ 程達學	16
之二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經濟基礎	/ 林直道	22
之三	戰爭真的結束了嗎？ ——戰後日本的反省	/ 王墨林	32
之四	石塚友子訪問記 ——管理社會中的性別歧視	/ 林默	36
之五	台灣土產 ——一個日本遊客的台灣見思錄	/ 大槻耕太郎	40
之六	我的反日鬪爭證言	/ 林歲德	44
之七	我的天皇觀	/ 片岡利明	48
〈時事分析〉	動蕩不安的南韓政局	/ 張大林	52
〈名詞淺釋〉	無政府主義	/ 許思元	55

發行人 / 蔡裕榮 法律顧問 / 王義雄
總編輯 / 林華洲
編輯 / 李興民 · 陳崇北
編輯部 / 台北市臥龍街195巷38號5樓
電話 / (02) 7328478
郵政信箱 / 台北郵政29-247號

發行所 / 台北市景美區景隆街56號
郵撥帳號 / 1025072-0林華洲
長期訂戶 / 全年800元 · 半年450元
零售價格 / 每冊80元
出版登記 / 局版台誌第5604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20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歷史與人物〉 **從安那其到普羅** / 張文 58
——周合源先生訪問記

〈原住民〉 **奧風神話的系譜** / 官鴻志 62
——一個「民族英雄」的塑造過程

〈國際瞭望〉 **南方世界的現實(四)** / 辛一鳴 72
——人口問題的南北差異

〈海峽瞭望〉 **對岸生活素描** / 曾聞啓 78
/ 異科植物間的雜種培育成功
/ 空中纜車鳥瞰萬里長城
/ 東北發現丹頂鶴的故鄉
/ 五百年前明代名畫出土
/ 日本「麴連會」借人民大會堂開大會

〈學海探微〉 **身份與立場(三)** / 戴國輝 80
——環繞台灣史研究的諸問題

〈歷史與人物〉 **日據時代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風潮(一)** / 林涯 88
——范本梁與新台灣安社

讀者來函 / 老五 93

編後語 94

前方

與您共同進入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
與您共同擁有正確的價值觀與圓滿的世界觀。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

臺灣大學圖書館

通 信 欄

茲訂閱(前方)雜誌_____份
訂閱期數：_____期
由_____年_____月號起
訂戶姓名：_____
職業：_____ 電話：() _____
地址：_____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如果您支持進步的、有理想的《前方》，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前方》雜誌，齊來實踐我們的理想與願望。

訂閱前方一年，贈春風詩叢一套四本
 訂閱前方半年，贈春風詩叢一本(任選)
 ●訂閱全年12期800元，半年6期450元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第1025072-0號	
戶名	林華洲	
收款人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寄 款 人	郵局郵票
住址		
電話		

手續費	次	元
-----	---	---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	第1025072-0號	
戶名	林華洲	
收款人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寄 款 人	郵局郵票
住址		
電話		

手續費	次	元
-----	---	---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祇付交匯票之存款，請於交匯前一日、二天存入，必要時，可存款局或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本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海峽

雜誌

第二期

還我教育人權

「教育人權座談會」記要

——王義雄、張忠棟、張曉春、林玉體、王曉波
王津平、林繼文、林志修

「台大教授聯誼會」為何難產？

訪「台大教聯會」籌備發起人黃武雄教授
被壓迫者的覺醒與怒吼

——專訪石文傑談「教師人權促進會」的使命

還我教師人權——六·一二辭職抗議活動演講稿

教師人權促進會成立宗旨及工作目標(草案)

還我學生權！

國民黨如何控制校園？

王 拓：審慎記取歷史教訓

——我對「六·一二」的看法與呼籲

陳若曦：東北遊記

王度譯：新馬克思主義大師盧卡契訪問記

章 名：楊尚昆訪美揭開對台新攻勢

高 準：七十年代大陸新詩選析

編輯部 / 台北市和平東路 2 段 111 號 10 樓之 1

電 話 / (02)7012930 (02)7052635

發行所：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 190 巷 5 弄 7 號 4 樓 111

郵撥帳號 / 1134151-2 號盧思岳

零售 / 新台幣 90 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新台幣 900 元，半年 450 元

六十年前，台灣人民就組黨了

邀請您參加兩項活動

六十年前的七月十日，台灣人民成立了第一個合法政黨——台灣民眾黨。

六十年前，在異族統治下，台灣人民曾經在民眾黨的領導下，風起雲湧，組織群眾，喚起群眾的民族意識與民主意識。

四十年來，我們深深感到：「民主尚未成功，同胞仍需努力！」
四十年來，民眾黨創黨領袖蔣渭水先烈的叮嚀：「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一直提醒著我們。

在紀念民眾黨創黨六十周年的今天，有感於此，我們將進行下列二項意義重大的活動，盼望您踴躍參加，也找您的同志、朋友一起參加：

一、向蔣渭水先烈上香致敬

時間：七月九日上午九時

集合地點：台北市六張犁崇德街一三二號福德宮（與富陽街交叉口）

二、台灣民眾黨創黨六十周年紀念大會

時間：七月十日晚七時

地點：金華國中大禮堂

（台北市新生南路、金華街交叉口）

夏潮聯誼會

會長 王拓

副會長 黃溪南

敬邀

聯絡電話 .. (02)7012930.7052635

觀念探索

形左實右的

——「民間社會」

放著錯誤不加拒斥，是在鼓勵知識的敗德

——馬克思 (Karl Marx)

階級國家觀點與被調整了的社會觀點的混淆，是中等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固有的，因為他們歡迎任何樣式的調整，由於它能防止尖銳的衝突和崩潰。這樣看來，這種觀點具有典型的反動性和退步性。

——格蘭姆西 (Antonio Gramsci)

前言

如果你不反對以朱高正的方式對付國民黨，也不反對以吳祥輝的方式對付李敖，那麼，你更不會反對我以本文的方式對付所謂「民間學者」和「民間哲學」，因為，比起朱、吳二人來，我的方式還是太「改良主義」了一點。我這樣做，不僅是爲了就事論事，辯明

問題的本質，也是希望搞「民間哲學」的人知所反省，負起社會和歷史的責任。因此，這篇東西不是學術論文，而是戰鬥文章。

格蘭姆西與「民間社會」

最近在台灣高唱「民間哲

學」和「民間社會理論」的人，經常在嘴邊和筆下聲稱他們的主張是根源於格蘭姆西。他們的意思大概是說，格蘭姆西曾提出了國家和政權結構的兩重性——強制機器和領導權機器——的概念。就是說，照格蘭姆西看來，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擁有全部鎮壓工具如軍隊，警察，行政機構，法院，官僚系統等，而且也擁有「市民社會」所提供的領導權機器（如工會、學校、報社、教堂）。這兩者結合才構成了完全的、廣義的「國家」。格蘭姆西說：「我所謂市民社會是指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像社會、工會或學校這樣一些所謂的私人組織而行使的全國範圍的領導權」。

我們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正是在格蘭姆西自己對「市民社會」這個概念的界定，決

民間學者

理論的大體解剖

汪立城

定了它和後來的西方右派和自由派「民間社會」理論的根本區別。而目前台灣的某些知識份子和所謂「民間學者」所擁抱的恰恰是這個相反意涵的「民間社會」理論。（雖然兩者的原文皆是 *civit society*）。

現在，讓我們來解析一下二者的區別：

左右兩派的「民間社會」理論

格蘭姆西固然認為「市民社會」是民間私人組織的「有機體的總體」，但明白指出是一個特定「社會集團」通過這個總體」中的各個「有機體」（即私人組織，如工會、學校等「領導權機器」），而行使的國家（包括市民社會）「領導權」。他在這裡所說的「社會集團」就是指「階級」，

關於這一點，在下面我們再詳細說明。

右派和自由派的「民間社會」理論，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把格蘭姆西所說的「市民社會」理解或曲解為「多核心的社會實踐」，「多樣的社會主體範疇」，也就是說，完全抹煞了格蘭姆西強調特定「社會集團」是社會實踐的「核心」和「社會主體」的概念，從而建構起以空泛的「人民民主鬥爭」取代實際的「階級鬥爭」的理論。

事實很清楚，右派和自由派的「民間社會組織」篡奪了格蘭姆西「市民社會」的概念。

接著，我們再進一步看一看格蘭姆西提出「政治社會」（國家）和「市民社會」及「強制機器」和「領導權機器」這兩組對立概念的歷史原因和

歷史目標，當更有助於我們理解他所說的「市民社會」。

格蘭姆西的「意識型態領導權」概念

格蘭姆西於1926年被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逮捕前，曾給義大利共產黨提交一份關於當時總的情勢報告（格蘭姆西不僅僅是「民間學者」筆下推崇備至的「偉大的社會理論家」和「偉大的政治理論家」，更是提著腦袋幹革命的工人運動家和義共的創始人之一）。他指出，當時義大利雖然出現經濟危機，但在資本和勞動之間還有一個「巨大的中間階層」存在，連同這個階層的政治和意識型態，更加鞏固了上層建築（政治社會）的基礎。他說，在資產階級民主形式下，權力劃分的原則，有助於擔保



格蘭姆西

被統治者的同意，把資本主義社會中權力關係的真正本質掩蓋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觀念後面。於是，衝突的解決，就限於被調節得保持在由選票所記錄的法律程序上的那個妥協的狹隘界限內。這也就是當時法西斯崛起的原因。

正是在這裡，格蘭姆西提出了意識型態和文化上的「領導權機器」這個概念。他的意思是要他的黨注意到，延續資本主義社會所必須的各種不同的世界觀和組織原則，不僅在國家（上層建築）和生產範圍（下層建築）內起作用，而且還通過教育制度，宣傳媒介、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

這些「領導權機器」而發揮作用。因此，工人階級向敵對階級奪取政權的過程，必然包含有奪取意識型態和文化上的「領導權」的過程，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必須在「市民社會」的各個領域內——社會、權力關係、生產、文化和教育各方面，去進行破壞資產階級在意識型態上的「領導權」的鬥爭。

以工人為主體的格氏「民間社會」觀

格蘭姆西後來更進一步指出，工人階級要成爲掌握領導權的領導階級，首先必須擺脫

「經濟層面的、同業工會式的階段」，而進入「政治層面的、階級的階段」，這就是說，工人必須具有階級的世界觀，必須有社會主義思想。同時，爲了對「市民社會」行使有效的「領導權」，工人階級還必須和其他「社會集團」（如農民等）進行聯盟。格蘭姆西提醒說，這個聯盟不是在經濟生活的基礎上自動地成長起來的，而是只有通過文化鬥爭和思想鬥爭才能實現的「新的文化的和社會的集團」。

從格蘭姆西的這些主張，我們可以明白看出他的「市民社會理論」處處建立在「階級社會」和「工人主體」這些概念上，和右派及自由派「民間社會理論」那種大鍋炒的「多元民主架構」，大拼盤的「民間聯盟」及無階級的「宰制結構」，是根本不一樣的東西。

那麼，右派和自由派的「民間哲學」或「民間社會理論」，既非根源於格蘭姆西，又根源於哪裡呢？這就要到西方馬克斯主義的各種流派中去尋找了。

西方馬克斯主義與知識迷魂陣

首先，說明西方馬克斯主義的概念範疇及其緣起。

所謂「西方」，指的是西歐和北美。「西方馬克斯主義」指的就是這兩個地區各種

馬克思主義流派，一般說來，包括：西德的「法蘭克福學派」；法國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英國和美國的「新左派」；以及以義共為首的「歐洲共產主義」（包括法共、西共等）。此外，還有所謂「新馬克思主義」，其實這個稱呼主要指的就是「法蘭克福學派」——又名「批判理論」，頂多再加上六〇年代末期興起的「新左派」而已。

有一點須明白，「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範疇，是相對於「東方馬克思主義」而言，後者包括：中共、蘇聯、北韓、越南及東歐各國。

此外，還可以加上一種「南方馬克思主義」，諸如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都是。至於日本，由其歷史發展來看，應列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範疇。關於這些，在這裡我們就不多說了。

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區分

「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東方馬克思主義」的區分，肇始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歐共黨陣營中的領導人和理論家，對西歐的無產階級運動策略和社會主義革命路線，發生了爭議。其中，德共的羅莎·盧森堡、卡爾·科西和匈牙利的喬治·盧卡契，站在馬列主義的基礎

上，分別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奠下了理論基礎。

從更廣泛的基礎上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這兩件大事，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根基，引起西歐進步知識份子的徬徨和探索，他們根據西方文化、知識和哲學的龐大遺產，試圖總結和批判人類發展史，特別是近二百年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史，同時也分析、批判和總結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想要為西方社會尋找一條合適而有效的革命之路，有的甚至於想要另闢「第三條路」。這樣，就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範疇下，區分出了兩個本質上不同的「類」。其中，「法蘭克福學派」和大部份的結構主義者及存在主義者，還有部份「新左派」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再加上晚近的「後結構主義」和「新哲學」，統統都屬於那類想走「第三條路」的人，甚至於是什麼路都不願走，就只搞「永恒的批判」，「不斷的抗爭」的人。

這種企圖在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另尋「第三條路」的努力，有時候可以上溯到包括十九世紀末英國「費邊社會主義」和廿世紀初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

總之，「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個很容易叫東方當代知識份子掉進去走不出來的「知識迷魂陣」。

I 「法蘭克福學派」對「民間哲學」的影嚮

下面，我們先從「法蘭克福學派」解析起，因為它是在第一次大戰之後最早崛起的支派，也是右翼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理論。

「法蘭克福學派」形成於下述幾個社會和歷史因素：

第一、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歐社會主義革命失敗及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興起的刺激。

第二、對於蘇聯與日後東歐國家史達林主義猖狂的反感。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經濟成長所形成的富裕氣氛，導致一種對階級衝突和政治鬥爭抱持「妥協主義」的風氣。

「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諸如霍克海默、阿多諾、馬古哲、哈伯瑪斯等人，就是在這一歷史過程和條件中，去構築他們的理論，據以詮釋這個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基本上，他們雖致力於建立一套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但這一理論因受到上述幾個歷史因素的刺激和影響，而特別強調文化的表現優先於其他的層面。當這個學派的部份見解於七〇年代後期逐漸輸入台灣知識界以後，這種特別強調文化

層面的主張，立刻抓住和影響了台灣學術界與文化界的認知態度和思考方向。

「法蘭克福學派」的要旨

大體上，「法蘭克福學派」的論點主要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對經驗主義的實證論提出了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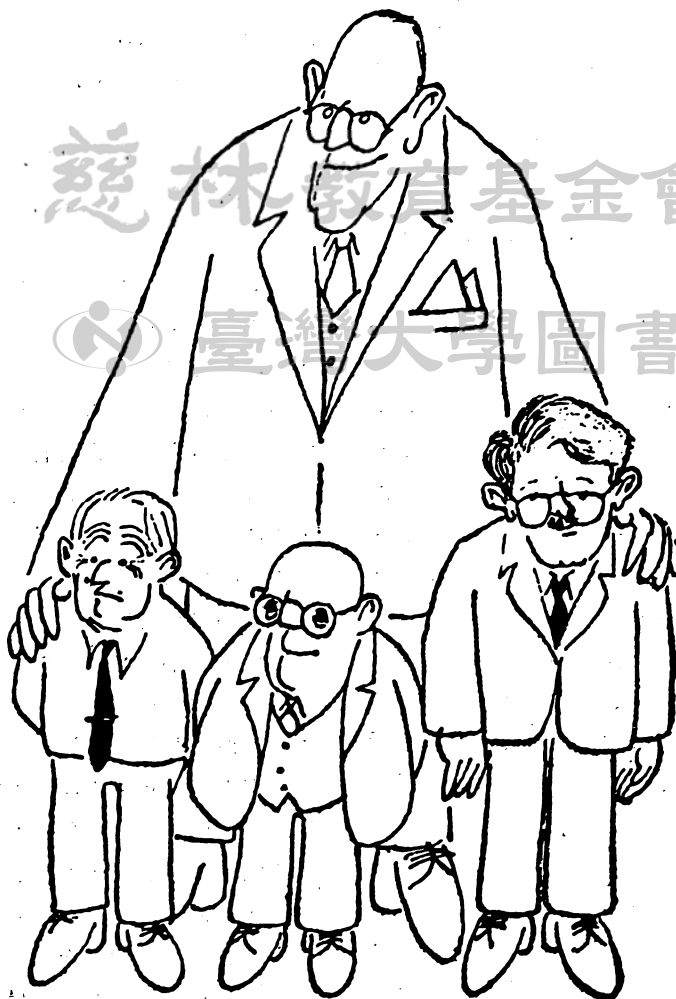
第二、對科技宰制形態，特別是官僚體系，採取批判的態度。

第三、對文化工業的重視。

就這三方面來看，「法蘭克福學派」關注的焦點沒有超出「意識形態批判」，也就是「哲學」的範疇。前面提到的那位德共理論家卡爾·科西，曾在「法蘭克福學派」形成之初，參與過他們的討論，但不久科西就認為僅從哲學的形式

來經營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扭曲」，而離棄了這個學派。

正是由於「法蘭克福學派」在西方近六十年來歷史背景的影響，過度突出「哲學」和「文化」層面的重要性，造成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對勞工階級的看法，從而完全放棄了對勞工階級的革命潛力僅存的一點點信心，也因此喪失了這個「批判理論」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任何根據，而且最後竟走入宗教的層次去找尋根據了。長期以來，「法蘭克福學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中被稱作「沒有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沒有道理的。



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馬古哲與哈伯瑪斯

「法蘭克福學派」的台灣版本

從以上對「法蘭克福學派」扼要的評介，回頭檢視一下台灣知識份子的所謂「新社會宣言」、「民間哲學」和「反體制改良主義」，不難發現兩者的貌似之處。詳細的比對，筆者將在陸續發表的系列批判中逐一提到，現在僅臚列其大要如下：

哈伯瑪斯說，「階級妥協已成為先進資本主義的結構的部份」、「在發展成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任何協同一致的階級」、「無產階級之所以為無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我們的「民間學者」們也跟著振臂高呼「揚棄階級迷思」、「各式各樣的民間力量」

、「不必然是反資本家」、「多樣的社會主體範疇」等等。

當哈伯瑪斯因否定經濟因素和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階級」衝突，轉而乞靈於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危機」和「合理性危機」時，台灣的「反體制改良主義者們」也開口閉口就是「合法性」、「合理性」得如斯響應。

當阿多諾和馬古哲說：「體制」已經獨立於社會的所有成員，成為「技術理性」，因而為了維護這個沒有階級性格的「大眾主體」，必須反對那個壟斷「資源」和「權威」的超群體的「體制」，我們的「反體制改良主義者們」也依樣畫葫蘆的聲稱，「我們所反對的『體制』，指的是『資源和權威分配的界定規則』，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所習稱之『生產模式』」。

當阿多諾等人認為階級鬥爭已經不能成為歷史的驅進力，轉向尋求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大眾社會」時，台灣的「民間學者們」也取巧的把它和「市民社會」概念扯到一塊，搞出一個所謂「民間社會」來。

「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說

「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如此忽視和曲解「階級」與「階級鬥爭」，主要是因為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解說為一種「一勞

永逸的革命觀」，而他們之所以會有這種說解，和他們忽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與經濟理論有絕對的關係，是這個原因使他們的「批判理論」在一開始時，就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部份。

六〇年代以後，當英國的「新左派」興起時，「法蘭克福學派」更逐漸演變成一個愈來愈疏遠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

實際上，即使在六〇年代西方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這個學派的理論也只對像美國這樣沒有固有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即沒有持續、堅定而強固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和政黨的地方，或是這個傳統已被撲滅得差不多的地方，如西德，才發生了一些影響，而且是被證明為負面大過正面的影響。至於對後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有決定性作用的法國 1968 年「五月學生革命」，就絲毫未曾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什麼影響。其實，六〇年代後期的全球性激進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主要是深受中國大陸與古巴革命，尤其是毛澤東思想和蓋瓦納國際主義的啟發而展開的，這是西方學界無論左派或右派都承認的事實。

「法蘭克福學派」的台灣實踐

台灣這個社會剛巧也是個沒有固有的馬克思主義傳統，

而且又是個在知識上只知拾人牙慧，「唯『新』是尚的地方，恰好讓「法蘭克福學派」這一類「擬似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來滿足小資階級知識份子的知識虛榮心。

大家心知肚明，台灣的某些所謂新知識份子，特別是「民間學者們」只因為對台灣數百萬勞工的實際狀況與結構因素所知有限，甚至一無所知；只因為要真正搞懂馬克思主義須從頭來過，十分辛苦，以致乾脆走捷徑搞「捨舊逐新」，人云亦云的誇談其「新工人階級」、「新社會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終至「捨本逐末」而不自知。

「民間學者們」要弄清楚，西方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如玻璃札斯這些人，雖然也分析「新小資產階級」或「新工人階級」，但他們是把這些「階級」當作傳統工廠工人之外的一個「新生部份」來剖析的，從未忽視和否定傳統的勞工運動仍是社會改造的一個樞紐部份，即使沙特的學生高茲也是如此。

更要提醒「民間學者們」一句話，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是在分析戰後「西方」的社會階級分化與重組的狀況，是否完全適合於台灣的階級組合情況，還需要用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方法論來解析一番才知道，不是套用別人「腦力勞動」的辛苦成果，隨便說說就可以的。



阿杜塞的學生波蘭扎斯

II 「反體制改良主義」與「結構主義」的關係

「結構主義」近年在台灣學院派知識份子群中，也很風行，當然這股風也是從西方吹進來的。

結構主義——「第三條路」的尋覓者

西方的「結構主義」學派，主要是指以李維·施特勞斯為首的一群法國學者。這群人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年代，由於對政府西方社會的穩定性發生懷疑，既看不慣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敗和墮落，又不同意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社

會改革方案，只好另尋「第三條路」的那類人。

也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一樣，「結構主義」是在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之間才在西方社會普遍流行，不過，它一開始擺出來的姿態就沒有像「批判理論」那樣被人看成是馬克思主義，除了一個異數——阿杜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結構主義」由於冠上了「結構」這一概念，有時很容易被某些人誤以為和強調社會與歷史結構的馬克思主義是同胞兄弟，其實，兩者之間毫無共同之處。「結構主義」基本上完全否認有客觀的社會規律存在，他們反對從具體事物出發，反對以客觀事物為基礎去

總結規律。例如，在施特勞斯看來，「結構」是先天具有的，是主觀賦予客觀現象的結果。甚至他們認為，揭示事物的「結構」無需觀察，而只需內心的「直觀」，因此，結構主義者所謂的「社會結構」是排除了社會關係的。所有這些論調，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的結構觀根本對立的形式主義結構論。

「結構主義」和「民間社會」的比對

回過頭來看一下台灣的「民間哲學」倡議者怎麼說吧！他們先則自我眩惑於所謂「人民民主對抗爭多樣的社會實踐」，繼則把這種實踐主觀地認定為民間社會「多元一體」的證明，又說這種「民間力量」的基礎是「不死的人心」，還強自辯解說他們實踐的基點是什麼「永恒不輟的自我辯證過程」，是以「人本身作為實踐的終極目標」，總之，愈說愈玄，愈形而上，愈像在搞宗教哲學。

請「民間學者們」自己仔細思量一下，你們這種對「民間社會」和「民間力量」的籠統論斷，是不是和「結構主義」對事物的認識和方法幾乎一個模樣？是否也是「主觀賦予客觀現象的結果」？莫非自己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而不自知？又莫非把台灣社會這一兩年來的各種「自力救濟」與

「請願抗議」現象，誤以為跟菲律賓以階級鬥爭為基礎和動力的「人民力量」是一回事？自欺尚無法，欺人就過份了！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瞭解到「結構主義」所認為的，「結構」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它由許多元素組成，這些元素彼此緊密地相互制約，其中任何一個都無法獨自發生變化，因此，要麼是整個結構「同時地」變成為另一個結構，要麼整個結構的諸元素都保持不變性，也就是說，「結構主義」認為「結構」只有「質變」的可能，而沒有「量變」的可能，我們就更容易發現「反體制改良主義」為什麼反的只不過是無階級衝突的「黨—國宰制結構」，又為什麼必須要進行「永恆不輟的批判揚棄」的原因了？

「民間哲學」和「反體制改良主義」所叫囂的「粉碎所有的教條」，「沒有任何『彼岸』的理想」，「不斷的抗爭運動」等理念，說穿了也是和「結構主義」的基本價值觀一脈相承——都是「虛無主義」，儘管「民間學者們」一再試圖否認。

「民間哲學」——不及格的虛無主義

結構主義者福柯譽為結構主義先驅的尼采，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虛無主義者。尼采曾說，作為史無前例事件的「上

帝死了」的重要意義，還未被人類充分理解。那麼，怎麼才算理解了呢？必須「什麼也沒有，永遠！」

結構主義者即據此而強調「非意識形態化」，把一切不符合他們的「認識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稱之為「意識形態論」，只有他們的理論是處於「中立」的立場，可以免除偏見和謬誤。

很明顯地，結構主義者的這種唯心主義的虛矯和狂妄，全被此間的「民間學者」和「民間哲學」的喇叭手們全盤接收過來，表現在他們的「意識形態終結論」與所謂「反體制改良主義是突破僵化體制的唯一希望」上了。

不過，以尼采對虛無主義的嚴格要求來看，「民間哲學」仍是不及格的，因為它還要「以人本身為實踐的終極目標」，這就違背了尼采的不得有任何「主體」，不得以「人性的絕對物」去取代「精神的絕對物」的訓示，否則就是「不完全的虛無主義」。

「沒有彼岸」式的機會主義

其實，在我們看來，「民間學者們」這種既要在理論上抱持「沒有彼岸的永恆抗爭」的虛無主義，又想在實踐上虛妄地建構一個「終極主體」（無階級或階級合作的「民間社會」或「人本身」）的尷尬主

張，充分暴露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左閃右躲，「瞻之在左，忽焉在右」的市儈主義習性。

我們要指出，不只「結構主義」受到十九世紀末的尼采虛無主義的影響，與「結構主義」幾乎同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存在主義」以及晚近形成的法國「新哲學」與「後結構主義」，也都是尼采的游魂繼續在西歐大陸漂蕩的表現，尤其「新哲學」和「後結構主義」更是虛無的厲害，却又丟不掉尋求「第三條路」的俗世眷戀，的確已走上我們前面所說的宗教概念之中，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嘲諷的「神聖家族」的一員，而我們台灣的「民間學者」和「小布爾喬亞笨天才們」也正自覺或不自覺地尾隨其後，踏上了這條所謂「沒有彼岸的永恆揚棄」的不歸路！

「市民社會理論」的左派與右派

接下來，我們須要對「市民社會」這個概念和它在歷史進程中的事實，作一個概要的梳理和展現。

希臘城邦的同質性「市民社會」

讓我們就從古希臘的城邦民主聯盟制談起。古希臘的「

城邦」是以如雅典這樣的各個城市為中心所構成，所有城邦合起來組成一個聯盟帝國，每個「城邦」都是一個「城邦本位主義」形態的自治城市，如此而有機的組合於帝國結構之中。

實際上掌握「城邦」這一個相對於「國家」（聯盟帝國）的「市民社會」的，是各自治城市的貴族和自由公民，然而正由於各「市民社會」的領導權集團，不過是帝國社會結構的有機組成部份而非「異質」部份，所以，縱使以雅典之強終亦未能（或不可能）與權力鬆懈的「國家」（帝國本身這個「政治社會」）相抗爭而將其「城邦民主理念」擴大到帝國社會的範圍，最後還是由非民主的馬其頓君主亞歷山大將其專制集權的「帝國理念」貫徹到全希臘，進而擴張到小亞細亞和中亞、北非的一部份。

這發明，「市民社會」若非「政治社會」（國家）的異質部份，而是有機組成部份的話，根本就不能也不會是國家強制機器（統治權力）的抗爭力量。

關於這一點，我們再比對一下後來的西歐中世紀的「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國家）的關係，就愈加清楚了。

歐洲中世紀的異質性「市民社會」

西歐中世紀封建社會的國家結構，一般來說，在經濟範疇上表現為領主經濟，在政治範疇上表現為貴族政治，二者結合而為國家的統治力量，強而有力地控制和剝削著依附於集團領主土地之上的廣大農奴，也就是說，西歐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組織框架主要並不像古希臘那樣依靠於城市，它的「市民社會」實際上是個疏離於封建結構的東西，這是說，由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為主所構成的西歐中世紀「市民社會」，在一開始形成的時候，就是個與舊社會結構不同質的「異類」——一個「新生結構」，有自己基於商業經濟的需要而發展出來的政治形式和社會關係，而且早先各城市之間並無什麼緊密聯繫，而有如「突出於封建大海中的一個個孤島」。

這樣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結構，使這些市民社會不但不致於像古希臘的市民社會作為舊社會結構的有機組成部份必然隨同舊社會結構的瓦解而一起瓦解，反而透過商業資本的擴張，逐漸由點串聯成線，藉著相應於這個新興勢力而產生的基督新教倫理觀，吞蝕掉廣漠似海的農村，將農民轉化為僱工，把原來僅限於城市的「市民社會」放大成整個社會，取得了全社會的「領導權」和「領導權機器」，組織成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最後奪取了封建勢力的舊政權，完成了資產

階級民主專政。

不同的「市民社會」有不同的歷史結局

從古希臘和西歐中世紀兩種「市民社會」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市民社會」要能成為對立於「政治社會」（國家）的力量，或者說要能成為取代「舊社會結構」而發展為「新社會結構」的力量，其先決條件是這個「市民社會」必須與一定歷史社會條件下，居於支配地位的社會經濟關係及其統治階級，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社會集團」（階級）才有可能，要不然，就只會像古希臘各城邦的貴族和自由公民一樣，即是「市民社會」的組成部份，也是「政治社會」（國家）的統治階級，彼此之間只有「權力資源和權威分配規則」的無止境的（永恆的）權術遊戲（如同「反體制改良主義」所嚮往的），而無根本經濟利益不同的對立衝突，從而自不可能將其「市民社會」作類似西歐中世紀「市民社會」那樣成功地「放大成整個社會」，當然也就永遠只能夠反反什麼「體制規則」，而無法根本地改變「體制」了。實際上，古希臘的貴族和自由民主已經透過城邦民主聯盟，完成其「市民社會」的放大過程，才取得了國家的支配權，被壓在底下的「社會集團」是當時的奴隸階級。）

關於「市民社會」的這種本質差別，我們的「民間學者」在最近的一次公開演講中，當談到古希臘「市民社會」時，曾靈光一閃的提出過這麼一個有趣的「發現」，他說古希臘城邦的奴隸無產階級才是「真正的市民社會」，當然他没提那個具有類似於現代議會民主的古希臘「市民社會」的其他組織部份是哪些人，更沒提是哪個「社會集團」在支配這個聯盟帝國的「政治社會」（國家），不過，我們還是很樂意為他這個偶然的發現熱烈鼓掌。因為，至少它有助於「民間哲學」和「民間社會」的附和者們發現這麼一點事實：（也是一種「發現」）他們的「民間學者」在思考和觀察上是多麼的「迷茫」，竟然遠視地看見了古希臘「市民社會」組成部份中的原始奴隸，而近視得看不到當前台灣「市民社會」組成部份中的現代奴隸——特別是產業工人。

台灣「市民社會」的放大過程

今天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早在十五世紀就首先由英國的資產階級市民社會放大成整個社會了，台灣至少在1950年代經由土改也完成了這種「市民社會」的放大過程了。也許，正確一點來說，應該上推到國府在大陸時期的「市民社會」，和本省在日治時

代的「市民社會」，就已在相當程度上完成了這個放大過程，然後二者於戰後會合在台灣再予擴大和強化。

從那時以後，正如同格蘭姆西所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和自由概念，透過其議會政治和法權運作，「掩蓋」和「調節」了市民社會內在於結構中的階級矛盾和衝突。「現代奴隸」的處境在本質上和古希臘奴隸沒有兩樣，就這麼被一種新而複雜的形式壓制著，而他們才是真正的「市民社會」。

「階級功能論」與「階級衝突論」

從以上的論述，「市民社會理論」左右兩派的區分已經躍然呈現了。若以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右派市民社會理論基本上是從涂爾幹和派森思（也許不要加上韋伯等人）的「社會階層功能論」來看問題的，這一派理論認為社會有「階層」和「等級」區別是「不可避免的」，是社會體系「重要而基本」的原則，所以，不平等的報酬和地位是「必要而且合理」的。

在資產階級現代社會學中另一個與「階層功能論」相對立的「社會階級衝突論」，也是右派市民社會理論的知識根源之一，不過，這種以達倫道夫為主要代表的所謂「階級衝突理論」，根本上是西方的一

種企圖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的學說，其源頭可以指向對資本主義愛恨交織的韋伯。這一派理論所說的「階級」是一個靜態的事物，並不包括「階級意識」的討論。因此他所研究的對象，事實上就只是一個「統計群體」，而不是「社會階級」，他們也許在思考和觀察態度上較「階層功能理論」自由主義一點，但終於還是無解釋社會階級衝突的結構因素。

「民間學者」的東施效顰

在台灣，被「民間學者們」信口捧為「大師」和廉價封為「先知」的英國學者尤瑞和法國學者杜拉連，其實說穿了都是為了要尋求那虛無漂渺的「第三條路」，而在「階層功能論」和「階級衝突論」之間一再兜圈子的人，「民間學者們」本身自然更是東施效顰，愈見其醜了。

例如，他們的「民間社會理論」一面採取「階級衝突論」所強調的「自主概念」，大談其民間力量的「主體性」和「人的自主性」，一面却又採取「階層功能論」的觀點，把台灣社會的各種衝突事象，解釋為主體「互賴」而予以「整合」，硬是把歷史過程的偶然片段當成永恆不變的「事實」來膜拜。

這種罔顧各種衝突的客觀



契·蓋瓦納

結構因素，不作具體分析，只知左抄右引的大言不慚，只怕連尤瑞和杜拉連都要大搖其頭的吧！

知識份子與「商品知識」的徵逐

我們知道，目前由一些大學的知識份子搞出來的「民間哲學」和「民間社會理論」，除了在大的背景上，是根源於上述我們所指出的當代西方社會思潮之外，就台灣知識份子本身的思想背景而言，不能不說是在大學校園中植根甚深的自由主義和懷疑論了。

這兩種思想在台灣的知识份子群體中之所以愈來愈盛，是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所帶動的資產階級的膨脹，有著緊密的聯繫關係。

大學的產業功能

在這種歷史社會條件下，作為大學知識份子群體的一員，無論其本來的出身背景如何，都無可避免的加入了小資產階級的行列，成為新小資產階級的再生力量和有機組成部份，正如「民間哲學」的吶喊者們所言，大學是「利益導向的職業訓練所」與「意識形態的官僚養成所」，專門培養台灣資本主義新階級所需要的大量專業技術人員，管理階層、行政官僚及教師等各種「意識形態專家」，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個群體的命定出路。

因應於這個命定出路的意識形態則是自由主義和懷疑論，這是說，知識份子作為資本主義新小資產階級的有機組成

部份，在經濟關係上既不一定擁有生產工具，在階級位置上又自外於產業工人，前程難料而又顧影自憐，唯有以「無盡的否定」來維護身份上的自尊和平衡內心的焦慮。因為，要逃避什麼，最偷懶的辦法就是「不承認」它，例如，要逃避「統、獨」之爭，就說它是「迷思」；要逃避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就說它是「教條」，如此就可以關起門來，輕鬆舒坦搞自己形而上的「反體制」運動，多麼省事。

新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了舒展其自由主義和懷疑論的世界觀以及鞏固這個群體的既得利益，有時候不得不借重大量的理論和學說知識，凡是可以成全其發展或完成「自我成就感」的知識，無分真假與對錯，有用或無用，只要是「新」的，不是「舊」的；只要是「後起」的，不是「古典」的，一概趨之若鶩，競相獵取。

尚新好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當「新、後、超」的知識隨同其他消費商品從西方一波接一波湧入台灣市場之時，當存在主義、結構主義、新左派、新馬克思主義都被台灣新知識份子挨次「淺嚐」之後，當沙特、馬古哲、盧卡契、阿杜塞、哈伯瑪斯、韋伯、格蘭姆西都被台灣新知識份子逐一「

展示」之餘，這些新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們就像趕時髦、追流行的少男少女一樣，淪為「商品拜物教」的信徒，再也無暇回顧那些被視為「舊的」；「古典的」的東西是否真的「過時」了，「無用」了？從而，也就不曉得只有搞懂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才能夠對像「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這類學說的利弊得失，知所取舍。

台灣新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功利主義的「尚新」「好變」習氣，不僅表現在他們不知其所以然的膚淺追逐西方新知上，也表現在他們對中國和東方歷史文化的淺薄理解和盲目排斥上，在這一點上，他們和老一輩的「全盤西化論」者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差別只在前者是一面倒向西方資本主義，而新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則走尾隨西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之後，要在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夾縫中，另找「第三條路」——一個讓他們既可「反對」又能「改良」的無何有之鄉。終至落得「玩物喪志」，迷失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馬克思主義打破了西方本位主義

台灣新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顯然沒有認識到，他們所亦步亦趨的西方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有一個很大的「思想之結」——既懊惱於資本主義

對西方社會文化的挫傷，又吝惜於對協同資本主義茁壯的西方固有文化哲學作根本批判。換言之，西方知識份子是很以西方世界那一套思想傳承為安身立命之本的。

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對那個在歷史範疇和哲學範疇上，宣告與西方固有的文化世界觀作根本決裂的馬克思主義，非常的「惱火」，視之為「反西方」的不祥之物（如反動學者卡爾·玻帕對馬克思主義所施加的暴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西方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隊伍中，除了那些堅持要革資本主義之命的人而外，大部份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後，特別是在「東方的」俄國馬克思主義革命之後，都變成了左顧右盼的「反體制改良主義者」。

然而，問題的核心在於，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的歷史觀和哲學觀提出了革命性的一擊，才使西方人首次真正得以「科學」的走出西方的歷史範疇而進入世界的歷史範疇。就包括東方在內的全世界而言，也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史上第一個使人們可以擺脫本位的歷史文化拘絆，而自主的、批判的走入世界的歷史和社會範疇的「科學體系」，為正確的理解自己和別人提供了一個「科學的方法」。

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救贖之道

事實很清楚，在資本主義支配的社會，無論西方或東方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由於拒絕馬克思主義而始終難以正確的對待和吸收自己的及別人的文化思想，以致不是流於狂妄自大，就是變得妄自菲薄。

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要改變自己這種「上不接天，下不著地」的世界觀，雖非絕無可能，却也十分困難，當然，這不是說「個別的」知識份子在其政治立場上和社會實踐上，沒有成為「革命者」的可能，而是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群落」而言，幾乎是「無可救藥」的。照格蘭姆西和阿杜塞的意思來說，知識份子需要對自己的思想實行一個徹底的「革命」，一個長久、痛楚和困難的再教育，而且是一個不斷的外在的和內在的鬥爭，才能夠擺脫自己的「階級本能」。

結語

從台灣最近幾年來某些新知識份子身上所呈現的問題看來，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一個成天抱著自我中心的「自由主義」和「懷疑論」的人，可以一面反馬克思主義，一面厚顏的佔它的便宜，也可以一面反格蘭姆西和玻蘭札斯，一面又無恥的吃他們的豆腐。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市儈學者敗德的表現。 ■



特別企劃之一

● 特別企劃 ●

日本軍國主義

——從靖國神社的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於日本敗戰後滿四十年的一九八五（昭和六十）年八月十五日，一反以往作風，公然率十八閣員，正式祭拜靖國神社，以公費獻花，致奉奠饌，頗有違犯其憲法第二十條、八十九條所定的信仰自由與政教分離原則之嫌。致惹起海內外的嚴厲批評，除所有日在野黨一致責其為違憲，並各追究政府責任外，一般輿論則大為分歧，反對者認為不外乎欲將日本自經濟大國塑成政治大國，甚至復活為軍事大國的中曾根路線的一環。在海外，除於十五年戰爭中，受日本軍侵略最慘重的中國外，菲律賓、新加坡、南北韓、香港等地，對靖國神社的公然再度登場，無不深覺恐

慌與疑慮。因靖國神社合祀A級戰犯東條英機前首相等人，中共糾責官方祭拜等於在肯定甚至贊同戰爭最高領導者的侵略行為。

鑒於內外壓力，中曾根內閣乃將同年十月官方秋季例行大祭予以取消，自民黨並私下請靖國神社將A級戰犯自祭神中剔除，但神社當局却以信教自由與政教分離為由，予以拒絕。

何以靖國神社，在戰前七十餘年之久，在軍方管理之下，成為日本國民崇拜天皇，普及軍國主義的教育手段與場所？對此問題欲獲得滿意答案，仍有將靖國神社創建的經緯與其歷史淵源和本質，以及其在日本近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

歷史使命，加以過濾之必要。

靖國神社的淵源

德川幕府末期至明治維新初期，幕府軍與官軍之間的內戰，雙方之戰死者均相當可觀。一八六九（明治二）年奠都東京後，即於新首都創建中央招魂社，是時在京都雖已有祭祀為國殉難者的招魂社，全國各地亦有招魂墳墓性質的招魂社祠，但為建全國性招魂社，東京都副知事大村益次郎曾奉明治之詔，原選上野之地（位江戶城北東、丑寅、鬼門），後改選鄰接東京城的九段坂上田安台為社址，佔地約三十二公頃，為靖國神社現面積的三倍左右，原擬社祠之外，亦建廣大共同墓地。

十週年專輯

策劃 / 王墨林

思想的底流

結構談「靖國」精神

/ 程達學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日本古來俗信戰場橫死者的靈魂，如不加弔祭，將變成怨靈厲鬼作祟，於是不分敵我，同予厚葬，可謂尚發於濃厚宗教人文主義，亦符合佛教「怨親平等」敵友不分的收魂原則。但所謂「招魂」者，乃有異於傳統的敵友不分，其特徵在唯厚葬自派的犧牲者，敵方死者，不僅不受一顧，反被視為永久難容的仇敵。

雖內戰勝利之後，日政府仍有積極建立忠誠於天皇的強大軍隊之需要，於是國家厚葬戰死者，顯彰其軍功，慰藉其亡靈，頗有使士兵視死如歸，坦然赴死之作用。故東京招魂社打從開始，即受格外優遇，明治天皇詔支該社年費一萬石（擔），在江戶時代末葉，

接受一千石以上的神社全國僅二十社，猶如藩主級待遇受領一萬石以上的神社，唯有伊勢神宮（四萬二千石）、春日神宮（二萬二千石）、日光東照宮（一萬石）三社。新設的東京招魂社竟然亦受領一萬石，非殊遇為何？

改稱與別格

一八七七（明治十）年，另一內戰西南戰役發生，激戰之餘官軍戰死者逾六千人，致東京招魂社的合祀者倍增。一八七九（明治十二）年六月四日，乃將該社改稱「靖國神社」，列為「別格官幣社」（意指特支官費的神社），於是愈確立以戰死者為天皇制國家守

護神的該社特質。日政府在恢復主政的同時，布告祭政一致，再置神祇官，強迫神佛分離，積極推進神道國家化政策，又謂神社非宗教，日本無國教，偏偏唯在國家神道的範疇內，始允各種宗教生存並活動自由。

按「靖國」的語源，本諸中國古代史書春秋：「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之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左傳：僖廿七年）；又謂：「君以靖國也」（左傳：僖廿三），「靖」之本義即作「安」解（見廣雅）；可見「靖國」即與「安國」同義。惟「安國」「護國」向為佛教所慣用，「靖國」一詞諒為標新之故。

靖國神社的特質

一般神社例由內政局列管，靖國神社則初由內務、陸、海軍三省管轄，自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起，始歸由陸、海軍省專管，迄於大戰結束。祭神悉在極秘中經由陸、海軍兩省審查後，奏請天皇核定後合祀。唯其主祭神，每遇戰爭即有無限增加的特異性。故其神體，除繼奉前身招魂社時的神鏡與神劍外，另備有副神體「靈璽簿」，即祭祀名簿，其紀錄方式，不問生前的身份與階級，諸如記：祭神姓名、戰歿年月日、本籍、軍階、勳等、金鷄勳章（一八九〇）明治廿三年制定）之等級等，可謂將兵同型。換言之，在近代天皇制國家，臣民的地位、身份，乃以其與天皇的距離而有所差別，但原則上則說天皇將臣民視同赤子一視同仁，臣民唯有向天皇獻其一命，始得自其差別社會解放，享其一君萬民式的平等。

一八九四～九五（明治廿七～廿八）年間日、清之戰，日方戰歿者一萬四千餘人；一九〇四～〇五（明治卅七～卅八）年間，長達一年四個月的日、俄之戰，日方戰歿者竟達八萬八千人。原來僅合祀直接戰死者，自一八九八（明治卅一）年起改為亦合祀戰爭中之病死者。甚至於戰爭中之一九

〇五年四月，仍盛大舉行臨時合祀大祭，藉以壓抑約十萬家對厚上薄下的扶助費抱有不滿的遺族的情緒。

將天皇、軍部、神社三者連成一體，以天皇御名，將戰歿者讀為神，褒揚其戰功，在侵略性軍國主義的宣揚下，靖國神社可謂已將其機能發揮無遺。春秋兩次例行大祭，均派御使（勅使）致祭。其社境則以憲兵警護；國內唯一公開的軍事博物館（遊就館：一八八二，明治十五年開設）亦設在其社境內。

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開始的中、日之戰開戰不久，日方戰死者已達二十萬人，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將地方招魂社一律改稱為護國神社，指定護國神社卅四社，以每道府縣廳設一社為目標，迄太平洋戰爭末期已達四十六社，與市町林級的忠魂碑，忠靈塔構成全國性龐大的靖國網，祭拜被譽為「護國的英靈」，並已化為祭神的集團。

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進入太平洋戰爭後，戰歿者日益激增，因審查嚴格費時，每年能進祀靖國神社者僅三萬元。自每年臨時大祭受招待的所謂「九段之母」或「靖國遺孤」群的凄慘嗚咽中，常傳出「殺人犯！」「還我愛子」等的痛叫聲，亦常使現場轉播播音員為之手忙腳亂。為期三年八個月的太平洋戰爭，使日人首嗜人類史上未曾有

的原爆浩劫，戰歿者逾二四〇萬，受空襲之災包括原爆犧牲者，逾七十五萬，反之十五年間受日軍侵略的亞洲各國的死者，則在二千萬人左右。

死灰復燃的靖國精神

盟軍佔領下的日本，靖國神社被稱Military Shrine（軍國神社），於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值「陸、海軍省」即將被廢止前，臨時舉行大招魂祭，將未合祀全體戰歿者一併予以合祀。同月十五日，總司令部發出神道指令，嚴禁國家神道，並嚴令實施政教分離。同月廿八日廢止原有「宗教團體法」，公布施行申請制的「宗教法人令」，以保障宗教活動的自由。

一九四六（昭和廿一）年九月七日，靖國神社亦經東京都知事的認可成立「軍立宗教法人」，其間，因總司令部曾禁止其公開合祀行為，致改為個別合祀。靖國神社及護國神社，雖各成立宗教法人，總司令部仍極警戒，以免其與軍國主義或報復主義再度連結。

一九五一（昭和廿六）四月，宗教法人令被廢止，公佈認可制的「宗教法人法」。一九五二年九月卅日，該社經東京都知事的認可，成立「軍立宗教法人」，並訂定「宗教法人」靖國神社「規則」、「靖國神社社憲」，幾已恢復戰前該社的特徵。公然以復活往

日的功能為趣旨。

一九五一（昭和廿六）年，以文部省及日僑遣回援護廳兩次官名義，發出「有關戰歿者的葬祭等事宜」通報，為公務員與地方公共團體公開參與戰歿者的慰靈祭典，開方便之門。殊有藉以動搖政教分離原則之嫌。

翌年五月二日，於東京新宿御苑，以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的戰歿者、罹災死者等二四〇萬人為對象，舉行首次全國戰歿者追悼典禮，由天皇、皇后親自致祭。旋於同年十月十六日，天皇、皇后復親拜於已成民間宗教團體的靖國神社，於是天皇與靖國神社之關係復活，自翌年秋季例行大祭起，御使（敕使）的差遣亦告恢復。

至於全國性戰歿者追悼典禮，後來其對象增加至三一〇萬人。一九六三（昭和四八）年八月十五日，除曾舉行於日比谷公會堂外，翌年移於靖國神社內舉行，後來則年年舉行於日本武士道館內，成為國家例年行事，亦以「追悼」並非宗教行為為由避免觸犯憲法的規定。

違憲論——國營化的挫折

遺族厚生連盟（後改為遺族會）、神社本廳及部份宗教團體等保守勢力，一再要求以官費支持靖國神社，並積極為

自由民主黨推進靖國神社國營化鋪路。

厚生省自一九五六～七一（昭和卅一～四六）年的十五年間之久，將靖國神社的合祀手續視為行政事務，反復通報以國費支理其費用。此種公然違憲行為，迨一九八五（昭和六十）年，因社會黨議員的追究，該省始承認違失，而撤銷所有有關通報。

歷代首相，三木武夫堅持以私人身份祭拜（一九七五）；福田糾夫以「內閣總理大臣」身份祭拜，歷代仿之；鈴木善幸率閣員十八人團拜（一九八〇）；自民黨國會議長亦結團祭拜（一九八一）。對此，在野黨極力反對，參眾兩院法制局與內閣法制局，均採其為「違憲」的見解。至一九八〇（昭和五五）年一月，內閣官房長官始發表「公式祭拜為違憲」的統一見解。

合祀基準

一九七六（昭和五一）年，據國立國會圖書館的詢問，該社始公佈合祀基準與手續。

戰後一併合祀加上嗣後個別合祀的祭神，幾逾二四〇萬柱，其間女性合祀者亦有五萬七千餘柱。唯最重要一點為，現行合祀基準，基本上仍繼承戰前以為天皇忠死者為優先合祀對象，顯而易見，其合祀並非為「追悼」，要在為所謂「英靈」，顯耀其軍功或慰藉其

亡靈。

台灣同胞的祭祀

靖國神社同伊勢神宮，為不容有任何例外的國家神道的兩大支柱之一。其合祀，不問戰歿者及其遺族的思想、信條、信仰，悉片面擅行於社方。戰前如此，戰後亦然。曾有基督信徒的遺族，請求塗銷靈璽簿，遭社方拒絕。台灣籍戰歿者的遺族，亦曾抗議片面接受合祀的通知。要求該社自祭神中剔除。該社當局則以：「在戰死的時點既為日本人，死後無疑仍為日本人；既如同日人為戰爭犧牲，將其祭祀於靖國神社亦為理所當然。」（一九七八、四、一六朝日新聞）為由而加拒絕。

該社亦合祀佔據台灣初期「討伐山胞與抗日分子」的戰歿者，即在殖民地統治下殺戮台胞的士兵亦被合祀在內。在十五年戰爭期間，日人曾在台實施志願兵制及徵兵制，在其威脅強例下，被征調參與侵略戰爭的台胞不下數十萬，對其中戰死者近來雖有賠償之議，但在前引靖國神社當局者的談話中，對殖民地統治與侵略戰爭可謂絲毫未見有其反省或認錯之迹象。

皇族的祭祀

靖國神社原為「臣民」而設，惟戰後竟然亦合祀皇族。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戰歿於征台之役，原被祭祀於台北劍潭的台灣神宮（現圓山忠烈祠）；戰役於中國大陸的北白川宮永久親王，被祀於內蒙古的蒙疆神社，敗戰後，俱移靈返日，於一九五九（昭和卅四）年十月四日，合祀於靖國神社。

該社將原來全祭神列為一座，皇族二柱各列為一座，成合計三座。

對臣民的祭祀，該社當局雖一向守一視同仁的原則，惟事關皇族，則仍界以特別待遇，可見其意識中，戰前天皇崇拜之念，仍綿延不絕。按合祀鎮壓內亂或用武力彈壓殖民地人民而戰亡者，藉以褒揚其對天皇制國家的盡忠；豈知此種基準或價值觀，旨在將天皇絕對化，亦欲將侵略戰爭正當化，無疑蔑視國際道義，亦無異粉碎侵略戰爭受害者的心。

A級戰犯的祭祀

尤有進者，靖國神社於一九七八（昭和五三）年十月十七日，包括前首相東條英機等死刑犯七人之A級戰犯十四人，事前並未知會其遺族，竟然秘密被合祀為昭和殉難者之列。

依其合祀標準「軍人軍屬中依和平條約第十一條死亡者（經戰爭審判受刑者）」之規定，B、C級戰犯，向來即在合祀之列。惟A級戰犯被合祀者中，亦有文官廣田弘毅前首

相，顯然超出其標準。

此事經半年後的翌年四月，始由報刊揭發，一時震撼世人，受處刑的侵略戰爭指導者，竟然被讚譽為國事殉難者，可謂已將靖國神社戰前軍人至止的本質暴露無遺。

中曾根就任首相後，即高唱「戰後政治的總決算」，力主以天皇為中心的新國家主義，不遺餘力積極推進日本軍事大國化。難怪他一再祭拜靖國神社，崇敬有加。一九八五（昭和六〇）年七月，在輕井澤自民黨的聚會中，他甚至揚言：「為國殉難者，國民加以感謝，乃理所當然之事，否則將會有什麼人肯為國犧牲？」此言除表示他一心一意藉官式祭拜，急欲恢復靖國神社的公權之外，弦外之音，莫非還要為未來戰爭的戰死者準備其顯功之所？

合憲論的見解

中曾根政府於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四日，在以保守人士為主的懇談會報告，認為「官式祭拜」在社會一般觀念上，並不視為憲法所禁止的宗教活動，應予變更政府一向的統一見解，旋於翌年八月十五日，在嚴密戒備下親率十八閣員強行「官式祭拜」。借口「慰靈」乃宗教上的觀念，「追悼」則屬人類自然普遍的情感，故「官式祭拜」為社會之公意。

但事實上，「追悼」乃國

民包括遺族每一個人的心意問題，即使多數國民有此意願，亦不能適用多數決之原理。換言之，此乃憲法所保障每一個國民每一個人之自由與權利的問題。自民黨政府蓄意將靖國神社恢復其本來面目，成為公設全民追悼中心，既要求國民為國捨命，自務必籌備慰靈彰功與教育國民的場所。殊不知國家神道與靖國思想，無異為近代天皇制國家理念本身的宗教表現。（日人稱天皇為神聖不可侵犯的アラヒトガミ——「現人神」）更遺憾者，為對國民每一個人的自由與權利，自始即未加尊重與考慮。

揆諸外國事例，中曾根首相所常提及之美國愛靈頓墓地（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而言，可謂本質上迥異於靖國神社的施設。將戰死者片面祭祀為護國之神，強制國民「追悼」的方式，可謂日本獨有。在外國本質上乃紀念設施，並非宗教設施。愛靈頓墓地唯葬一定資格的美國公民。但拒之者，亦聽其自由。雖有公費提供一定形式的墓碑，但若要較大者必需自付其差額，死者與遺族的自由與意願均受絕對的尊重。

合憲和違憲的爭議

遺族會因過份傾向自民黨，欲強制國民崇敬軍國主義設施的靖國神社，亦遭致分裂。

一九八五（昭和六〇）年

，北海道旭川與瀧川成立和平遺族會，展開全國性運動；一九八六年，淨土真宗本願寺派，以島根縣大田市為據點，組成真宗遺族會，與早成立於一九六九年的基督徒遺族會連手，呼籲戰歿者的慰靈或追悼，應基於遺族的意願與信仰。

根據以上諸因素，關於靖國神社合祀問題及違憲訴訟等抗爭條件，纏綿不絕，岩手縣包括宗教家在內的市民，於一九八一年以該縣議會議決官式祭拜屬違憲，請求議長等應賠償費用。

翌年，認為對靖國神社及護國神社支出香奠，獻燈費等亦為違憲，請求縣知事、縣福利部長、厚生援護課長賠償，提起公訴。

愛媛縣市民亦於一九八二年提起類似訴訟。兵庫縣以西播磨地區。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僧侶為團長，基督牧師等市民一一五人組成原告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以國家為被告提出官式祭拜為違憲之訴。

如今，靖國神社問題，已升級至追問日本戰爭責任與戰後責任的重大政治思想的對決。日本國民因默許首相與閣員作官式祭拜，致惹起亞洲被侵略各國，群起嚴責日本的道義責任。但揆之今年三月三日盛岡地方法院對此類案件的判決，竟然頗有偏袒政府合憲論的跡象，一時引起廣大日本傳播界的批評，茲就三月十日NHK的時事解說，簡介如下。

盛岡裁判的輿論反映

關於岩手縣盛岡市民所提岩手靖國之訴，「盛岡地方裁判所」於本月五日裁示：首相等雖以公職資格作官式祭拜，仍屬其個人自由，並無違憲之處。

其間，宮原裁判長就官式祭拜表示其見解謂：如果由政府主辦其事，以公費支付其用，以國家儀式進行祭拜，自屬違憲；但如果首相等即使以公開的方式，以一政治家，據個人信念從事祭拜時，自屬應有之自由，應不違憲。又就岩手縣的香奠支出亦謂：並無宗教上的意義，可視為對戰歿者的一種社交儀禮，亦並不構成違憲。

因首相等對靖國神社的官式祭拜，不僅在日本國內，在海外亦曾引起軒然大波，導致激烈議論。

三月五日，日本各報，於第一版均以「靖國神社的官式祭拜是否合憲？」為標題，對此判決特加報導，並於翌六日晨刊出社論，就此次判決加以論評，除《產經新聞》外，均表示批評的見解。

台籍戰歿者多於韓籍

鑒於日本國內有心之士，對此事甚至如此警惕，身受日帝國主義之害的我國，眼看日軍國主義思想死灰復燃，豈能

視若無睹或隔岸觀火？

台籍戰歿者祭祀於靖國神社者二七、六五六人，韓國籍祭祀於該社者：二〇、六三六六人。台籍多出七、〇二〇人。按是時「朝鮮」人口約多台灣三倍，徵兵制度之實行，亦早於台灣，何以朝鮮籍之戰歿者，竟然少於台籍者如此之多，誠令人費解！

惟朝鮮於昭和十三年（民國廿七、一九三八）一月，即實施志願兵制度。台灣則遲至昭和十七年（民國卅一、一九四二）四月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翌年八月施行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後被編入陸軍軍籍者約五千餘人，海軍軍籍者約一萬一千餘人。迨昭和二十（民國卅四、一九四五）年，實施徵兵制度，其結果受檢者總數四五、七二六六人中：甲種四、六四七人，乙種一八、〇三三人，其大部均被編入現役入伍。

是時，日軍在太平洋，在南方各戰場，節節敗退，台胞新兵，多被派遣為先鋒，犧牲亦眾，尤其山胞，對叢林戰，尤稱英勇善戰，以「高砂義勇隊」，大為日軍所重用。台籍戰歿者眾，自在意料中。

據上舉數目，被征者三八、六八〇人中，幸歸者僅一一、〇二四人，尚不及三分之一。戰歿者，縱然有三百萬日圓左右之補償，逝者已矣，對其遺族又有何補呢？

附錄：

靖國神社合祀柱數

1984〔昭和59〕年10月

總數

總數 2,464,151 柱

明治維新前後殉難者

7,751 柱

西南之役等

6,971 柱

日清戰爭

13,619 柱

征台之役

1,130 柱

北清事實

1,256 柱

日俄戰爭

88,429 柱

大正三、九年之役

4,850 柱

濟南事件等

185 柱

滿州事件

17,174 柱

中日戰爭

191,039 柱

太平洋戰爭

3,131,747 柱

據厚生省調查，台灣、韓國（包括北韓）籍軍人或軍屬之死亡中，被合祀於靖國神社者，數目如左：（1975〔昭和五〇〕年十月）

台灣籍 27,656 柱

韓國籍 20,636 柱

主要資料依據：《靖國神社》
村上重良著，岩波ブツクヰツト

No.57

1987.3.10

8.00 AM NHK

時事解說

台灣統治概要

台灣總督府

昭和二十年

特別企劃之二

日本軍國主

前言

現實點日本政治、經濟的最大特徵，是自民黨中曾根政權圖以強硬手段拆除戰後四十年來和平與民主主義的國民精神支柱和有關的制度架構，力圖把國家推向災難性的右翼化、軍國化的道路上去。

1983年1月，中曾根赴美會晤雷根，竟然毫無忌憚地高喊「日美命運共同體」，承諾日本列島不沈空母化、三海峽封鎖案、和一千海哩的航路帶 sea lane 防衛分擔等，一脚踢開了歷任政府至少在口頭上堅持下來的「專守防衛」原則。

以此為開端，接着表示接受和美國核子巡航飛彈搭載艦的共同作業、自衛隊參加美軍

核子戰爭體制的方針等，跨越了「非核三原則」的長年國憲。

到了1985年夏，更在內閣會議中採納了防衛費突破GNP 1%的「新防衛整備計劃」，且不顧國民輿論的反對，強行官式參拜靖國神社。

以上這些歷代自民黨內閣所不敢輕試的國家軍事化，和積極投入日、美共同核子戰爭體制的政策，正在中曾根的「戰後政治的總決算」「國際國家日本的建設」的口號下被積極推動着。

另外，做為上舉各項政策的補強手段而出現的，是所謂的「國家機密法」。這是把政府公報以外的、有關軍事外交的消息，一律納入「國家機密」範圍，不使一般國民有接觸的機會，並對報導或評論政府

義復活的經濟基礎

/ 林直道
翻譯 / 何平

公報以外的軍事外交情報，視為間諜行為而加以處斷的法律。可以說是戰前的治安維持法、軍機保護法等法西斯法律的重現。

對應着這種急激的軍國體制的構築，經濟方面的現象是在巨額的財政赤字下，防衛預算的跳躍式膨脹。其結果為：有關福利、文教、中小企業對策費、民生關連公共事業費等，直接關係到國民大眾生活的政府支出，被大幅度消滅。健康保險、養老金的大改惡、大型間接稅的導入等等，都可以說是對保障「健康而有文化的最低限生活」的憲法精神的直接背反。

另一方面，在「民間活力的導入」的名義下推卸政府對國鐵等公共事業的責任，撥交給民間大企業，使其變成大企

業的額外獲利場所。又稱為了提高「民間活力」，把一些為保護中小企業和消費者，而課在大企業營利活動上的規制，予以放寬甚至撤銷（de-regulation），強化以「弱肉強食」為當然的施政方針。

在教育的領域內，也將自私為先的競爭原理導入，只致力於培育少數的精英和多數的賤價勞力提供者，且把「防守國家」的虛偽口號，做為教育改革方針。

不過，更為根本性的問題是，日本的帝國主義復活與強化，在對美從屬的前提下，現已急速進入一個新階段。此一現象究竟根據何種經濟變化為基礎而產生，亦即，做為這些現象的根源的日本獨佔資本主義，其基礎的變化實況如何？本稿將做一番簡約的探討。

壹、日本經濟的膨脹及其新階段

(1) 石油危機後仍能保持GNP第二位

第二次大戰後，自廢墟中站立起來的日本資本主義，從1950年代中葉到1970年代初，完成了史上空前的高度經濟成長。1955年到1973年，19年之間的實質經濟成長率是驚人的9.8%高水準。通過這樣的高度成長，日本的GNP在1966年已達1674億美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第二位的「經濟大國」。但1973年末發生的石油危機，一擊而使日本的高度發展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在日本，一次能源中石油所佔的比重高達77%（1973年），而其中的99%依賴於進口原油。當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原油價格騰昇4倍時，那種打擊可說是決定性的。日本經濟一向超過諸外國的不均等發展，看似已經註定不再可能。

到了1977年，伊朗革命再度帶來了石油震撼，原油價格再次躍昇2.6倍。

但日本雖然遭到前後兩次的石油危機，它的經濟成長——雖比高度成長期已降低為一半比率——比較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各國，仍然保持着相對高度。它的所謂的不均等發展依然持續着（第1表）。在世界GNP總額中所佔的比率，反而從1970年的7.2%提高為1980年的10%左右。1983年的日本GNP已達到了1兆2042.7億美元，仍然保持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位（第2表）。

(2)國際競爭力的強化和輸出的激增

這種超越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其基礎無非是各產業部門對尖端技術的積極開發和導入。日本資本主義的支配階層，在原油價格的高騰中，徹底體會出本身「資源小國」的弱質，不得已求其唯一出路於「技術立國」，開始導入節省能源與高度科技的

生產方法。

第3表表示1984年的設備投資和其中高科技關連投資的動向和比重，可看出以加工、裝配部門為首，在全產業領域中的高科技關連投資的活潑情形。

在這中間，處於核心地位的，不用說是電子部門。結果是，在鑄工業的部門別生產指數的變化情形中，可以看出電氣機械和精密機械的突出性激增，意味着產業構造的高速的高度化、高科技化的進行（第4表）。

先端技術的躍進，更和日本獨特的工資成本的削減，和大企業對衛星中小企業的部品收購價購的降低政策相結合，使日本工業成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不少。

本人過去曾經說過，日本汽車產業強勁的國際競爭力，是由如下諸要因所帶起：

1. 被稱為非價格競爭力的、性能上的優越性（燃料消費效率、排氣防除技術、低故障率等）。

2. 基本原料的鋼鐵品質的優良。

3. 產業機置人或三次元 transfer machine 等新銳設備的導入。

4. 部品製造廠的優良性（品質、價格、交貨期限、開發能力）。

5. 對衛星中小企業的短期訂貨方式（Just in time），可以將本身的部品庫存負擔

縮小。

6. 工資成本的低廉（1977年四輪車銷售額中的人事費，美國22.1%，西德25.6%，而日本僅7.1%）。

其中，就燃料消費效率而言，根據1985年美國EPA（環境保護局）對86年型轎車的調查結果，最佳的前十名幾乎是日本製小型車。美國車只有福特FS（引擎也是日本製）排名為第九位。

就工資成本的低廉和方式（Just-in-time方式）來說，現有如下的分析結果出現。在一篇題為「日本製車廠的壓倒性成本競爭力」的論文中，把日美小型車的成本比較列為一簡單的表（第5表），附有如下的說明：

「在小型車的日、美成本比較，日本車比美國車約低30%，每一輛約低2,000美元。成本差額中最大的是人事費。生產一輛小型車所需的人力，日本的效率高於美國3.2倍（表5）。然在工資方面日本只及美國的一半。在人事費上，美國便高於日本6倍。因生產性的工資的差別，在汽車部品的生產工程中佔有較大部分，因此也關連到所購入的部品的成本差別。這些差別約佔全體成本差別的三分之二。以日本的力系統為代表的高效率生產的結果，在庫存利息負擔方面也有了差別。且重視品質的生產態勢奏功，日本汽車生產工程上的錯失極少、售出

後的問題少，在保證費上又有了很大的差別。」

如此，以汽車、事務機置、通信機械、錄影機、半導體等高級機械工業製品為主，日本的輸出貿易凌駕其他資本主義諸國，急速提高了世界市場中的佔有率。此一過程，在70年代雖有幾次的中斷，仍然持續下來，到了80年代更形突出。1970年當時，日本的輸出額只佔美國的44.6%、西德的56.4%。但進80年代後急速追上，在1984年已經趕上了西德，且已追到美國的八成弱的地位（第6表）。

1984年的日本工業製品輸出額達1668億美元，終於超越了美國的1532億美元、和西德的1525億美元，登上了全球首位。

另外，在輸入方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對日本為最大痛點的原油價格，在80年代初由一桶34美元驟降為10美元。這是世界性的景氣停滯和節省能源技術的進步的結果。因而日本的輸入代價也跟着降低，即使不降低，其增加率也遠小於輸出增加率。

如此，1983年的貿易收支黑字是205億美元，84年達336億美元（第7表）。

(3)資本輸出的激增， 世界首位的債權國

日本經濟膨脹的另一個顯著的標幟，是資本輸出的急增。首先，就形成資本輸出中心部分的海外直接投資來說，1984年度末累計已達714.31億美元。其中大約一半是81~84年度4年之間所進行。特別是1984年度的直接投資額，首先達到單年度100億美元以上的記錄（第8表）。

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與其他先進諸國比較，在業種別上，多屬於資源開發型；在地域別上，則多投向開發中國家。對先進國內製造業的投資不多，這個特徵一直保持到現在。84年末的情況，直接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57.2%），還是投向開發中國家和大洋洲。歐洲各國的國外投資平均四分之三是投向先進國，只有四分之一是對開發中國家的投資。不過近年來這種情勢有了顯著的變化，對歐美製造業的直接投資也急速增加中。

現在把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分成北美、歐洲地區和其他地區，則在1981年度末的累計是：北美、歐洲地區只佔全體的38.7%。但自1982年度起到1984年度末的三年間，北美歐地區的投資已增加至49.8%，幾近一半。這種對歐美地區直接投資的急增，是為了迴避日美、日歐間的貿易摩擦而增加現地生產的趨勢反映。

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餘額

，在世界主要投資國中間，在1983年末是繼美國、英國、西德、荷蘭四國而為第五位（第9表）。但這是因為過去的投資餘額小的關係。其實在80~83年的世界海外投資額中，日本部分是11.1%，僅次於美、英兩國，而為第三位（第10表）。

以日本的資本輸出來說，重要的一點是，曾經佔有相當比重的未收款信用的比例降低、證券投資和貸款所佔比例增加（第11表）。特別是最近數年以來，美、日長期利率差為5%，日本的過剩儲蓄（巨大貿易黑字）開始流向美國、日本的證券投資和對外貸款有急增趨勢。

比較各國的證券投資和直接投資，1983年末，美國的證券投資殘額是直接投資殘額的37.6%。英國是91.6%、西德是84.5%。而在日本，反而證券投資多於直接投資，達到1.74倍。

包括貸款和證券投資在內的日本資本輸出的急速增加，帶來了另一種重要的經濟結果。

從對外資產（資本輸出餘額）扣除對外負債（資本輸入餘額）的差額，就是「對外純資產」。日本的對外純資產在1983年中已超過西德，在1984年中超過美國，達到了743億美元。到了1985年末，已達1000億美元，超過沙烏地阿拉伯和英國，成為世界首位的債權國。根據野村綜合

研究所報告，日本不久將超過美國對外純資產最高峯時的82年末的1686億美元。到了90年，預估可達到3910億美元。95年末5580億美元。屆時日本將變成「空前的債權大國」、「世界最大的放債大國」。

但如果發生世界性經濟恐慌，日本商品流向美國或其他世界市場的管道受到阻礙，以上的預估能不能實現呢？這一點姑且不提。日本現在的經濟發展，已經在資本輸出的急增、對外純資產的膨脹、和海外投資收益的累積的道路上邁進之中，這一點則是無可置疑。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敗降，日本喪失了一切在外資產，雖然已經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對商品輸出的依賴仍然很大。仍然保留着濃厚的「輸出取向」的資本主義體質。直到今天，這種體質仍然未被變更。以多國籍企業的外生產額和輸出額作比較，美國是301%、西德58%，而日本却只不過29%。在外生產額對國內生產額的比較方面，美國是18%、西德23%、日本則僅有3%。

即使如此，通過上述的貸款及證券取得的在外純資產的急劇膨脹，日本確已成長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以「資本輸出為典型」的國家。也就是，日本的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膨脹，現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貳、資本的強勢積蓄和國民生活停滯

日本經濟的現階段特徵，一如前節所提，雖然有外表上的高度成長，却在其內部含有深刻的、且增大中的矛盾和對立。

首先是在經濟的急速發展中，勞工、農民、中小企業者等佔國民中大多數的勤勞大眾的所得並沒有成長，其生活與經營極不穩定。這個現象，首先來自於巨大獨佔企業的徹底的裁員「合理化」和抑制工資政策的結果。第12表顯示以1975年為100的1983年的勞動生產性指數與工資指數的國際比較。日本的生產性是142.5，在先進諸國中佔首位。但在工資方面是157.3，屬於最低群。

不僅如此，另一重大問題是日本勞動時間的長度。1982年日本勞動者的年間勞動時間是2136小時。如以一天八小時換算，一年的勞動天數比美國多35.6天，比英國多31天，比法國多53.6天，比西德多56.8天。

廣泛的中小企業，也因為以超低單價承包大企業的零組件、大企業侵入中小企業專門範圍奪取市場、加工階段中小企業所購入的、大企業出品的原材料價格被吊高等因素，通過這些管道被大企業吸走了大部分利潤。

這些都變成大企業超額利潤的一部分。據1984年3月

末的統計，資本額10億日圓以上的2296個企業的內部保留是46兆6000億日圓，和1978年3月末的23兆7600億日圓比較，在6年之間激增約達2倍。

根據「日經企業」的調查，1984年的勞工春季鬥爭只獲得5%的工資增加，而同年的法人申告所得，一萬家的所得合計20兆8977億日圓，比前年增加了10.3%。

日本獨佔大企業的生產與資本的高度集積，表現在「幸運」雜誌上面的世界大企業排行榜，入圍的日本企業顯著增加。1984年美國以外世界大企業500家的銷售額排行中，日本企業比前年增加了14家，以總數150家佔首位，後面是英國75家、西德55家、加拿大35家、法國34家。並且前面100家中，日本佔有26家，其中多數都比前年提昇了順位。

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大企業50家中，日本有豐田汽車、松下電氣、日立製作所、日產汽車、日本石油、三菱重工業等六家進入。

美國除外的100家世界銀行的資產額，第一位是第一勳業銀行、第二位富士銀行、第三位住友銀行、第四位三菱銀行、第五位三和銀行，日本的都市大銀行佔盡了高位。以全體而論，100家中佔29家，前面50家中佔21家。

大企業如此的強勢積蓄，犧牲了勤勞者的利益，使後者

的所得一直無法成長。根據總務廳統計局的「全國消費實態調查」報告，自1979年末到1984年末的5年間，全國薪水階層的儲蓄增加了36%，但負債却增加了65.4%。負債的成長大大超過了儲蓄成長。

還有，中小企業的營業不振逐漸普遍化。1984年負債額1000萬日圓以上的倒閉件數是20,841件，負債額3兆6441億日圓，成為歷年來最糟的記錄。

參、財政赤字下的軍備大擴張和社會福利的削減

日本經濟現階段的第二種矛盾和對立，是在國家財政的巨額赤字積累下，強行擴大軍備。結果是社會保障費用、文教費用、中小企業對策費用、地方補助金、民生關連公共事業費用等，為維持國民生活於一定水平而不可缺的財政支出受到了削減（第1圖）。

政府一方面強行巨大的軍備擴張，另一方面在「民間活力的導入」的名義下，以民間的一定出資為誘導，推動了東京灣橫貫道路建設、明石海峽大橋工程、關西國際機場工程等大規模建設計劃。然後又以財政赤字為理由，揮動「行政改革」的大刀，開始大事削減國民生活水準。所謂的「民間活力的導入」，是：

1. 把政府管轄下的事業部

分移讓民間。

2. 把民間活動的政府規制放寬。

這都是對政府財政資金不足的反利用，為了大企業的過度儲蓄尋找新的投資出路，開拓新的利潤來源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另一形態。

在「稅制改革」方面，強行導入對低所得者更為不利的大型間接稅（E C型附加價值稅）。另一方面，把向來按銷售額分別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規定予以廢止，以單元化形式，把大企業的法人稅率，由現行的43.3%，一下子減低為35.36%。

在如此的情況下，中曾根內閣企圖實行防衛關係費的突破性擴張。1985年9月，決定把防衛費規模定為未來5年間達到18兆4000億日圓。即是超過53中業（1980～85年度）、56中業（1983～88年度）的空前的軍備大擴張。據《日本經濟新聞》評論，為達成計劃中的總額，年度防衛預算必須在實質上增加5.4%，在名目上增加7.9%。

這個18.4兆日圓的巨額數字，如根據經濟企劃廳的「80年代經濟社會的展望與指針」中對未來5年間的成長率計算，已經是GNP的1.038%。是1976年以降自民黨政府一再確認過的「GNP 1%以內」的公然的破壞。

GNP 1%表面上似乎比外國少，但有關它的真相，近

來漸被外國所識破。《時代》雜誌說：「日本的防衛費雖說是GNP 1%，但那是『非共產圈第二位』的超級GNP。並且，若按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方式計算，把軍人年金或其他人事費也算進去，更真實的數字將接近1.6%。以實額論，日本雖不擁有核子武器或海外派遣軍，但其軍備預算却比擁有這兩項軍備開支的英、法兩國還高。」

這種軍備擴張，將進一步壓迫國民生活是必然的道理。而犧牲國民生活的防衛預算，不用說和製作武器的巨型企業的經營利益密切地結合着。《經濟學人》雜誌上有一篇文章如此說：

「防衛生產是以國家為對象的『穩做穩賺』的事業。其真實成本外界不易瞭解，但銷售額5%的利益是受保證的。此外還有幾近同額的一般管理費也是被承認的。有時候，甚至可以收到超過銷售額10%的特別預付款。這種生意無論如何都是最合算的。」

這種事實，只看看三菱重工業、川崎重工業、石川島播磨重工業、三菱電機、東芝、日本電氣、富士通信等等防衛廳高層契約企業，每年對自民黨、民社黨的巨額政治捐款便可得到證明。以防衛廳契約額前20家的政治捐款為例：1983年對自民黨6億4427萬日圓、對民社黨8126萬日圓、對新自由俱樂部1030萬日圓。

三黨合計 7 億 3583 萬日圓。

86 年度預算案要求的是「在艱困的財政情況中」把防衛費優先提高為 7%。並且，其中「武器更新費」（被稱為資本支出、指裝備品購入費、研究開發費、施設整備費的合計）急增 14.3%，達 1 兆 476 億日圓，首度超過 1 兆日圓。武器更新費在防衛費中所佔比率自 29.3% 提高為 31.2%，甚至超過經團連防衛生產委員會所提出的 30% 的要求。這中間，除了 74 式戰車，短距離地對空誘導彈、各種直昇機、反潛警戒機 P3C、F15 戰機等業已發單訂貨的武器外，還包括超水平線雷達或愛國者飛彈、空中加油機的購入。

這些武器的訂單，不但是日本企業，同時對美國企業也是一項高利潤的獲取機會。有時也引發爭取訂單的日美摩擦。1984 年 9 月的日美諮詢委員會的報告如此地說：

「日、美兩國有使用多種主要武器系統的幾點理由。那是交互運用性、戰區內維修水平的提昇、研究開發費的節省等方面的事實。因為日本防衛費在政治的、以及預算方面所受的掣肘，對可能的財政手段予以最大限效率的使用，是件急為緊要的事情。與此有關的，是把主要的武器系統，由美國直接調配，比在日本國內進行許可證生產，在經費方面要減輕許多。而在美國，維持生產線時有更大量的附加機會，

也會帶來成本的削減。」

雖然美製武器的直接供應，對熱望武器國產化的日本大企業來說，是個不受歡迎的建議，但在現實上，兩個武器資本是具有利益共通性的。今天以「零組件」的名義輸出到美國的東西，極大多數是美國武器生產上不可或缺的軍需零組件。1985 年，美國國務院注意到日本尖端產業的技術水準之高、品質之優秀，而對日本八家大企業提出 38 品目的軍事技術方面的協助要求。

美國成長率的急速下降和景氣衰退的波及，已經是預料中的事情。屆時，日本大企業將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範圍，傾向於「死亡商人」（戰爭販子）的商法，是可預見的事實。

肆、日、美貿易摩擦，美國強制日本擴軍

把日本推向軍備大擴張的力量，不僅來自武器製造商。這中間還有更大的經濟動力。一個是外在壓力，亦即美國對防衛分擔的強硬要求。另一個是內在壓力，也就是日本支配階層對確保西太平洋勢力圈的要求。

首先來看看現在日美經濟關係中的核心問題——貿易摩擦。

因為日本大企業的生產集積，生產力擴大的速度太快，

而大多數國民的消費購買力却只緩慢增加，中間的矛盾，當然形成了猛烈的輸出壓力，四處尋求出口。適逢 1983 年以降的美國景氣的上昇和美元偏高的條件，日本的對美輸出自然一路急昇，貿易收支上出現了巨額黑字，激烈的貿易摩擦於焉產生。

近十數年來的日、美貿易摩擦，幾度達到了沸騰點。大都導因於纖維、鋼鐵、軸承、彩色電視機、汽車等日本製品的超大量對美輸出。

但是，今天的貿易摩擦却有更深刻的內含。

首先，今天美國在經濟競爭上輸給日本的品目，並不是夕陽產業或通常產業的製品，而是如半導體這樣直到最近還是由美國掌握着絕對優勢的、在戰略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先端產業製品。

當然，美國現在仍然在超大型、超精密的領域上（如太空梭等），或在基礎技術的領域和軟體方面保持着隔絕性的優勢。但在一般商品的領域，日本力量的生長極快，在市場競爭上已把美國逼進了窘境。在積體電路（IC）的輸出入方面，自 1980 年以降，日本從對美入超變為出超。到了 84 年，在 64K DRAM 一項上，日本已佔有美國市場的 60%（銷售額 27 億美元）。在更進步的 256K DRAM 方面，日本已經掌握了 92%（7.13 億美元）的市場佔有率。因為

日本製品的「侵入」已經指向這樣的最尖端部門，美國對日本的反感也就變得非比尋常。

現在美國經常收支的赤字已超過 1000 億美元，只靠大約同額的外國資本的流入餘額維持着。因此，兩三年來，美國已經把對外純資產喪失殆盡，轉變為 1919 年以來的債務國地位（13表）。

美國之所以陷進如此的窘境，最大的原因是貿易收支的大量赤字。以 1984 年的統計為例，美國 1233 億貿易赤字中間，第一位是日本的 367 億美元。使美國更加不滿的是，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的所謂亞洲 N I C S（新興工業國家），四者合計的對美出超也達 213 億美元，超過第二位加拿大的 204 億美元。而這四者本身却一向對日本是極端的入超，同時達 144 億美元。因此由美國看來，對亞洲四小龍的大幅赤字，其實也是對日赤字的變形。於是，美國對巨大貿易赤字的憤懣全都集中在日本身上。

針對來自美國的指責，日本財界有如下的辯解：

1. 說是不公平交易，但日本的關稅是屬於世界最低的部類。美國要求輸入手續的簡化等，但這方面的作用應該不大。

2. 日本對美大幅出超的主要原因，是美元價位的高估。根據經濟企劃廳的分析研究，日本對美貿易黑字雖然自82年

到84年增加了 2.7 倍，但增加額中的 70% 是導自於美元的高價位。

3. 僅就貿易而言，日本的確是大幅出超。但現代的國際經濟關係，不應只以貿易統計來測定市場開放度，而須要把多國際企業的外地生產額也考慮進去。在日的美國資本的生產及販賣額總計，84年是 439 億美元。與之相較，在美的日本企業的當地生產額僅達 128 億美元。

4. 分析日本對美輸出內容，其中 30% 是美國所必需者。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海外調查部報告，84年日本對美輸出額 599 億美元當中，第一、有 20 億美元是在日的美國企業的對美輸出。第二、有大約 50 億美元的美國品牌下的成品輸出。這在美國企業來說，有滿足顧客要求和節省設備投資的好處。第三、大約 80 億美元是美國成品不可缺少的零組件。第四、40 億美元是在美國幾乎已經不生產的製品。以上四類輸出額合計達 190 億元，約佔對美輸出總額中的 30%。日本《經濟新聞》據此而說：「這是日美產業活動一體化的表現。若以美國對日輸入的限制或日本對美輸出的抑制等手段加以干涉，將招來「縮小均衡」，結果是日一美產業的窒息，也使雙方消費者利益受到傷害……」。

但不論如何的辯解，都無法化解如此巨大貿易赤字下的

美國的憤怒攻擊。自個別品目的對日輸入禁止法案到「輸入課稅」法案、對日報復案等，「向參院歲入委員會貿易小組提出的保護主義法案已近 60 件」（霍布金斯委員會主席談話）。

日本財界對此一形勢，迄無有效舒解方法，却以促進美國農產物或消費財輸入為對策。這無異把代價讓日本的農民和中小企業來負擔。經團連（經營者團體聯合會）的座談會上有人說：「貿易摩擦供日本面對了一種危機。我們可以反過來利用這種形勢，來改變日本的產業構造」，其含義正表示着這一觀點。

一般認為，解決貿易摩擦之道，只有如下幾個辦法：

一、在日本提高工資水準，從而提高國內消費購買力、減低輸出依賴度（國內購買力的增大，同時也可以增加輸入）。

二、在美國，改善高利率，減少財政赤字。為此目的需要減少 S D I（戰略防衛構想）天文數字式的軍事支出。

1985 年 9 月，美國採行了新通商政策，透過強有力的國際協調，把美元價位一舉而壓低到一美元對 220 日圓。只這一舉，便帶給了日本中小企業製品輸出上的困難。但只要日本大企業製品的低工資成本和美國的財政赤字和高利率未獲得改善，日美間的貿易摩擦將永無休止之日。

重要的一點是，這種貿易摩擦的激化，竟而對日本軍備擴張形成了一種推力。以1978年11月「日美防衛協力指針」為起點的日本軍事力的質的轉變（跨出專守防衛的範圍，積極分擔以美國為主導的維持國際秩序的責任，為此目標而實行軍隊的質變，及配合此一質變的戰力的加強等）。這本是美國為遂行其世界戰略所要求於日本者，而對日本的這種要求，隨着美國的「學生赤字」——亦即巨額的財政赤字和經常收支帳赤字的嚴重化，而愈來愈緊迫。

1985年8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一項國務院歲出權限法案的修正案，課總統以對議會提出有關日本防衛力改善情勢的年度報告的義務。這個法案被戲稱為「日本防衛情勢監視法」。

另一方面，日本為了緩和美國的強硬的貿易均衡化要求，做為政治性代價，接受了美國的擴軍要求。

伍、確保東南亞經濟圈的動力

西太平洋——東亞地區，一直到日本在第二次大戰敗降，是舊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與勢力圈。戰後日本的經濟力復活，再度開始對外「進出」時，本區域當然又變成了重要的商品輸出市場和投資市場。初期是纖維、雜貨、家電等勞

力密集的輕工業。接着在石油危機後是資源取向型的石油化學、煉鋁等資本密集型的原材料產業。最近又以汽車、汽車零組件等高度機械工業為主。這是三種型態的直接投資。

現在看看對亞洲NICs（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ASEAN（東南亞協會）的直接投資情形。

1980年末餘額對ASEAN是日本佔首位的39.7億美元（次位是亞洲NICs的19.8億美元，第三位是美國的14.4億美元）。對亞洲NICs是，日本第二位17.1億美元（首位美國的21.8億美元）。日本在西太平洋區域的直接投資的特價是，雇用極為低廉的勞力，從而獲取巨大的剩餘價值（14表）。

但最近以來，本區域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這些國家裡急速地成長了「輸出取向型工業」。並且，美國與這些地區之間的貿易也在快速增加之中。另外，因美國的尖端產業大都集中在西部，到了1981年，美國的太平洋貿易首度超過大西洋貿易。到了83年，兩洋貿易的差額甚至達到了314億美元。

為甚麼這些國家的工業化發展得如此快速？其理由是日本提供的高額貸款、技術轉移等形式的「經濟援助」，和美國對這些國家的製品開放了市場。這中間，當然也有圖使這些國家表現出資本主義體制的

「優越性」，做為鄰近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對照，並防止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等之政治性考慮在裡面。

亞洲NICs和ASEAN，說得上是美日兩國共同支配下的「勢力圈」。尤其是日本，提供高額貸款，把這些國家用債務束縛住，將其變成「金融的從屬地位」，同時也獨佔性地供應大量的中間財、資本財，把這些國家納入「垂直的國際分工」體系，在產業的從屬構造中，吸取巨大的利益。

1969年當時的佐藤榮作首相就曾放言說：「日本是亞洲經濟的盟主」，今天，他的話竟以更大的規模實現了。

但是，日本的這種支配體制具有基本上的脆弱性。

首先，這些國家都鄰接着蘇聯、中國、朝鮮、越南等亞洲大陸上的社會主義體制。美日兩國總是因着戰略上的需要，而企圖維持這些國家內部的反共體制，因此，必須經常扶助一些反動性格的政權來壓制人民民主運動。如此一來，這些地區始終擺脫不開民衆反政府運動的不穩情勢。

其次，這些國家的工業都是極端的輸出取向性。而其輸出的大部分都依賴美國市場。這種特異的貿易收支構造，造成對美的片面高額出超、和對日的片面高額入超（15表）。結果是，在美國的景氣上昇期，輸出增加達成高成長，但當

美國景氣減退時，其成長立遭挫折。加以對日債務的壓力，易於陷入經濟危機。經濟不穩常常是民衆革命運動的誘因，而革命一旦成功，日本的投資資源的大部分將被國有化。

因此，日本支配階層爲了防止如此事態的發生，以期能把巨大利益根源的西太平洋地域做爲日本的勢力圈加以確保，這樣的一份熱望，變成了響應美國分擔航路防衛，建設巨大戰力的軍國主義復活的內在動機。正是所謂的「商權招來軍權」。

日本一向把亞洲的軍事警察活動委任於美國，其本身則專心於經濟活動。但隨着美國財政危機的深化，日本在國際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增加，特別是對東亞的經濟支配既已發展到眼前的階段，當然不能一如從前，完全把這方面的權責交給美國。世界正由 Pax Americana (美國的和平) 時代轉爲主要國家連帶責任的時代。日本也正以「國際國家日本」的新態勢，準備接受帝國主義陣線中的責任分擔。

結語

日本國民中的大多數，對防衛費的增加是反對的。根據《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等大報的輿論調查，反對增加防衛費的比率是 60 ~ 70 %。不僅如此，連「日美諮詢委員會報告 (1984

年 9 月) 中也有如此的一段：

「根據波托馬克協會調查，日本人中的 45 % 主張防衛費應遵守甚至削減目前水準。只有 25 % 認爲應比目前增加。39 % 反對防衛力的規模擴大，只有 17 % 同意擴大。日本人中的 48 % 否定日本應增加分擔駐日美軍費用，同意增加分擔者僅佔 7 %。對安全保障問題，40 ~ 50 % 的日本人一貫認爲『無法理解』，而表明意見者中的大多數，反對增加日本的防衛任務……。過去數年間所呈現的令人不安的傾向是，雖然美軍在太平洋的佈置已有增強，但不相信『有事之際』美國會馳來救援的日本人日益增多。關於這一點，抱有悲觀想法者顯然佔多數。」

鑑乎此，吾人應該信賴多數日本國民的和平志向，努力阻止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復活強化的災難路線！

譯後記

在台灣，凡稍帶政治意味的世界局勢的評論文章中，經常出現「台灣結」、「中國結」這樣的字眼。這兩句話都有特定的語意和語感，反映着人們心目中極爲微妙而嚴肅的一種時代性難題的存在。

我們都知道，群衆心理中某一種情結的形成，其背後都有一定的歷史因素，具有複雜糾葛性的問題，使群衆既無法逃避，也一時難以做適當的認

識處理，所以才變成揮之不去的心理負荷。以如此的含義來看近年來台灣一般群衆的生活情態，我們將發現，除了上述的「台灣結」、「中國結」外，還有另一種更詭譎、更令人迷惑的「日本結」。

所謂的「日本結」，具體言之，是部分本省籍高齡同胞對日本的莫名的懷念，和不分省籍的年輕人對日本事物的盲目憧憬。這種「日本結」，一方面固然是時勢遽變中受到扭曲的歷史殘像，但更值得注意的，却是戰後快速成長的日本經濟對舊殖民地台灣的無情衝擊的結果。

「日本結」既爲非理性的心理壓力，對有關日本的認識或許斷，必然產生朦蔽和扭曲作用。鑑於日本與台灣之間的地緣、歷史關係、及戰後數十年來經濟文化關係的緊密，的確是值得我們特加留意的「時弊」之一。

好在有關日本現狀的剖析，其國內不令進步分子的深刻的自我探討，國際上亦因經濟霸權的震撼而出現了相當透澈的日本批判。這些都有助於解開台灣本地的莫名的「日本結」，而達到比較客觀的日本認識。

本文是一位日本學人的研究論文，主題針對着今日令多個人心神不寧的日本帝國主義復活問題。對上述台灣的「日本結」，也許有一定的清理作用。 ■

戰爭真的

庫頁島朝鮮人與台籍日本兵問題

太平洋戰爭前，日帝從殖民地朝鮮運送了4萬3000人的朝鮮人到南庫頁島，強迫他們從事煤礦開採及建築鐵路、機場、港口等各種勞役苦工。戰後，依據「雅爾達密約」，蘇聯佔領了庫頁島的全部大小島嶼，因韓國與蘇聯之間並無邦交存在，這些非自願意志到了異鄉的朝鮮人，也就是無法回歸祖國。照理，戰後的日本政府，無論以人道的、道義的、政治的各方面考慮，都有責任向蘇聯政府交涉，儘力協助這些望鄉的朝鮮人，按照他們的意願送還故國，然而，日本政府却來個裝聾作啞，相應不理。

同樣地，對於戰死或負傷的台籍日本兵補償問題，日本國會竟推諉財源困難，也一再



台籍日本兵

予以拖延。

台灣，曾經是近代日本對外侵略的一個原點；日帝不僅以武力侵略的手段，貪婪的掠奪台灣的資源，更將台灣人在所謂「天皇陛下的赤子」之名義下，藉著「與日本皇民一視同仁」的理由，強制地徵召了所謂「志願兵」、「義勇隊員」，一批一批地送到南方戰線，為天皇效命。然而，日帝在戰敗後，却對這些曾經為「天

皇」效忠而死或變為殘廢的台籍日本兵，視為投擲出去的石子，任憑風霜侵蝕或讓別人撿走。

對尚滯留在庫頁島的朝鮮人，日本政府同樣表示出一付事不關己的冷寞態度，韓國記者曾向日本首相詢問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中曾根回答說：「根據日本政府的要求，蘇聯表示那些人因為滿足於目前的生活，並無歸國的希望。」（1984、8、23、朝日新聞）一頁沾滿血腥的「昭和史」，就憑藉著這句不關痛癢的話，被政客毫不心虛地撕了下來。

殘留中國孤兒問題

然而對於另一個戰後責任，也就是「殘留孤兒」問題，日本政府却抱持著全然不同的立場，不僅認為這是一個「人

結束了嗎？

——戰後日本的反省

/ 王墨林

道主義」的問題，更是一個必須儘快解決的重大問題。

所謂「殘留中國孤兒」，就是戰時日本移民撤離舊滿州時，因軍部規定不准攜帶子女上船，許多日本移民不是把自己的子女槍殺，就是送給當地中國人扶養。把這些已長大成人的殘留中國孤兒接回日本的輿論一起，日本政府隨即公佈解決方案，包括：孤兒的養父母、配偶、子女等人的扶養費由政府與民間基金會各負擔一半，及必要時由政府負責養父母來日定居等優厚條件，充分顯示出日本人特有的工作效率。

同樣是屬於「戰後責任」問題，日本政府為什麼單獨對「殘留中國孤兒」如此積極的採取解決措施，而對亞洲諸國的戰後責任，却置之不理呢？據日本知識份子的分析，造成這種差別意識，主要來自於日本社會早已根深蒂固的「脫亞

入歐」信念。

日本人的「脫亞入歐」執念

所謂「脫亞入歐」，出自於被日本人喻為日本民主主義之父的福澤諭吉的政治理論。

福澤諭吉所創立的慶應大學，是日本當今一流學府，他的事蹟也被編進歌舞伎中流傳著。此人雖被奉為西歐民主主

義思想的引介者，但他本身所創造的政治理論却充滿霸道思想；明治18（1885）年在他創辦的《時事新報》上，他所發表的「脫亞論」最是以代表這樣的觀點，文中提到一

「日本的國土雖在亞細亞東邊，其國民的精神却已脫離亞細亞的陋習，進入了西洋文明，……我們對於與鄰國共同將亞細亞興盛起來的信念，應肯定認為是不可能實現的，寧



「脫亞」論者福澤諭吉

可脫離它們而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切不可為支那、朝鮮是鄰國，就對它們格外客氣，其實，應該以像西洋人對待它們的態度去對待它們，我們日本若跟這些鄰國接近的話，西洋人亦將視我們為與它們一樣的惡名昭彰；對於亞細亞的惡友，我們是絕對要謝絕往來的。」

如此充滿排外主義及優越感作祟的「脫亞入歐」論，竟成為以後支配日本政治輿論的起點。直到今天，日本喊着「脫亞入歐」的聲音仍然不斷，只不過以一個新創的名詞來代替，那就是「西側一員」（註：其意為日本乃西方國家的一子之意）。

慶應大學飯田鼎教授在他新著的《福澤諭吉》一書中的結尾，感慨地寫下了這段警語：「現在，我們已根據福澤的理想達到了『西側一員』的目標，但是否也將像亞細亞的孤兒一樣，失去了自己的根呢？果真如此，今天我們要拋棄依然支配着我們的一百年前的『脫亞論』，就是絕對必要的事實了。」（1984、3中央公論社·《福澤諭吉》·P. 238）。

鈔票上的福澤與伊藤

台大許介麟教授在所著《日本政治論》一書中，也提到：「日本的近代史，如果以巨

視的觀點來觀察，可以發現是『文明開化』和『侵伐竊道』互為表裡進展。」若說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建立了日本對所謂「文明開化」的歐美一面倒的政治理論，則伊藤博文乃是將日本所謂「富國強兵」政策落實在侵略鄰邦的國家膨脹主義之上的實踐家；合併朝鮮，侵佔台灣都是他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展史上的赫赫顯蹟。大概也因為這樣，日本政府於1963年發行千圓鈔票時，先將伊藤博文尊容印在上面，1984年發行新鈔時，復以福澤諭吉換下了聖德太子，似乎表示後代日本人對福澤定下日本躋身「西側一員」基礎的感念情意。

日本研究亞洲問題專家田中宏教授，曾說：「有一位亞洲留學生問他，日本人是哪根神經不對？怎麼會把屠殺朝鮮民族的劊子手印在紙幣上呢？這位留學生的質問使他更進一步思考到日本「戰後責任」的問題；田中教授並且認為，亞洲人才是這段歷史真正的審判者。」

然而，前年在亞洲各國發生對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的抗議運動，並沒有使日本政府得到應有的教訓，直到目前，日本政府仍然以各種巧妙的手法，在掩蓋日本軍閥犯下的滔天罪行。

中曾根上台後，被他稱為「戰後總決算」的右傾政治路線，有計劃地一步一步對歷史

做出翻案的工作，首先是「靖國神社公祭」問題；接着，他躊躇滿志地宣佈要把日本列島武裝化，成為所謂的「不沈空母列島」；他底下的自民黨高級幹部也在公開主張，復活戰時「天皇絕對主義」的「教育勅語」；到此已很清楚地看見軍國主義的幽靈在蠢蠢欲動。

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人士一時也隨着「戰後總決算」的右傾政治路線，水漲船高起來，各家各派的翻案文章紛紛出籠。

鼓動戰爭的右傾化電影

1983年6月，在日本公開放映的「東京裁判」記錄影片，把日本軍閥製造的侵略戰爭辯護為抵抗歐美勢力擴張的自衛戰，更把東京大審判解釋成為「勝者對敗者的報復」。為了製造聲勢，還把當年參加審判團的荷蘭代表請到東京來現身說法；這位碩果僅存的法官，當初在東京大審判所維持的立場是主張首相廣田弘毅等五名戰犯全部無罪。

1984年國營電視台NHK的年度連續劇：「兩個祖國」，主題在於強調美日開戰之時，美國人對於日僑的差別虐待，而渲染出日本人在戰爭中的受難形象。因故事誇張過甚，經在美日僑的抗議，即被美國日本語電視台中止放映。

與此同時，電影界所拍的一系列讚美軍國主義電影，「

二〇三高地」、「大日本帝國」、「聯合艦隊」、「零戰燃燒」等片也一一出籠，都是外面包上「反戰電影」的彩紙，內部却包藏了「在心的黑暗處潛伏著一股國家主義和靖國精神交織而成的狂氣，終因無法克制，而使電影噴出了鼓動戰爭右傾的情念」。

「南京大屠殺虛構論」的登場

除了利用「寓教於樂」的手段外，露骨一點的，就是在各種右派雜誌上展開以「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為中心，對南京大屠殺、蘆溝橋事變等血腥歷史大做翻案文章。

東京大學教授衛藤藩吉在1984年6月號的《正論》雜誌上，竟然將蘆溝橋事變發生的原因，歸諸於「日華雙方的誤解」，他進一步說明：

「關於昭和12年7月7日夜裡，在蘆溝橋發生的砲擊事件，一般認為日本軍先發砲的說法是錯誤的；只不過是爲了蘇聯作戰而實施的夜間演習，士兵連鋼盔也沒戴，雖然是實彈，只不過是普通程度的演習……」

衛藤教授並強調，當時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和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以下的日本軍人，都一致抱著不擴大戰事的主張；他的觀點輕而易舉地把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本質完全抹殺掉。

以《文芸春秋》爲主，衛星雜誌《諸君》爲輔，另外配合小報《世界日報》，及小雜誌《月曜評論》、《世界與日本》等組合而成的「文春派」，自1984年起，集中火力展開對「南京大屠殺」的大翻案。甚受中曾根重視的作家山本七平，早在《我心中的日本軍》（文芸春秋1975）一書中提出了「南京大屠殺」是中國單方面虛構的一個歷史懸案這樣的說法。

中曾根的右傾政治路線開始登場後，日本右翼份子開始對山本七平建立的「南京大屠殺虛構論」加以擴大構築，並積極地宣傳倡導。另一面，肯定「南京大屠殺罪惡論」的「朝日派」（以「朝日新聞」及「朝日雜誌」爲主）也展開反駁，甚至派出記者遠至南京實地調查。

靖國神社的官式參拜與軍國主義精神復活

中曾根率領閣僚到靖國神社參拜的行動，與近年興起的爲日本侵華史翻案的行動，兩者之間是否爲不謀而合，或是有意的相互呼應呢？這是非常值得去注意的。但是，從自民黨在1984年4月終於宣佈：「關於靖國神社公祭化與現行憲法並無抵觸，對其所有的疑問應被否定」，可以看出從修改教科書逐步發展到「靖國參

拜合憲論」，並不是個別存在的單一事件，而是前呼後應，沆瀣一氣的策略路線。

自民黨並舉其「首相到靖國神社祭悼爲國犧牲生命的戰歿者，本是應當的。」爲理由贊成中曾根的行動，而這些「爲國犧牲生命的戰歿者」到底是哪些人呢？據茨城大學教授大江志夫所著的《靖國神社》（岩波，1984、3）一書中之記載，包括甲午戰爭，出兵侵佔台灣、義和團事變、濟南事變、滿州事變及中日戰爭等一系列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喪生的日本軍人。還包括最受矚目的A級戰犯東條英機在內。一位研究宗教政治學的學者村上重良曾爲文提到：「若是靖國神社走上國家化的第一步實現的話，也就是國家神道的政策再一次束縛住日本人的心，並使其漸漸卑屈下去，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戰爭還沒結束

日本爲什麼非但棄「戰後責任」於不顧，反而處心積慮地通過各種手段，傾全力爲血腥的「昭和史」翻案呢？是否明告世人：戰爭還沒有結束？日本政府爲宣傳「歸還北方領土」運動而設計的廣告詞「北方領土歸還之日才是日本和平之日」這樣帶有幾分惻隱味道的詞句，令人看了不由背脊發冷。兩顆原子彈真的炸不醒日本的帝國主義迷夢嗎？

特別企劃 之四

石塚友子

——管理社會



石塚友子

訪問記

中的性別歧視

/ 林默

問：請妳談談女性參加社會運動，所面臨的問題是否跟男性一樣？

石塚：不管男性或女性，同樣面臨著來自於支配階級最嚴重的壓力。因為我參加的新左翼組織，不是屬於合法的共產黨或社會黨，所以，我們都有隨時能被逮捕的心理準備。此外，內部矛盾才是最大的問題！

男性在組織裏都有一定的位置，女性都被區分為兩種。一種是幹跟男性一樣的策劃、行動工作的女性，另一種則是做些燒開水、煮料理、打雜的傳統女性工作。從這裏可以看出，組織還存在著男性的偏見，每個男性在組織中都有一定的位置，而女性的位置却要經過男性的挑挑揀揀，要經過挑揀來的，我不願做一個讓男性來評價的女性，所以，我退出了組織。

問：是否因為男性在組織內所佔比率較高的原因？

石塚：即使自以為進步的共產黨、社會黨，都有這種男性中心主義的現象；若是有十位領導幹部，女性頂多也只佔四位，不可能到達半數。

社會黨黨魁由女性繼任，並不表示黨內對女性地位的重視，因為正好碰上左、右兩個派系在搞矛盾，新任女黨魁因人緣不錯而漁翁得利，根本就是權利鬥爭下的產物。

現代社會對婦女的役使與榨取

問：能否具體談談妳參與的運動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石塚：主要是反對政府剝奪女性獨立自主地位的「優生保護法」等政策。女孩子從小就接受做一個好母親的教育，如：戰前富國強兵政策，即使在物資極端惡劣的條件下，也

強迫女性有生產優良國民的義務，若不幸生出畸形兒，國家則不負照顧之責。一方面利用女性生產能力以達強兵政策，一方面又百般歧視女性！生產畸形兒不是女人道德上的缺陷，而是男女雙方都要負責的生理因素。

這個問題目前仍反映在現行政策上；政府利用標語等宣傳物，唆使婦女在胚胎二月後，進行胎兒檢驗，若醫生指出腹內胎兒不正常，標語及醫生的道德宣導力量，都促使婦女產生罪惡感，因而自動要求醫生施以墮胎手術。這個問題漸漸演變成醫德不好的婦產科醫生跟製藥公司或什麼醫學院機構勾結，故意謊稱胎兒不正常而拿下胎兒，甚至連子宮也摘除。拿下的胎兒可賣給製藥公司，摘下的子宮可提供醫學實驗；一個女人的身體被四面八方面來的暴力所榨取。

我們成立關於這個問題的

研究組織，幫助女人了解自己的胎兒，另外呼籲社會重視殘障兒童救濟；此外，我對於反戰、反天皇、反核等團體也積極介入參考。

軍國主義對人口結構的控制

問：台灣也有賣胎盤給日本的新聞發生。根據妳的實踐，能否告訴我們，應該從什麼觀點來看兩性矛盾，才能正確對待這個問題？

石塚：目前日本雖實施「男女雇用平等法」，以薪水來說，表面上規定不能歧視女性，實質上因起薪不平等被容許，而造成即使以後加薪也永遠落後於男性的現象。白領階級的職業婦女可以跟男性一樣出差或當主管，沒有這種能力的女性則永遠屈居男性之下，女性的生產力被區分成不是最高的少數，就是最低的大多數，少了中間階層，甚至還有懷孕後必須辭職的規定。

我肯定社會問題反映經濟結構的矛盾這個理論，女性被壓迫實來自於經濟因素。

問：早期婦解運動比較單純，現在的婦解運動似乎面臨著客觀科學文明環境變化而產生的新課題。

石塚：是的，日本除了自民黨，沒有任何政黨面對這個新課題，我們的組織也在人口、生殖等問題上進行研究，以對抗自民黨的新政策。譬如，

從人工受精延伸出來的問題，也是人類的新課題，精子提供者，子宮提供者及養育者，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勢必影響哲學上的新倫理觀之產生。以前不能生育的女人受到反面評價，這是舊社會女性的悲哀，現在不能生育可以改為人工受精，女人應該從母親的地位來決定自己的道德觀，若只是任憑政客、醫生發展以男性為觀點的單方面意見的話，女人是無法解脫永遠被控制的命運。

聽說日本慶應大學醫學院已發展出可以將精子分離，以控制生男育女的技術，這樣一來，男女自然平衡狀態將被破壞，尤其政客們一旦插手干預控制人口，按照他們所希望的，男性比率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女人勢必成為少數民族。

性別歧視的科技化管理

問：在以男性為中心發展的社會，它的科學文明也呈現為男性觀點服務的意識型態，日本科學技術愈進步，這樣的意識型態似乎也愈清楚？

石塚：人口、生殖等問題，表面上看是為了優生，實際上却是企圖利用健康的男性，做為未來軍國主義的侵略資源，這也是我個人最感到恐怖的。

科技日趨複雜化，研究機構也跟著愈來愈秘密化；我們女人感到非常沒有安全感，不

知道他們對女人身體的控制，已實驗到什麼階段，所以，我們的組織從各方面搜集有關資料，做出對於各種可能性的研判。雖然我們的組織可以公開活動，但是到研究機構要求看什麼新資料，還是為法令禁止的。

反體制運動的重大課題

問：日本政府對人民的管理手段既如此周密化，反體制運動如何突破巨大的壓力呢？

石塚：日本政府對工會破壞是滲透到內部搞分化，像最近發生的國鐵工會因內部分化而形瓦解，我回去後大概就看到已成定局的悲劇；國鐵工會是三大工會之中勢力最大的，它的瓦解對其他工會有一定的影響。

國鐵連年赤字引起朝野重視，政府認為繼續以稅貼補虧的經營方法，對納稅國民無法交待，工會則認為經營不善導致虧損，不能因赤字而放棄人民財產，工會並呼籲國鐵員工一致抵制私鐵化政策；政府堅持要把國鐵賣給私人資本，成立八大鐵路公司，所以，一方面利用職權把反對者調任閒缺，每天只是拔草掃地，讓他們自萌退意，一方面號召反對者只要走出工會，保證安排到八大鐵路公司繼續工作，否則就失業。參加工會的員工在車站前舉行絕食抗議，也無法撼動



石塚友子

體制一根汗毛的。

問：國鐵工會在日本國內得到正確的評價嗎？

石塚：來自輿論的迴響正反各佔一半，有的主張私鐵化，因為看到其他私鐵的確經營得不錯，有的主張不能輕言放棄人民財產，使鐵路成為獨占事業；此外，因為國鐵廢止後，國鐵車站及倉庫因占據交通中心地段，將吸引資本家投資生財，所以，他們也在大力鼓動私鐵化。

日本農村的一般狀況

問：最後希望你能談談日本高度成長後的農村狀況。

石塚：我出身於東北部的農村，自然對農村的問題也比

較關心些。目前自民黨對農民並沒有太大的照顧，但支持自民黨的農民仍有百分之七、八十，一方面，反共思想教育成功，農民以為社會黨執政的話，私有地將喪失，土地全部國有化，而自民黨再怎麼不好，土地還是自己的；另一方面，農民目前只靠農作生活已不多見，若是地區有工事，除了農作還有打工賺錢機會，而工事承包公司與地區國會議員大都相互支持，前者藉此賺錢，後者藉此收攬人心，各取所需。

此外，近因則是自民黨不敢全面實施貿易自由化政策，不管任何一個政黨，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的話，都將遭到農民的抵制。

「農協」（譯註：農會之意）以現代企業化的作風鼓勵

農民向「農協」貸款翻修房子或買機器，但他們的農作收入不足以還清這些貸款，必須靠到大城市去做工賺錢，如：北海道的海底隧道工人，東京一些大廈的建築工人，都是東北部來的農民。

現在日本的大工程愈來愈少，有人擔心這些剩餘的農民勞動力到底要往何處去？

我在家鄉的初中同學，有百分之卅升高中，百分之五升大學，其他的必須謀職維生，當我回到家鄉，我都找那些不能升大學的同學談話，我的運動不只在城市裏，也想落實到鄉村，使那百分之五的大學生不會成為他們眼中的特殊份子。

問：謝謝你接受〔前方〕雜誌的訪問。 ■

台灣土產

——一個日本遊

果然被耍了

去年夏天，我偕同友人一起到台灣旅行，這也是我第一次出國。本來計劃到了桃園機場，直接趕到台灣友人的家；但是走出稅關，準備搭乘機場巴士時，有一位中年男子一直注視着我們，並且用日本語告訴我們，他是受託來接朋友的，我也告訴他，我們在台灣有一位朋友。他問是誰？我回答是A太太。他說，就是A太太託他來接人的。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張名片，我並沒有看到A太太的名字。搭上巴士，他很親切地跟我們交談着，還請我們抽煙，然後他說，今天A太太工作到很晚，倒不如先就近到我家飯店過夜。我們對他的話雖有些懷疑，但寧願信以為真。

我們一直防範不要被那位中年男子耍了，住進一家昏暗的飯店後，打電話向A太太詢問，才知道自己果然被耍了。趕到櫃台去，已不見那位男子，只有對自己的不夠警覺感到

生氣。

那個晚上，A太太到飯店來接我們回她的家。坐在計程車裡，一路上我們都在談這件被耍的事，A太太和計程車司機為我們抱不平。當話題告一段落，計程車司機突然用日本語說：「日本是個好國家呢！」還說他的兒子目前就讀於醫學院，準備要到日本去深造。他說了好幾次，「日本是個好國家呢！」A太太也提到，她的先生曾當過台籍日本兵，一直想到日本去，住住鋪着榻榻米的日本式房子。

坐在計程車裡，聽到A太太和司機所談的話，原先對被耍的事所感到的怒氣，已漸漸消失，同時卻升起一股複雜的感觸……機場那位中年男子的笑臉，在計程車裡一直說着「日本是個好國家」的司機的笑臉……雖然曾聽過台灣人從戰前就偏袒日本，但我還是懷疑那位司機為什麼一直要說曾經壓迫過台灣人的日本國是個好國家呢？也許只是一句客套話吧？或者曾在他的身上發生過

什麼特別的事情？對我來說，實在無法理解台灣人面向我的笑臉到底是真是假？大概因為我是日本人的關係吧？！

有關台灣歷史的一個視角

從中國大陸移民到台灣來的原住民，在日本殖民地時代被稱為「高砂族」，今天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高山族」。荷蘭人曾經統治過這些原住民。要到漢民族移民增加後，荷蘭人開始將台灣殖民地化。後來為了應付因大陸的王朝交替而大量流出的難民，荷蘭人才覺得充份經營這塊殖民地是有必要的。直到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奪得對台灣的統治權，才進一步將移民本土化。這以後台灣又從清朝的統治轉到日本的統治。台灣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統治階級轉換和移民的歷史。若再更深一層地探索，甚且是統治者強迫原住民歸化的歷史。

在台灣住的人，每當統治者轉換之際，都要面臨一次語言、生活形式及社會經濟制度

客的台灣見思錄

／ 大槻耕太郎
翻譯 / 南雲海

的改變。統治者張開一張大網，把人們甚至微小的生活方式都要網住；這樣才會使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構造變得不甚透明，把人們編入所謂「國家」體制之中。而這種實為「強制」的行為，卻變成了台灣人的「擬似自發性」。

然而，統治階級的權力可以伸展到人們公共生活的每個角落，卻不能深入人們私有的領域：譬如深層的價值意識。因為統治階級利用武力或意識型態，只為了要使被統治和統治階級之間呈現出擬似的均質性的結合。然而，對自我固有生活的愛眷，使人們產生力量對統治階級不斷展開鬥爭。由此產生的憤怒，即使沉澱在人們價值意識的深處也不會溶解。這種情念，不管在什麼地方都被隱藏在日常之中，有時還會以暴力的形式出現在表面上。台灣歷史上所流的血，是否跟這樣的暴力有關係呢？我們訪問的霧社，何嘗不是台灣歷史上所發生的無數暴力事件中的一座舞台呢？

到霧社去

在A太太家住了三天之後，我們決定到霧社一趟。從台中坐巴士進入霧社，約要兩個鐘頭。台中與台北一樣，空氣實在污濁不堪。到處都是車子和摩托車。我們在日本已習慣這種壞空氣，還不挺在意，但是到了霧社，吸了幾口清新的空氣後，才注意到都市環境的污染程度已經很厲害。

霧社，在旅遊指南的記載裡，只是一座小小的村落。郵局、理髮店、飯館、雜貨店等都聚集在一條街上，從這條街往前走上十分鐘。就看到一座刻着「霧社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立在那兒，「莫那魯道烈士之墓」也在同地，墓碑上面刻着莫那魯道發起霧社抗日起義的事蹟。

我在這裡看到了日本對殖民地統治手段的一種「原理」。在「大東亞共榮圈」、「皇民化」、「一視同仁」等號召下，表現的是一種「愛」，卻

不見提及「尊重人格」或「同情」。因而這些號召也不過是日本對殖民地人民尋求「溝通」的單行道；當然也是不能被拒絕的。帶刺的鐵絲網於是憑空架起，手中無寸鐵的人於是被屠殺，派出所不知不覺中建了起來，學校也蓋了起來，耳朵聽到的與嘴裡講的話也是被迫學來的……。總之，對原住民來說，當然不願意闖進自己居住地的日本人在這土地上做這些事，因而把日本人「存在」的這個事實當作憎惡的對象。這個對象即使大談要如何「愛」，或主張「尊重人格」，也無法證明自己的「存在」是正當的。反過來說，若那樣的「存在」被證明是不正當的，則只有更進一步提高了原住民的憎惡感。莫那魯道及參加霧社起義的原住民。對日本人所採取的暴力反抗，就是為了要把日本人的「存在」從視野中抹消。這不是一種無謂的衝動，而是清楚地確認到各種異同「存在」之後才決定的「衝動」。

「自我認識」和「自我中心」

霧社之後，我們去了南部的大城市——高雄。還記得她是一個熱得令人全身不得不癱瘓的地方。我們在那裡會見了兩位台灣青年。一位已改了日本名字，不久即歸化日本籍；另一位則拿到日本的永久居留權。他們兩位出生的年代和我很相近。在對談中，才知道他們在高中時代就被家人送去日本。我們談到日本人、日本人的台灣觀、台灣目前的政權、及金門馬祖的現狀等等。我們用日本語交談，表面上看來，就像是日本人彼此在交談一樣，我彷彿人猶在日本一種奇妙的感覺油然而生。

與他們交談之中，我想到「自我中心」的問題。通常具有自我中心性格的人，都會受到排斥，這是極為平常的事。為什麼與他們談話間會突然想到這個問題呢？這裡想到的「自我中心」跟「自我中心」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法西斯」多少是不同的。在日常的小事裡，都會潛伏着這種「自我中心」。譬如：當我看到鄰桌的台灣人吃東西的動作，或巴士司機駕駛的動作時，或飯店服務生笑着向我們說：「沒有帶女人嗎？」時……等等。

離開自己習慣的環境、文化、生活習慣，跑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可能對當地人的行

動都感到奇異。這是一種「自我認識」的方法，也是一種「認識他人」的方法，但結果往往是否定了他人，肯定了自我。但我要說的不是這種肯定自我的「自我中心」。而是跟兩位台灣青年談話時，我反而覺得似乎遠離了「自我認識」和「自我中心」。然而，比起初來此地不過旅行十天的我，那兩位台灣青年似乎更加遠離了他們的「自我中心」。

我的心底也有一股小小的「自我中心」的動力，卻不是為了「支配」他人。所謂「差異」是指「優劣」：劣的一方就變成優的一方「同化」對象；「抵抗」變成所謂的「野蠻」，成為被制裁的對象，而所謂「優秀」指的是「柔順」，是獎勵的對象。所謂以「自我中心」性建構的「支配者」，另一個意思就是「文明人」，他人應該被自己「同化」的。例如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的台灣，社會是由日本人——漢族系台灣人——高山族這樣的序列結構而成，所謂「同化」就是拉到日本人跟前的力量。不能不注意的是另一種拉到高山族跟前的力量，那是「同化」的反作用——「異化」。其實這個「異化」作用應該解釋成「對中心者的怨恨」才符實際吧？

「歷史情結」

台灣人在日本殖民地時代受到差別待遇，並沒有從「祖國」——中國獲得任何援助。戰後，日本人走了，國民黨來了，同樣恢復到以前的暴政。二二八事件使國民黨遭受到台灣人民大規模的反抗，但台灣人民也遭受到徹底的制裁。

研究今日台灣問題的若林正丈先生，在他的論文〈台灣的選舉和民主化〉（原文登於《中國研究月報》1984年9月）中提到：

「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產生深深的挫折感，和對一般外省人的反感，進一步對『中國』產生疏離感。」

同時，他也認為，台灣人的二二八歷史情結，相對也與外省人的歷史情節相互咬合在一起。

台灣人，除了高山族和外省人一樣都是漢民族；日本戰敗，把台灣還給中華民國，曾發生過如下的情形：

「在不安和期待的異樣感之中，歡迎『祖國』的台灣民眾，擠得水洩不通，並且高呼『歡迎親愛的同胞！』口號。他們從五十餘年的惡夢中解放出來，現在投入了『祖國』溫暖的懷抱……」（原註《台灣四百年史》史明著P. 474）。

台灣原住民同時也從異民族日本人統治中解放，似乎從自民族中國人處得到「愛」的待遇。但是，這種「愛」是站在一方的立場來說的，「自我中心」的國民黨要讓原住民歸

化，這好像是不必花時間的事。國民黨接收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有人說死了1萬人，也有人說3萬人，這可以說是因國民黨的接收政權的腐敗自然引發台灣人的暴力反抗，也終於轉換成爲台灣人的「歷史情節」。在二二八發生的時候，有的台灣人站在街上等着路人通過，若說不出日本話，即遭一頓毆打。

前面提及，那位計程車司機所說的「日本是個好國家」以及A太太的先生想要去日本住舊式的榻榻米屋子，我不能完全接受。我想，他們會覺得日本不錯，這是不是台灣人對於已失去的本來應該持有的固有歷史感所表現的寂寥之意呢？他們不願意肯定現在的台灣，他們生下來所看到的台灣是日本，那時，他們是以日本人的身份在這個島上生活的。現在當他們出人意料地從口中說出日本是個好國家的話，其實他們心裡所想的日本，並不是現在我住的日本，也許就是現在所看不到的「自己的台灣」？

台灣人和日本人的關係，有如高山族和台灣的關係吧！今日台灣被稱爲新興工業國，因爲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生活豐富，台灣人和外省人，或漢人和高山族的對立至少表面上已看不到。但是，對於固有歷史感已被奪走的人們，當他們的心裡，連疏解的方法都沒有的時候，任憑經濟再怎樣高度

的成長，平均所得再怎樣提高，這種鬱悶是絕對不可能消失的。

日本人曾經把台灣人的固有歷史感奪走，今日卻沒有付出任何補償（當然，補償的代用品是沒有的）。

「二十一世紀」時代的來臨

隨着日本戰敗，亞洲各地也展開戰爭審判，許多朝鮮人、台灣人的日本兵都被判成戰犯。他們在日本皇軍的隊伍中，永遠站在最末端，但他們在亞洲各地的日軍佔領地，卻是處於跟當地住民最密切接觸的位置。他們隨着戰爭結束，可以說是掙脫了日本的控制，卻絕沒有想到會成爲戰犯。

戰前被強迫做日本人的朝鮮人、台灣人「戰犯」，因爲戰時是日本人的身份，戰後不能不被判刑坐牢；戰時那些喪失生命或負傷的朝鮮人、台灣人，戰後卻因爲不是日本人，而得不到任何補償。

我們騙了曾被強制「皇民化」的亞洲人嗎？這次在台灣各地旅行，遇見許多用日本話與我交談的年長的人，他們幾乎都是笑臉迎人，而當我面臨這樣的的笑臉，卻不由深陷在迷惘之中。當然我是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日本」這個國家曾經存在着，現在也繼續存在着，他們那樣的笑臉似乎意味着沒有看破日本的騙人行徑，

卻我是不能接受的。許多像我這樣在戰後出生，在富裕的生活中不憂不慮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好整以暇地以旅行者的姿態出現在台灣各地，而竟對日本應該負起而沒負起的責任，一點都沒感覺到壓力，毋寧說明了今天日本和亞洲的關係。

有人提出「廿一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的口號，這說法主要是針對亞洲的經濟成長而提出。在先進國家進入低成長時期，亞洲諸國，尤其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卻持續地高成長。此外這數年來，日本一直被要求扮演「環太平洋協力」的主要角色，負起提供亞洲各國貸款、進口亞洲各國製品的責任，所以也有日本應該成爲「亞洲諸國的成長軸」的說法。

然而，我在前面提到日本與亞洲的關係，現在又提到日本成爲「亞洲諸國的成長軸」，這兩種關係，表裏是否一致呢？其實這些都是明治以來的日本，在一貫所實行的富國強兵，脫亞入歐政策下的姿態。

二十一世紀，可能是亞洲的時代，但不能忘記的是：到了廿一世紀，日本若離棄了被他所利用過的鄰近諸國，那個時候，也就是日本真的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的時候了。

個人以爲，一個裝出虛偽笑臉的「日本」，面臨廿一世紀的到來，將會開始感受到愈來愈沉重的壓力。 ■

我的反日

作者簡介：1918年出生於台灣台南州東石郡鹿草鄉（今嘉義縣鹿草鄉）。1937年10月，被日本人強制徵召到中國大陸參加中日戰爭，因目睹「南京大屠殺」及日軍殘殺中國人民的景像，不甘為虎作倀而逃離軍隊，回到家鄉又被通緝，只好再逃到日本。日本戰敗後，他在東京開設中華餐館，常常出錢出力促成送還中國俘虜及骨灰的運動，目前仍積極從事各種中日友好活動。

「懷柔和壓制」政策

從1931年滿州事件發生之後，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手段也從「壓制」政策轉變到「懷柔」政策，一直到1945年戰敗前都沒有變。所謂「懷柔」政策，並沒有離開殖民地政府

對台灣資源收刮及對台灣農業榨取的主要政策。當時的台灣農民即使早上三點起床耕作，到晚上八點才休息，為了應付每個月的重稅，及各種巧立名目的罰金，白米飯都沒得，只能吃些「蕃薯籤」而已，這種被壓榨的慘況，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

1931年，台灣總督開始實施皇民化的「懷柔」政策。一方面加強收攏甘為日帝利用的台灣人，不但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成為日本貴族院議員，或總督府評議議員之類的名紳，也可以將他們吸收進高階如：刑警特務的管理體制之內，與日帝合力壓榨台灣人。相對地，也有台灣的留日學生為了拯救台灣人民而組成民主思想啓蒙運動的團體，如：「台灣文化協會」。他們利用暑假回到台灣，在各地舉行要求台灣民主化的演講，並且更進一

步組織勞動工會，向台灣總督府要求台灣自治化，於是在台灣農民及學生的結合下，全島展開了要求民主化、自治化的運動。

當時日本政府 and 台灣總督，面對滿州事件發生未久，對於台灣人的民主運動採取了極為強烈的壓制，留日學生和文化協會會員不是被處以死刑，就是被判終身監禁，也有不少人逃到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各國。

「皇民化政策」的實行

皇民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禁止說台語及漢文教育。小孩子在學校說台語，即遭受體罰，大人說台語被警察聽到，即課以罰金。我在小學四年級時，因說台語被日本人校長懲罰，而與他爭吵。在當時很難考進的嘉義中學讀一年級時，

鬪爭證言

／ 林歲德
翻譯／ 蕭文山



（林歲德氏 八一·八·一一）

也因說台語被懲罰而與日本人老師爭吵，終至退學。只好去接受早稻田大學的通信教育，父親希望我能去考「台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將來當個醫生或藥劑師。父親教育我非常嚴格，白天我在學校讀書，晚上在家裡學漢文，有時實在太疲倦而逃課，被父親知道就綁起兩隻手用竹鞭抽打。早上三點起床背誦四書，晚上臨睡前背給母親聽，即使錯了一句，立即被母親指出，她的記憶力實在驚人。

日帝一邊對中國進行侵略行動，一邊更澈底的推行皇民化連動。規定台灣人膜拜的神佛偶像都要燒燬，而掛上日本「天照大神」的字軸，強迫台灣人敬拜。另外，還強迫改日本姓名，及強迫接受「神國日本」的歷史教育、軍事訓練、義務勞動、國防獻金等之皇民化政策。

從皇民化到強制徵兵

日帝一心想要併吞中國，而國內無法提供充份的兵員與物資，於是1937年10月開始，在台灣徵召台灣人日本兵，我就在那時被徵調去大陸參加「漢口攻略戰」。1938年1月10日，部隊在上海登陸，那時候，「南京大屠殺」正進行到最高潮時，我被編進掃蕩南京的一個部隊。我在村子的一座房子裡，發現到有一位老太婆抱著幾個月大的嬰孩藏在角落裡，老太婆向我叩頭求饒，我看到她的臉很像我母親的臉，於是，我去誘導正在隔壁搜索的松下上官離開這座房子，突然嬰孩啼哭起來，松下上官跑進房間，將老太婆逮捕，同時打了我一記耳光，打得我眼前金星直冒。他怒吼道：

「為什麼不逮捕他？」

我回答：「路都走不穩的

老太婆和小孩子，對我們不可能做出什麼敵對行為，殺了也沒什麼用。」

松下上官說：「老太婆會跑去通風報信，小孩子長大了會去當八路軍。」說完抽出武士刀將兩個人都殺了。

南京城內不必說了，城外的河流一片紅色，所到之處，埋葬屍體的土堆處處可見，這個慘狀真如人間地獄一般。

松下上官的殘虐性格，和看到慘死的中國人屍體，使我開始深入地思考一些問題。我在台灣接受「神國日本的聖戰」教育，就是指的這些景像嗎？同樣是人啊！具有五千年世界古文明的中國人，為什麼會遭受如此殘酷的待遇？腦子浮起父親對我說過的話：「你要做一個搞科學的人。……現在中國像樣的政治家沒有一個……要教中國和台灣，只有科學……」。

決意反戰脫走

好！我決定離開這群日本惡魔，我身上流的「血」跟被慘殺的中國人是同樣來自一個民族的，我必須要反對這場戰爭，於是開始計劃逃離部隊。

1937年10月，漢口淪陷，我們的部隊奉命轉戰南洋。軍艦先把我們送回台灣，休假一週，我看到船駛進高雄港，心像鳥一樣飛躍起來，總算回到了可愛的故鄉。

我走進懷念的家門，站在門口看到母親的背影，我大叫一聲：「阿娘」，眼淚就一湧而出，我們母子抱著哭成一團，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喜極而泣的經驗。

沒想到經過一夜快樂的全家團聚後，第二天母親開始發高燒，四天之後因急性肺炎病逝。忙完了母親的喪禮，三天後，父親也患了急性肺炎病逝，我的淚一直沒有停止過。表哥擔心我的身心無法負荷這一連串的連續打擊，把我帶到關子嶺溫泉附近他的鳳梨園去休息。在第五天的風雨夜裡，弟弟上山來找我，心有餘悸地說：「警察拷問我，要知道你的去處，你到底是要回部隊，還是逃亡呢？趕快做決定吧！」

我聽了立即回答：「逃到東京去！」弟弟要求我也帶他一起走，他說：「要死也死在一起吧！我到東京去可以半工半讀。」

當夜我帶著弟弟下山，早

上五點鐘到了姑媽家，想向她借一點旅費，姑媽大為生氣，「你們怎能如此不孝？父母才死去兩個禮拜，就要跑到東京去玩？」我只得據實以告，姑媽才知發生如此大事，遂把錢借給我。我帶著弟弟趕到嘉義車站，已是早上九點半。我們搭上快車直奔基隆，然後從基隆港乘坐「高砂丸」到達神戶。

在日本的苦鬥

輾轉來到東京，雖然許多工廠都在招募工人，但都表示「台灣人不採用」。最後，好不容易在川崎一家電氣公司謀得一職，弟弟也歷盡艱辛在市谷車站前的明治牛乳屋找到送貨工作。我們同時半工半讀，弟弟畢業於日本大學工學部電氣科，我也畢業於帝國工業學校航空機科。

1945年8月15日，我從收音機裡聽到「玉音放送」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大為驚喜，高喊「萬歲」，對面住的一位消防隊長官過來質問我，兩人吵了一架。日本戰敗是殘虐成性的日本人自食惡果，我終於盼望到返回故鄉的日子了。

日本戰敗和台灣殖民兵的慘狀

日帝強制徵召台灣青年75萬人做為他們侵略的工具，又

徵召了12萬的台灣少女做為軍隊的「慰安婦」，此外，並有30萬的台灣少年被抓到日本本土的軍需工廠做工。

在激戰地的第一線，都是由台灣殖民兵擔任出擊任務，戰死的人數為日本兵的數倍之多，而且在接近戰敗時期，從日本國內來的補給品漸漸中止，為了應付負傷的日本兵的血源，只有不斷對台灣殖民兵強行輸血，弄到台灣殖民兵輸血後即無法站立的地步。甚至在敗戰後，有的小部隊躲在山洞裡，因全無食物，還有殺死台灣殖民兵，吃他們的屁股肉的這種非人性行為發生。

日本戰敗後，台籍兵都被當地的軍事法庭判決為「戰犯」，有的送到東京巢鴨監獄服刑，有的回到故鄉台灣，被蔣介石政權的軍事法庭判決為「漢奸」，難逃一死，有的回到日本，因為是「外國人」，在戰後食物缺乏及社會混亂的情勢下，他們就像抹布一樣被丟來丟去。除了這些生還者，75萬的台灣殖民兵之中，65%都已戰死。

台灣人慰安婦和軍需少年工

在日帝的強制皇民化政策下，有12萬的台灣少女以「報國」的名義，被徵召到軍隊去做清潔婦，其實是供像惡魔一樣的日本兵洩慾，有的不堪其苦而自殺的，也有患上性病後脫逃被捉回來槍斃的。而日本

戰敗後，她們被捨棄在各地，餓死、病死或失去行蹤的都有，有一半以上無法再回到自己的故鄉。

另有30多萬的台灣少年被騙說送他們到日本讀中學，卻把他們送到軍需工廠做工，過於殘酷的勞動壓迫，把他們折磨得又瘦又小，簡直像幽靈一樣。

敗戰後，工廠的負責人，也是日本軍官，把倉庫裡的衣料、糧食用卡車載走，而一去不返，什麼都不知道的台灣少年開始面臨生活失去憑藉的苦難，有的沒有辦法，只好到附近農家偷雞來吃，農家告到警察處，《每日新聞》登出台灣少年是強盜的報導，台灣少年

聚眾在報社前抗議：「假若是強盜，那應該是日本人，不是我們！」並且與武裝警察大打出手。結果被控以違反「佔領法」的名義，全部強制遣送回台灣。

留在日本的台灣人，為了生活，就在新橋車站前做流動攤販生意，正好發生「新橋事件」（1946年7月16日，台灣人攤販被黑社會松田組慘殺的事件），於是他們在生意結束後結伴回家，以策安全，但在澁谷派出所前面，又被警察與黑社會聯合起來的武裝力量找麻煩，雙方打鬥起來，當場死了28人，其他也都受了輕重傷者，此謂「澁谷事件」（1946年7月19日）。被拘捕

的人全部以違反「佔領法」名義遣送回台灣。

從「新橋事件」引發「澁谷事件」，是戰後第一件在日華僑遭受當地人虐殺的事件。有幾點不可忽視之處：

一此乃日本官民合作的計劃。

二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目睹事件的過程。

三全部被攻擊的人員都來自台灣。

我因為乘坐最後一部卡車，因而易於脫逃，才能倖免於難。

從澁谷事件的教訓，我省悟到：日本帝國主義必然再度復活，並且還要再製造一次中日戰爭。



戰後日本社會景像

特別企劃 之七

我的天皇觀

/ 片岡利明

翻譯 / 費新南

日本人與天皇

根據最近日本報紙上登載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近來在年輕人之間，對天皇表示敬愛之心的人少了，表示無關心的多。這種情況對部分右翼人士可能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但就天皇制本來的實相來說，那些支配階層寧可希望天皇的存在對日本人是空氣一般的存在，這樣對他們反而方便。

我們平常都不會特別意識到空氣的存在。但有時候爲了甚麼原因暫停呼吸，那麼，窒息的強烈痛苦會告訴我們空氣的重要性。天皇也是這樣，平常是無色透明的，不知道在或不在的，人畜無害一般的存在。可是一旦出現了很有反抗精神的人物，高喊「我不需要空氣！」，真的拒絕了空氣，那麼他的下場是七疊八素的痛苦和恐怖。支配者們所最希望的，也就是這樣的天皇存在。

在日常生活中，天皇是國民所不關心的存

在，或者說，頂多是在婦女週刊上散布些上流幻想的「流行」fashion式的存在，這樣的現實有兩種意義：

第一、因爲不知，幻想會肥大化。宗教信仰的心理構造，其方法是利用人家對看不見的東西、不可解的存在、觸不及的存在所引起的恐怖、敬畏、或無條件的服從心。對天皇、國民不必知道具體的情況。不知道反而有利（因爲知道了就會產生反省）。只讓國民知道那是存在的，且是大家觸不及的存在，這樣就夠了。

第二是第一的反面。如果民衆知道了有關天皇的事實（當然不是週刊雜誌上面的「事實」，而是歷史的事實），很有可能變成反天皇，進而反權力的契機。「萬世一系」的神話，或者是天皇經常眷念着每一個國民的幸福。這樣的神話，這些神話是爲了把支配和差別加以正當化，維持日本人的「一國一家」幻想所不可缺少的。如果民衆以反省的立場重新認識歷史事實的天皇（制），那不但可能使這些神話

和幻想歸於崩壞，產生否定天皇的意識，甚至可能促動人民反抗以天皇存在為支撐的現行支配體制。從大眾傳播一直滲透到教科書的「菊花禁忌」，就是這些支配者們為了本身的必要而製造出來的。（譯註：菊花是日本皇家的紋章）。

今天，做為戰後價值象徵的民主主義、經濟成長或高度福利等觀念逐漸喪失了國民的向心力了。於是做為最近距離的圓心，天皇又被招出來了。而且，當天皇被當成圓心的時候，都會連帶出現排外主義和膨脹主義。我們日本人，是不是再度被吸進天皇的磁場，變成對亞洲民衆的侵略者呢？這是當前最尖銳的問題了。

亞洲人與天皇

有一位亞洲人說：「我不信任不肯將天皇處以戰犯之刑的日本人」。這句話很直截了當地表現出亞洲人的天皇觀。對亞洲人來說，天皇不過是日本國家的亞洲侵略犯罪史的象徵。

被天皇的軍隊＝皇軍殺戮的亞洲民衆，為數達二千五百萬人以上。可是因為日本的戰敗處理不是經由亞洲人之手，而是經由以美國為中心的聯合國之手所進行，天皇的戰爭責任遂被置於不問，對受害最大、受苦最深的亞洲各國的賠償，也不過是象徵性的極少數數量。日本戰後急速的經濟復興，實際上是受惠於這一點。而亞洲各國却在先前被侵略的傷痕尚未癒合，又要重新面對日本的新的經濟侵略。亞洲民衆之所以憎恨這樣的日本，因而憎恨坐在日本國家頂點的象徵——天皇，自是必然的道理。

戰後為了免責天皇的戰爭責任，有一種天皇傀儡說被製造流布。可是就如歷史學者井上清根據公開資料（如〈松山備忘錄〉等）所下的明快論證，天皇裕仁不但容忍了自中國侵略到太平洋戰爭的十五年戰爭中的軍部獨斷（只要擁有統帥權的天皇下令，是可以制止軍部的專橫的），到了日美開戰無可避免的地步時，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態度親自負責戰爭指導。

戰後的天皇由「神」下降為「人」，降格為「象徵」，失去了直接的政治影響力。其代價是，美國承諾天皇的延續，且做為預防革命的道具而加以利用。

可是，對亞洲民衆來說，天皇根本就不是神。不過是大日本帝國這個好戰的侵略國家的頭子而已。在這個頭子的名義下，他們的親人被殺了、家被燒了、國也被奪了。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戰爭指導者一個接一個被裁判被處刑，可是這個頭子却不受裁判依然穩坐在頭子的地位上，這件事對他們是不可理解的吧。這種無法理解，自然會轉變為對容許這樣的不合理現象的日本人的反感。亞洲人看日本人的眼光之所以嚴厲，實在是自然不過的事。至今仍然奉戴天皇的日本人，對過去的侵略戰爭或在戰爭中所做的種種的犯罪行為當然是全無反省之意。只要同樣的機會再來，必定還會重復同樣的行為。這是一般亞洲人對日本的想法。這種想法是正確的。我們日本人，是給他們的銳利的眼光所看透了。

從天皇制度下解放出來

天皇制是支配階層所製造、所維持的東西。這種東西已經滲透到親子、男女、朋友、職場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際關係中去了。那是不依據自然的愛，而是依據權威和權力來結合人、支配人的方法。有的人把它看成是當然之理，寧可接受其支配獲得安全感，那是一種奴隸心態了。

因為我們日本人都被塞進天皇制的楔子裡面，在那裡面長大受教育，致使我們本身的意識內部也都放着一個小楔子。直到現在，天皇制幾乎變成自動機械那樣，不必去操作也能天天再生產小型天皇制。支配者只要有時候加加油就行了。天皇個人也不過是自動機械的一個齒輪而已。當然那是最重要的齒輪之一，但總是壞掉了還可以替換的齒輪。

我剛剛用過「天皇制這個大模型」這樣的

字眼，其實並不是說那樣的一個大模型存在於甚麼地方。模型只存在於每一個日本人的心裡。把那無數個別的模型組織成巨大有機體，使模型的擴大和再生產順利而不致中絕，這樣的結構化的存在，就是天皇制國家。換句話說，天皇制國家天天再生產的是天皇制的人，而通過天皇制的人的再整合，天皇制國家也繼續不斷地被再生產著。

我們日本人，為了從這天皇制的泥沼中解放自己，必須每一個人人都把自己本身內部的天皇制小模型拋棄，重新以愛的直接關係來取代支配被支配的關係。這也可以說是人間的自然關係的回復，用另外一種說法，是新的社會關係、新的人際關係的模型的創造。實際上，我並不敢樂觀地認為只要打破現行天皇制的模型，「自然關係」就會自動復活。一度被扭歪了的東西，要使其復活，當然有再創造的必要。

福岡正信的〈自然農法〉這本書裡面，提到果樹的自然型。對於果樹，我們如果從頭就放任其自然生長，會長成沒有果實的，很均衡的樹型。可是一旦加以人工的修剪，就會走上變形的成長，如不繼續修整，枝葉便會亂交錯，將變成易受病蟲害的弱質的樹。為避免如此的情形，據說要經常不停地修整再修整，盡量使其保持近於自然的樹型。

這段話，在人間社會似乎也有相同的情形。一旦受到了天皇制國民這樣的扭曲型態的教育影響，光是拒絕天皇制、打破天皇制的意識構造或心理構造，恐怕也不容易回復自然的人性。我們須要重新創造替代天皇制的，人與人之間的新關係。

為了這個目的，我們似乎有必要向那些還沒有受到支配和被支配的「文明」社會的深刻影響，還保持着相對獨立的文化傳統的人們（如日本蝦夷人、美國印第安人等）的生活方式學習，甚至也有向小孩子們學習的必要。當大人們審視着孩童的成長和生活方式時，是否會得到一些啓示，可用來建立不受天皇制毒害的自我呢。通過和小孩共同生長的經驗，大人們



日本天皇

可能再創造合乎自然的生活方式吧！

天皇的罪責

天皇的犯罪是沒有時效的，亞洲的人民並沒有原諒天皇。我們日本人也不應該原諒天皇（寧可說，我們日本人沒有權利原諒天皇）。可是，認為只要把天皇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加以處刑便解決了問題，這樣的想法會不會太過簡單呢？

天皇好像對自己的所做所為沒有罪惡的意識。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想到，他之所以為天皇，是八十多年前的某一個夜晚，他的父親和母親在床上的快樂的結合，這個偶然的結果。當我每次聽到天皇的「綸音」的時候，總是會

想到這個事實。他能成為天皇，只不過一個精子和一個卵子的偶然相遇的結果，而他却自認為是一億國民的「象徵」，比誰都偉大。讓他這樣盲信的，却是周圍的一些人們。每次我想到他的這樣的醜陋，這樣的可笑的時候，同時也會想到他其實是一億日本人中最被疏離的一個日本人。受到周圍的人們的蒙蔽和阿諛，不自覺自己的「赤裸」的那位童話中的「裸體國王」，豈不就是天皇裕仁的寫照呢！

我們日本人須要做的是，首先對天皇裕仁

頒布「有罪宣告」。然後拒絕他的「象徵」地位。也許不必剝奪他的生命，但他（天皇家）奪自國民、奪自亞洲民衆的全財產，也許應該收回吧。如做不到這些，我們日本人將永遠是天皇犯罪的共犯者。只是目前就要實現它，在力量關係上還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在包括天皇制問題在內的、全盤的日本改革鬥爭中期待着有一天能夠實現。

節譯自片岡利明「爆彈世代之證言」第一節之第四・五・六節。

片岡利明

- 1948年 生於東京
- 1969年 法政大學入學。土校期間，以基督教徒身份參加反越戰運動，為以後反體制、反權力鬥爭的出發點。
- 1970年 「安保鬥爭」全面失敗後，離開法政大學，自覺有必要以新的方式與政府權力展開鬥爭。反日思想初見胚胎。
- 1971年 炸毀為紀念指揮「南京大屠殺」之松井石松所建立的「興亞觀音」像。
- 1974年 組織「狼部隊」，舉辦「與日帝鬥爭到底」。展開爆破天皇出遊列車的「虹作戰」計劃，後因故中止。
- 1975年 被捕後被判死刑，直至目前尚未定讞中。

春風與您握手

唯情是岸 李勤岸詩集

這是作者獻給故鄉和同胞的敬禮，風格明朗清亮，批判處尤覺警醒，抒情處常存溫厚。

手的歷史 詹澈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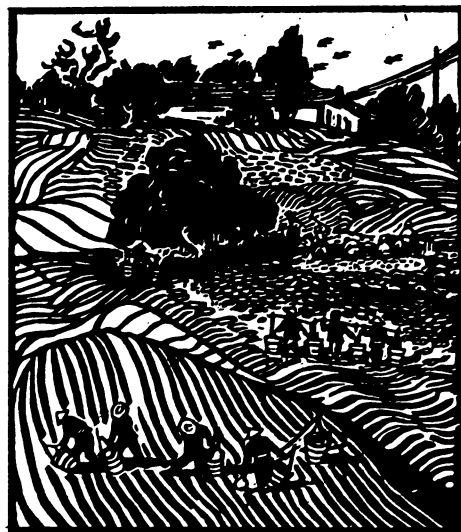
寫實的、鄉土的、政治的、農民的詩人詹澈，為勞苦大眾造像，情感真摯，語言活潑明朗。

台灣組曲 廖莫白詩集

堅持著公平正義的廖莫白，廣泛、直率地刻劃台灣社會面貌，詩風樸實，更顯人間悲苦。

南方

是一個覺醒青年叛逆與吶喊、彷徨與苦悶、沈思與探索的心路歷程，交織著憤怒與哀傷。



春風詩叢 特價每本60元・四冊合購200元・郵撥帳號 / 1025072-0林華洲
 訂閱前方一年，贈春風詩叢一套四本
 訂閱前方半年，贈春風詩叢一本（任選）

時事分析

動蕩不安

八年前，南韓朴正熙政府垮台前夕，曾經透過國民黨政府，強迫當時《美麗島》雜誌挖掉一篇批評南韓政府的文章。

今天的南韓全斗煥政府，同樣滿懷著干涉外國政治的那種趾高氣揚的心情，準備於明年舉辦奧運會。不料，內部卻因為改革步伐緩慢，軍人當政的殘暴本質未變，遂觸發了長達半年的一連串街頭及校園的抗議活動，南韓政府是否能如期舉辦奧運會，大有疑問。美國洛杉磯市已向奧運會提出建議，隨時準備作為八八年奧運會替代場所。

南韓政局不穩的導火線是在今年一月間，發生一件警察刑求致死一名南韓學生朴鍾哲事件。

朴鍾哲原就讀漢城國立大學語言系，今年廿一歲，他在被捕後幾個小時，被警察施以口灌水苦刑，以致窒息而死。消息傳出，人心大嘩。全斗煥政府雖立即撤換內政部長金鍾豪（譯音）及逮捕兩名涉嫌刑求警官周漢容（譯音）及康金

求（譯音），但這只是做做姿態而已，一直到六月十七日才在另一次大規模示威的壓力下，把這兩名警官交付審判。

到了今年五月八日，南韓天主教牧師協會發言人，揭露了全斗煥政府以金蟬脫殼的方式，掩蓋了整個刑求致死事件的真相的內幕。據該發言人透露，另外有三名實際執行刑求的警官未見受到處分，全部罪狀由周、康二人承擔。

學生反政府示威

一向擔任改革急先鋒的學生，立即在五月廿三日在漢城及全國各大城市發動反政府示威，人數高達一萬五千多人，與政府派出的鎮暴警察在漢城街頭發生混戰，其中一千三百多人遭逮捕。反對黨統一民主黨要求全體內閣辭職，以示對朴鍾哲被刑求致死事件負責，連全斗煥的民主正義黨也要求大規模改組內閣，以疏解民怨。

全斗煥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之下，不得已部分改組內閣，

撤換總理盧信永，代之以一名退休的法學教授李漢奇（譯音），連國家安全企劃署（中央情報局的後身）署長張時同（譯音）也被換掉，代之以被視為較溫和的安明修（譯音）。

然而，漢城的騷動並不就此了結。到了六月十日，全斗煥的民主正義黨突揚名該黨主席盧泰愚為明年二月下一屆總統候選人。此一舉動意味著全斗煥政府無意接受反對黨提出的修憲要求，讓下一屆總統以普選而不是以現行間接選舉的方式選出。

果然，不到一週的時間，漢城再爆發大規模學生與鎮暴警察火拼的局面。據估計，總共約有五萬名示威者，以石塊及汽油彈與警察混戰，整個漢城市中心的日常活動癱瘓了五個小時。

這只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其實，從今年四月十三日，全斗煥政府決定暫時擱置民主改革的計劃，以待一九八八年九月漢城奧運會舉行之後再說，益加引起反對派的憤怒，自然，每天的示威遊行已是司空見

的南韓政局

/ 張大林

慣。

最受矚目的是，六月中旬這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把南韓素來對街頭運動持保留態度的兩股社會勢力引進了反對運動行列。

天主教徒走上街頭

一是南韓的天主教勢力。天主教徒約佔全部基督徒的五分之一，數目比之於一千二百萬的佛教徒還少得多，但是它位於漢城明洞天主教堂的總部，卻是六月示威的焦點。在一連串示威活動中，曾經有三百五十餘名大學生進入該教堂避難，旋即被一千二百名鎮暴警察包圍，歷時五天，後來由教會人士出局與鎮暴警察協調，後者才同意撤走包圍。

從此，原先對政治不聞不問的天主教會，正式在充滿暴戾之氣的南韓政局裏軋上一腳。南韓天主教大主教金樹煥（譯音）在六月第三週的一次彌撒中，對著一萬五千名信徒說，他感謝學生結束靜坐，以及感謝政府聽得進教會的聲音，同時他承認學生對政府充滿不



南韓的反對運動

信任，並要求全斗煥政府撤回四月十三日那項停止修憲的決定，並呼籲起政當局與反對派「無條件」地恢復談判。

這是南韓天主教會對全斗煥政府多年來罕有的坦率及直言的態度。

另一股是南韓的中產階級愈來愈政治化。

日漸激化的中產階級

南韓中產階級對學生運動向來都作壁上觀，全斗煥政府每藉此譴責反政府活動只是一小撮偏激學生的所作所為而已，沒有社會代表性。但是六月這幾次動輒數萬人的示威，已有大批白領階級加入學生的行列，他的捐款、捐物並協助搶救學生。中產階級此舉，已使南韓反對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

猶憶八年前，中美洲尼加拉瓜左翼桑定解放陣線之所以能夠加速促使掌權的蘇慕沙政權垮台，得力於在最後階段，尼加拉瓜中產階級之加入桑定陣線。南韓的中產階級雖已表現了相當同情反對派運動，甚至於一千餘名大專院校教授亦出面呼籲全斗煥收回四月十三日之停止修憲及停止與反對派磋商之決定，但是若要全面動員及組織這些包括學術、宗教及工會人士，在時機上還要有一段時間的醞釀。

民政黨的變與不變

儘管南韓政府不斷對學生運動實施鐵腕鎮壓，逮捕大批

學生，連反對黨統一民主黨的副主席楊順二（譯音）也被扣押，但是街頭騷動不稍減緩，並漫及全南韓各大城市。全斗煥提名的下屆總統候選人盧泰愚仍對此不太在乎，他在接受提名之後表示，「大部份人民仍反對這些示威活動，他們極為珍惜穩定」。

這種嘴硬的話，敵不過每天成千上萬飽受催淚瓦斯折磨的人所產生的怨氣，終於在六月廿八日，全斗煥的民主正義黨向新聞界透露，他們正計劃於明年二月全斗煥任期屆滿之前，修訂憲法，以使總統改由人民普選產生。這無疑已修正了全斗煥在四月十三日的決定，把修憲的時間再度從原先要等到一九八八年九月奧運會結束之後，提前至明年二月之前。

全斗煥在壓力之下改變態度，是否會消弭街頭運動的強度，有待觀察。不過，主要的反對派人士如金泳三、金大中及李敏雨對此皆持觀望態度。金泳三明白表示，如果全斗煥政府不向民主潮流低頭，七、八月間將爆發更大規模的示威行動。

美國態度舉足輕重

南韓政府是否就此乖乖俯順民意，做出民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還得看美國政府的態度。

衆所皆知，美國迄今在南韓仍駐紮著三萬五千名的部隊

，歷任南韓軍政府成立之後，首先都必須取得美國的默許，才能有效統治南韓。八年前，全斗煥以武力改變的方式取朴正熙政權而代之，亦是獲得美國的支持。全斗煥於政變成功後不到半年就獲邀請前往華盛頓訪問，此行等於建立了美國對全斗煥軍政府的支持承諾。

但這半年來的街頭暴動，美國似已看出，經過了八年，全斗煥掌握南韓政局已漸力不從心。六月下旬，雷根總統致函全斗煥，勸他以民主為重，善待反對派，與反對派恢復對話，重建穩定。這已透露出美國對全斗煥的統治方式漸感不耐的訊息。

同時，金泳三在六月廿八日透露，美國駐南韓大使李潔明，曾向金泳三保證，他會與反對勢力合作。

美國這些舉動足以令全斗煥政府心驚膽跳，因此才在六月廿八日表示同意在明年二月之前完成修憲工作。

南韓政局充滿變化

這是誠意的表示，抑只是敷衍美國及緩和反對派的抗爭強度？無人能夠確切得知。但按照以前歷屆南韓軍人的奪取政權的模式，在全斗煥政權控制局面的能力趨於式微之際，其屬下的軍人會不會出現另一個「全斗煥第二」，如法泡製，發動政變，奪取政權，攫取民主運動的果實？我們只有拭目以待。

名詞淺釋

無政府主義

/ 許思元

自從人類社會有了政治組織，並據此而向多數成員發揮強權支配開始，在其拘束強制下的人民中間，便有了對組織反抗和厭惡的「脫組織」意識出現。換句話說，人類自有政府之日起，便同時有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與之對立。這是人的組織本能和放縱本能的自我衝突。在東西方古代文明社會中，此一類的共通現象不乏記錄，如古希臘的犬儒派、中國古代的老莊學派等，基本上都帶有濃厚的厭惡政治權力的心態。

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至於近世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體系，一般都認為是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普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所建立。相傳 anarchy 一詞，也是普魯東造自希臘語。其思想內容則在否定國家和宗教等一切權力或權威，只以實現人的完全自由為宗旨。這樣的一種主張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革新風潮中，曾經亦擔負過社會主義思潮中的一個環節。

做為普魯東的思想前驅，還有一位英國的威廉·哥德溫（William Godwin（1756～1836））。他在法國大革命後發表的《有關政治正義的研究》一書中，強調國家的存在妨害了人性的完全開展，人們必須否定政府及政



普魯東

府所保護的私有財產，要求平等分配所有的社會生產物。

普魯東（1809～1865）在他的《何謂財產》一書中斷然給以定義說「財產就是竊盜」。凡貪暴利、收地租、追求利潤，在他說來都不外是竊盜的延伸。不過普氏並沒有否定財產本身，而是以轉變勞動者或農民為小所有者為理想。馬克斯曾經著《哲學的貧困》一書，批評普氏的《貧困的哲學》，指出普氏的小市

民意識的根性。

普氏在1848年二月革命後，逐漸傾向為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不過，把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加以徹底化的是黑格爾左派的馬克·斯蒂那 (Max Stirner) (1806 ~ 1856) 。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一書中強調，唯有「自我」是實在的：餘如家族、國家等，皆將在「自我」面前消逝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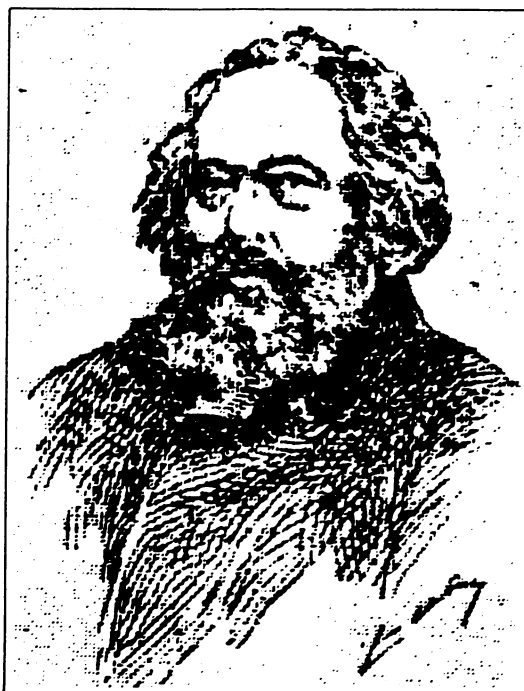
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與此類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相對稱的是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首由俄羅斯貴族出身的思想家巴枯寧 (Mikhail A. Bakunin 1814 ~ 1876) 所構築。巴氏在德、法滯留時，和普魯東、馬克斯等人相交，參與當時歐洲革命運動的指導，特別是法、意、西班牙等拉丁區域的勞動者運動，後來參加了第一國際。

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只強調抽象的個人自由，把個人自主性加以絕對化，否定一切組織性的政治鬥爭，不論國家的階級性格如何，一律予以反對，夢想國家的即刻、完全的廢止，以個人恐怖行為或非組織暴動為其實現手段等等。諸如此類的思想特質，皆指出其屬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理念的絕對化。

他雖然也認為私有財產是所有社會不平的根源，資本主義必須加以廢止，却不去理解資本主義剝削的客觀過程，不去掌握導向社會主義的社會發展法則，從而也否定了勞工階級及其政黨組織的歷史性使命。這種思想型態，放棄了一方面保衛勞工階級的日常利益，一方面導引其走向完成歷史使命的正當努力，且因其「反政治」傾向，而易使勞工在客觀上從屬於資產階級政治。

他稱讚巴黎公社為「勇敢而徹底的國家否定」的歷史實例，却逃避面對其悲慘結果的緣由。而恩格斯却指出公社的失敗應歸之於缺乏權力的集中運用和政權中心的無力領導。



巴枯寧

巴氏在其死後出版的《上帝與國家》一書中主張，唯有否定上帝與國家，人性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強調依靠暴力破壞一切國家權力，建立以個人的自由聯合為基礎的自由共同體。

巴氏死後，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運動以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1842 ~ 1921) 為代表。他也是俄羅斯貴族出身，1872年在比利時和巴氏相遇，受其影響由地質學者變成無政府主義者。不過他的哲學觀和巴氏不盡相同。他反對達爾文的生存競爭理論，認為相互扶助才是動物界，尤其是人類進化的要因。描繪以相互扶助為原理、以村落共同體為基礎的共產社會，把既存的工業城市農村化，實現工業與農業、精神勞動和身體勞動的統一。

1907年，以克氏等人為中心，結成了無政府主義國際，但受思想特質的限制，始終無法達一定的統一性和嚴密性，因而在運動聲勢上常被第二國際所壓倒。他們中間本有多人主張「以行動宣傳」，企圖以個人恐怖活動，消滅國家機器的主要負責人，藉以引發社會叛亂

，但在屢遭彈壓後，部份轉向「革命工團主義」(Syndicalism)。

革命工團主義

「革命工團主義」的運動策略是把工會轉變成對抗資產階級的革命工具，和未來無政府社會的構成基礎。但在運動中却要排除勞工的政黨組織——不論社會黨或共產黨。以聯合罷工(General Strike)為唯一的、埋葬資本主義國家的合理途徑。在新社會則由勞工團體而非地區團體支配所有的生產手段、分配手段、和交換手段。

在1895～1920年間，是無政府主義透過工團主義在勞動者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中發揮最大影響力的時期。其最顯著、也持續最久的影響力，可見之於西班牙內戰時期(1936～1939)。

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時期，以小資產階級的時代危機感為基礎，產生了種種反戰和平運動，其中還可窺出無政府主義的一些理念片斷。尤其在六〇年代的新左派運動和七〇年代後的市民運動中，其非政治的個性自主傾向，相當明顯地表露出那種在運動中已被認為過時的無政府主義情結的殘留。

無政府主義的盲點

但以整體的運動流向而言，不論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做為實踐的革命力量，始終沒有站到時勢的主流地位上來，最屬關鍵的理由，是它的反政治立場導出的嚴重的非現實性。因為政治是最現實、最直接的權力系統，做為一個社會人格，主觀上的脫政治態度，只有導出低效果甚至反效果的社會實踐。

無政府主義在思想內容上也是感性多於理

性，豐富的情感、情操，時時淹沒低弱的理性評判，產生淺薄性急的折衷和混淆。例如：自然觀的唯物論加社會觀的觀念論；共產主義的共同所有觀念加個人絕對自由觀念。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無政府主義意識，在歷史的現階段下是小資產階級的精神產物，它具有冒險主義和革命言辭販賣者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却是資本主義壓制下的「脫階級」(de-classed)知識分子和失業無產者(Lumpen proletariat)對巨型化資本主義與其保護者的高集權國家的恐懼心理的自然反應。但他們因缺少辨證的世界觀，不知把國家目的和國家機能放在歷史的推演過程中去審視，得不出每一階段的政治的積極面和反動面的統一認識。

「國家」的歷史地位

國家本質的善惡，決定於它的階級性格。但即使最惡的國家，也就是在最自私的階級掌握下的國家，仍然是個「必要之惡」。人們只能除去它的惡性，却不能否定它在歷史現階段上的必要性。

一種無階級，無國家的自由社會，在馬克斯主義者來說，是必須通過無數嚴酷的歷史條件的積累和歷史階段的開展摸索，始能達到的久遠未來的理想，而在無政府主義這方面，却認定是今天明天的行動目標。

馬克斯主義者認為國家必須如盛開的花朵一般自然枯萎，也就是說，在消失以前必須發揮它的作用到最高度——替自己的凋萎準備條件，為同時揚棄自己的惡性和必要性準備所需的條件。而無政府主義者要求的是國家的立刻的死亡，夢想一切人間之惡皆隨著國家的死亡而同時消失。

善於吶喊，不善於分析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家們所遺留下來的，於是乎只不過是一幕幕自撰的壯烈的悲劇，雖然令人感嘆，却無補於人類歷史的進展。

歷史與人物

從安那其到普羅

1965年11月底，現年84歲的周合源先生服刑期滿，由兩個保證人蓋章、辦完手續，被釋放出來時，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

距離1953年冬天，有足足12年之久了。他永遠記得，那個寒冷的深夜，一輛吉普車載著3名便衣的偵警，把他帶到昔日日軍用為「重營倉」的保密局「南所」。

「那半夜裡開牢門的鎖匙聲、腳鏢聲、罵聲、叫聲，」周老坐在北投家裡客廳右側的窗口下說。5月中旬午後的陽光從屋外斜斜地打進來，照在他花白的頭髮上，映著他臉上的老人斑。我為他拉攏窗簾。他掏出手巾，抹了把汗，繼續說：「初進去的人實在會覺得恐怖萬分的。」

經過幾次深夜裡的反覆偵訊，一個多月後，他便被送到大橋邊，由原高砂鐵工廠改成的臨時拘留所「北所」。兩個多月後，再被轉送到已經人滿為患的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

在這看守所滯留了近四年，開了幾次庭後才宣判。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我的罪名是『資匪』及

『知情不報』，」他說：「但却以懲治判亂條例二條一款起訴，理由是文協的左派支持台共。」

「但我抗辯說，」周老喝了一口茶，然後接著說：「其實，日據時代，台共是一個秘密的地下組織，我根本無法知道他們的身份；再說，當時反抗的對象是日本殖民政府，並不是國民政府！終於，唯一死刑的二條一不成立，改用第四條『資匪』判決。」

到底周老當時資的是什麼匪？又是如何個資法呢？國民政府可有什麼罪證呢？豈可任意蹂躪人權！根據周老在86年2月號《夏潮論壇》所寫〈年老終自望河清—我的台灣八十年證言〉一文，他的「罪證」大概是這樣的：

「在還使用舊台幣年間，有一天，文協的工會的舊友林某來訪，說他的朋友臥病在牀，想為他籌點醫藥費，要我也出點錢，我也沒再多問，隨手從口袋裡掏出一點舊台幣給他，後來林某自首，供說我幫著接濟的那個病人是個共產黨員。還有一件是一張寫有『源五〇元』的字條，要我承認是給原『農民組合』簡吉捐錢的證據，我說世上以『源』為名的

何止我一人，但法庭用『不足採信』推翻了我的辯解而判我重刑。」

就這樣，在日治時代因為投入激進的抗日運動，而在1931年日本在台進行大檢肅時，被捕入獄，坐了7個月牢的，這位曾任文協中央委員的愛國者，却在光復後，再以同一事實坐了12年漫長的祖國牢。

出獄後，周老在政治犯尚被莫名畏懼的台灣社會，不免於失業了兩年之久；入獄前任職的大同公司，隨便找個理由，讓他退休失業。幸好一位朋友介紹，後來到台灣玻璃公司當秘書，5、6年後才退休。

退休後，在昔日文協朋友的撮合下，1971年與許月里女士結婚；當時，新郎已經69歲，新娘也有60歲了。兩人都都是日據時代抗日的社會運動健將；光復後，却先後以「資匪」的罪名被判處12年徒刑。「這是什麼樣的歷史正義呢？」年輕的我不禁憤慨地在心裡為這對革命情侶抱屈。

「周老，」我忍住氣，試著問些輕鬆的問題，「結婚好罷！」

周老笑了，臉有點紅，眼鏡後面的雙眼因為笑而眯成一

——周合源先生訪問記

/ 張 文

條縫，說：「算是不幸中的幸福了。我的元配於1951年去世，那年真是禍不單行，一個唸過中國大學的兒子也病死了。隔年我便再娶，不料1953年入獄，65年出獄後，因失業造成家庭的不圓滿，離了婚。月里是很早以前就認識的，以前把她當小妹看，想不到幾十年後那位跟著我們抗日的小妹，竟會成為我的老伴。結婚時，我們只給親戚發了70幾張帖子，沒想到當天竟然來了10幾桌，100多個人；許多抗日的、受難的朋友都來了。」

「年紀大了，為什麼還敢結婚？」

周老依然笑著說：「原先心想：兩個人思想意識一致，做個老伴，彼此在生活上互相照顧，精神一直很愉快啊！」

「太太，」這時，許月里女士提了一籃水菓，走進客廳；周老開她玩笑說：「年輕人說要聽妳講羅曼史呢！」

「我們那裡有什麼羅曼史！」許月里女士坐下來，語句急促但清楚地說：「1963年出獄後，因為丈夫娶細姨，生意失敗，加上火燒厝，我就到朋友的餐廳看櫃檯，後來，弟媳來電報，說我母親病重，就趕回娘家，母親死後，我到磁

磚工廠做女工，月入一千多；但那時前夫負了10幾萬的債，他還人十分之一，其他的都要我來還；那時候，過的是不像人的生活，窮得連一個饅頭也捨不得吃！老朋友們介紹合源兄與我結婚，我並沒有馬上答應；人活著要有志氣，即使他有能力替我還債，我也不要！到70年，債還清了；拖了半年多，也辦好離婚手續了，71年我才與合源兄結婚。我16歲就認識合源兄了，在『愛愛寮』、『文化協會』，我們一起共事過的！」許月里女士說完話，又進廚房燒水。

「71年結婚後，台灣的政治、社會也經歷了幾次大變動。」周老說：「近幾年，時代進步了，老同學也克服政治恐懼，常來走動。」

婚後，周老與許大姐住在建成區的一棟違章建築裡。許大姐仍在磁磚工廠管理倉庫，周老則任職周氏宗親會常務理事，每月領取微薄的車馬費，生活依然困苦。

73年，這對老夫婦搬至北投。雖然遠離市區，年事已高；但他們對民主運動的關心並沒有止息。他們倆人都坐過日本人的牢，也待過國府的監獄，然而在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中

，他們的聲音却很微弱。

一直要到1984年，被尊為「壓不扁的玫瑰」的老作家楊遠，不幸在3月12日辭世。兩百多名「綠島大學畢業生」，參加了楊遠的喪禮。在3月29日的追悼會上，81歲高齡的周老，終於打破被壓抑了22年的沉寂，宣讀了感人的悼詞。他那喃喃似的空谷足音，在這一代懷著改造社會理想的年輕人中間，留下了久遠的影響。

從那天以後，周老再度穿上一雙「運動鞋」，不改其愛國民主的初衷，85年年底省市議員選舉時，他以82高齡，在寒風冷雨的台北街頭，為民主呼號。從此，奔波在民主運動風雨交加的路上。

為了抹平民族的傷痕；今年2月，周老應在美國的《台灣與世界》、《台灣思潮》2個雜誌社，和「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之邀，參加「2.28 40週年紀念研討會」。他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與來自美國各地的學者，及海峽對岸的歷史見證者，認真地探討這場大大傷害了民族內部團結的悲劇事件的真相。

在討論會中，周老再三強調，事變絕非省籍矛盾引起，因為「互相保護」的例子很多



84歲的周合源老先生

；如當時嚴家淦在台中就受到本省人保護。他沉痛地指出：「只有深入了解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歷史真相，才能了解2.28發生的原因。」

事變後，爲了逃避濫捕濫殺，周老逃到上海待了兩個月，台灣稍安後，才返故鄉。50年，大陸變色；53年，他被控「資匪」、支持「台共」和參加「2.28」，判刑12年。在中國近代史遽變的年代，犧牲無數青春歲月，坐了漫長的「祖國」牢的周老，對於分裂中

國的未來有什麼看法呢？

在86年2月號的《夏潮論壇》的〈年老終自望河清〉一文，其實已經很清楚地表明這位堅持理想的社會運動家的看法。

「日據時代以來，我們這一代都希望中國能富強，至於中國的統一問題，我認爲統一是一定的問題是時間的早晚而已。……歷史的根源，我相信血比水濃，台灣的經濟發展要市場、要資源，有大陸廣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才能有

更發展的前途。至於統一的方式，當然我是贊成和平統一，但是一定也有人會反對，他們怕大陸的共產黨，尤其是四人幫、紅衛兵的亂來。對島內則228的惡夢未消，其他如美麗島案，林義雄母女慘案，陳文成暴斃案，加上最近一年來的十信案、毒玉米案等等，在在都令人寒心，令有些台灣人以為大陸人的作法都是這樣的，但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人類總是要進步的。」

是的，「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人類總是要進步的。」然而，歷史發展到1987年，隨著黨外組黨、解嚴，使過去一向禁忌的政治話題，逐漸表面化。

一月中旬，國民黨的趙少康與民進黨的謝長廷，公開辯論「自決問題」。

3月11日，民進黨機關宣傳刊物《民進報》第2號，刊登了一篇在美國的謝里法所寫的〈從2.28事件看台灣知識分子的歷史盲點〉。該文的論旨是：「如果台灣不光復，228事變就不會發生」。從這不確定的歷史斷言，而作出「台灣獨立」的唯心結論。

3月20日，民進黨籍立委尤清，朱高正正式就「自決」問題，在國民黨體制內與國民黨官員進行問答。

針對著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究竟應當統一或獨立？」的論題下，台灣社會必然產生的「統、獨論爭」的政治事實，

一群台大的知識菁英却在4月號的《南方》雜誌，以裡應於所謂「民間學者」提出的「只有外國才能打破中國專制的歷史循環，走向新的自由」的「外國打破論」，企圖以「無政府」的政治要求做為內部配合，而迂迴地影響台灣政局的走向。

儘管筆者一直自我期許作個「進步青年」；但面對著所謂「如果台灣不光復，2.28事變就不會發生」，及無視於統獨存在的客觀事實，大談「不統不獨」的所謂「民間哲學」等等奇譚怪論時，也不免於感到思想的混淆，方向的迷失。然而，我並不像那些「民間哲學」的信徒，能夠「以英文思考」來超越「統獨迷思」，從而找到前進的方向。可是，我相信歷史，相信「歷史是一條大河，她不會犯錯」；因此，我特地拜訪僻居北投，現年84歲，曾經因為抗日，屢次「進出」日本監獄而不改其志，光復後又親身見證了「2.28事變」，並慘遭國民黨的政治冤獄，被囚達12年之久的周合源先生。我希望從他一生實踐的過程，找到提供我前行的參考。

「周老，」於是我問他說：「可不可以談談你思想的發展過程，以及你堅信中國必定統一的基礎是什麼？」

「好的，」他喝口茶，閉目沉思，然後說：「我還記得，年輕時看完克魯泡特金的《

青年書》（《青年之訴求》）時，非常感動，也燃起了青年的正義感。那時的我，求知慾特別強，飢不擇食地研讀所有能夠到手的書籍；其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大杉榮譯的《昆蟲記》，堺利彥、山川均的部份著作，及矢內原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當時自己信仰什麼主義自己也搞不清楚，只是懷抱著人道的，却也是空想的改良社會的熱情。

「我出生時，台灣已割讓給日本8年，我的父親以販賣水果維持家計。因為家貧，老松國小畢業後，二年制的實業科未畢業，就到台北『遞信局』儲蓄部工作。工作期間與幾位朋友，在艋舺黃姓祖祠共組『慈惠夜學義塾』，幫助失學青年受教育。

「在義塾時，我認識施乾先生。施先生是一位基督教徒，受到日本基督教社會運動家賀川豐彥，鼓吹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影響，認為基督徒應入世濟貧解困。施先生那時在總督府殖產局任職，奉命調查台北的乞丐寮。在他深入調查後，認為世間每一個人都有淪為乞丐的可能；他告訴我，想把乞丐從社會消滅掉的理想。因此，成立『愛愛寮』，專門收容乞丐，並訓練他們謀生的能力。

受了施君的影響，我辭去原來的工作，全職投入『愛愛寮』，希望能結合一群熱情的社會工作者，消滅乞丐。『愛

愛寮』最高記錄曾收容3、4百人，台北有一度乞丐絕跡。但乞丐畢竟是種社會病徵，光憑人道，只能醫表，無法根治；制度不改，病會再生。

「那時我才廿二歲。因為『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的一些進步人士，經常訪問『愛愛寮』，受到他們的影響，我加入了『文化協會』，並到全省各地巡迴演講。在深入工作之後，我深刻認識到，若不以組織對抗組織，是無法與統治者抗爭的！

「就在抗日的活動歷練中，我的思想逐漸由人道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而進步為社會主義者。

「至於2.28，我認為這是民族的悲劇，是中國長期受帝國主義侵略，國家不發達，老百姓生活日益困苦，而政府的統治却日益苛酷導致的結果。我相信一個公平、民主的社會，是要從社會制度的改變著手。雖然，我坐過漫長的『祖國牢』，我還是認為台灣的前途在未來的統一。」

離開北投周老家已是黃昏時分。北投街上的交通因為下班、放學的行人而流動起來。一個下午的長談，我清楚地看到，老一代的台灣民主鬥士，具有目前新生代所缺乏的，開放的胸襟，和對理想的執著；在統獨的路上，一生血淚抗爭所凝聚的智慧，更使他們不會因為客觀情勢一時的消長而迷失。

原住民

吳鳳神話

——一個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吳鳳故事已經風化了二百餘年，傳說紛紜。它橫跨了晚清、日據時期和國民政府三個世代，因此有關吳鳳本人被典型化了的歷史疑點並不容易廓清。甚至，嚴格地說，在學術考證上仍舊是一個謎，一個富於爭議性的歷史，至今，還沒有人能夠知道確切的答案。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能做的工作只有一項。這項工作，無關乎吳鳳故事的史實本身，而是去剖析吳鳳神話被捏造出來整個過程。

本文從現有可以找到的文獻記錄和資料中，用年鑑的方式加以排比，俾便讀者完整地看見還原的歷史真相。其中，我們看到了吳鳳神話如何經過編造，篡改，以至於捏造出一個符合統治階層的神話模型。

以下，是整個吳鳳故事在歷史上的演變經過：

1855 年

■ 劉家謀《海音詩》，第 96 首：「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拼却頭顱飛不返

，社寮俎豆自千春。」

● 按：吳鳳故事，目前可見的最早記錄就是這一首《海音詩》。距吳鳳被殺已有 80 年。劉家謀，福州人，在臺灣擔任府學教諭。台灣史學者毛一波先生說：「這當是依據當時民間傳說而寫的」。至於吳鳳為何被殺？被誰所殺？詩中並沒有詳細記載。

■ 劉家謀《海音詩·自註》，作了如下的補充說明：「沿山一帶，有學習番語，貿易番地者，名曰番割。生番以女妻之，常誘番出為民害。吳鳳，嘉義番仔潭人，為蒲羌林大社通事，蒲羌林十八社番，每欲殺阿豹屠兩鄉人，鳳為請緩期，密令兩鄉人逃避。久而番知鳳所為，將殺鳳。鳳使人謂其家人曰：吾寧一死以安兩鄉之人。既死，社番每於薄暮見鳳披髮帶劍，騎馬而呼。社中多疫死者，因致祝焉。誓不敢於中路殺人，乃止。今番社欲殺人，南則於傀儡社，北則於王字頭，而中路無敢犯者。鳳墳在蒲羌林社，社人春秋祀之。」

● 按：文中記載了吳鳳被殺的直接原因在於

的系譜

「民族英雄」塑造過程

/ 官鴻志

「密令兩鄉人逃避」。同時，吳鳳又說了一句重要的話：「吾寧一死以安兩鄉人」。依照推斷，大概是這句話留給後人作為「殺身成仁」的根據。但是，如果劉家謀的記載屬實，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保護漢人」的義舉，和「革除賊首」絲毫沒有任何關係，更毋庸論及把自己的頭顱獻給曹族人民，作感化教育的犧牲。在劉家謀的詩中，根本沒有這種穿鑿附會的論點。

1894年

■ 倪讚元編《雲林探訪冊》，記載如下：

「鳳度事決裂，乃豫戒家人作紙人，持刀躍馬，手提番首狀。——謂其眷屬曰：生番之性難馴久矣，我思制之無術，又不忍致人於死，今當責以大義，幸而聽，番必從我，否則必為所殺。我死勿哭，速焚所製紙人。更唱：吳鳳入山，我死有靈，當除此患。次日番至，一一殺鳳以去，家屬如其戒。社番每見鳳乘馬持刀入山，見則病，多有死者，相與畏懼，——

乃於石前立誓，永於嘉義縣不殺人。」

● 按：這一則記載，含有較濃厚的漢族沙文主義思想。所謂：「生番之性難馴久矣」，必須擺在晚清時代曹、漢兩族之間的社會經濟制度上看來。台灣史學者毛一波，曾以「童怡」筆名，於民國46年5月4日，在中央日報副刊上說：「蓋漢族初至也。曹族與漢族間曾有爭執，曹族無火器，而漢族有之。在平地作戰，無火器者必敗，曹族人乃棄平地而歸山。曹族仍懷憤恨之心，每見漢人，輒欲盡殺之而後甘心。惟知府 桑福命其部屬十人或二十人駐於曹族社中，禁曹族殺人，常勸其出獵，以獵獲物向漢人易貨，其後曹族所獵之獸類皆運往台南知府處。漢人任交易之賈者，多奸詐之徒。常以微少換去曹族孜孜蓄積者。唯吳鳳秉性仁慈，為深謀遠慮之傑出人物。惜其部下亦多惡人，常責令曹族赴山打獵，不許在社中閒適，稍有不從，便加鞭打。」

1900年



曹族人民

■ 日本殖民政府殖產課小笠原氏，發現了阿山大原始林，展開掠奪性的林相調查，和曹族發生爭土地和獵場的衝突。

1912 年

■ 中田直久撰寫《殺身成仁通事吳鳳》，即是日本嘉義廳官方文獻「通事吳鳳傳」。此傳第六則記載如下：

「阿里山番當時有大小四十八社，各土目，指揮數十番丁，時出害人。清人怖不近其社。通事約貿易，特畀以男女二人，而貪其利。吳鳳就職，怒其不義禁絕之。有番人來乞，置酒食大饗，告曰：今年豐饒難購入，當明年償之，以牛替之。年年如此，逮四年，曰：明年必畀人。番以為詭誑，怒曰：不若約必殺吳。有人勸吳逃避，吳曰：吾當死為厲鬼以懲番。乃會壯丁百數十人，部署四隊伏要路；又以紙造亂髮瞋目提劍騎馬之像，令家人向番山樹之

。且命曰：番來，吾將格鬥，聞呼聲，爆竹以助威，吾死則焚此像。既而群番來迫，吳叱曰：囊奴何乞！吾死不與。番怒將刺吳，吳大呼鬥而死。爆燥竹金鼓之聲震山谷，番大驚遁走，伏丁突然起，殺番無數。殘番至琢鼻嶺之險，吳之靈陰顯空際，躍馬逐來，番狼狽墜落懸崖者亦多。吳馳驅社內，婦幼匿而不能出，有餓死者。既而惡疫作苗，病者見吳靈則死。於是土目等至吳家，匍伏謝其靈，誓不殺人，尊吳為阿里山王，春秋祭禱不懈云。」

● 按：日本割據台灣以後，汲汲於為吳鳳立傳修獻，把吳鳳故事搬上殖民舞台。但日據初期，吳鳳是否真有其人？為何被殺？都毫無史料可以證實。日人尾崎秀真找到了劉家謀《海音詩》，展開吳鳳身世、家譜、生死年月日的調查。

所謂「殺身成仁」的救贖形象，也是日本人把吳鳳故事演化，搬運的結果。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論，一種動態的社會造型藝

術，整個捏造、篡改的過程也極為生動。吳鳳故事的啓示，不在於所謂「全中國全人類最光輝莊嚴的英雄，他是一個可以和耶穌相提並論的神。」（楊牧：「誰殺吳鳳？」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而在於日本統治階層為何要捏造「吳鳳神話」？它留下了殖民統治者的宰割手腕和歷史發展的軌跡，供後人反省追思。

1912年

■ 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撰刻《阿里山通事吳元輝碑》。記載如下：

「番屢請誠首，元輝界物，百方開諭，不聽，爰設詞，延至數年，番以爲謊，嗷嗷不已。元輝厲聲謂曰：殺人者王法所不赦！然予既與汝約矣，其必履之。異日仍有天殃，汝曹侮蔑及他。戒家人曰：予將授首，永絕後患，即命以後事，一家掩泣，屆期徐步赴會，番迫而殺之，始知爲元輝，相顧離去。家人殮之，焚藜靈紙馬，禱曰：公推誠附循，冀革其非心，今齋恨以歿，靈其不泯，當禍崇番社，靡有子遺。元輝之死也，番見其橫刀躍馬，馳騁如電。既而陰雨綿延，疫厲大作，死亡相踵，番酋震懼，請巫以祓禳，巫曰：祭吳公之靈，乃可免也，番即營祭，灑血埋石，誓不殺人，於是阿里四十八社擴良嗜殺之習除矣。」

● 按：1912年，嘉義廳爲吳鳳籌設建廟事宜，請後藤新平爲吳鳳立碑。這篇碑文，可以視爲日本統治者爲了推行皇民奉公，將吳鳳故事擴大尺寸，塑造皇權神化的典型。這是「意識形態再認知」的儀式。日本殖民政府除了使用嚴苛的法律（合法的暴力）或非法的暴力來統治曹族和漢族同胞，並藉由「吳鳳神話」，達成意識形態控制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後藤新平的碑文留下至爲明顯的搬運痕跡，可以視爲「吳鳳神話」進入成熟時期的代表作。其主要特徵，在於後藤新平在碑文上下了如此的結論：「阿里山無番害，轉相爲力，得發天地之藏。…未始非元輝之助也。」

這種結論，簡直又是另一種神話。但也留下令人深思的伏筆，透露出日本統治者掠奪台灣山林資源的野心勃勃。

1913年

■ 日人猪口安喜，以「鳳庵蠻史」的筆名，撰寫「阿里山番地見聞錄」。記載如下：

「吳鳳以其爲祖先謀也頗思，番衆咸皆信賴之，至其所役之社棍，有無賴惡少混入，陵削勒索不知其所底止。是以閩族憤恨，深入骨髓，終至決行報怨，襲社菴殺一人，刎其頭歸，後驗之，覺爲吳鳳。」

■ 日人嘉義廳長津田毅一，根據《雲林采訪冊》和吳鳳的「武冠軍服像」，以及「吳府中王神位」——「皇清阿里山通事安撫效忠吳諱鳳公神位」兩面木主，開始追查工作。同時，又發現了兩張赦免大租的地契，才證實吳鳳眞有其人。其中一張地契如下：

全立赦一九大租字人業戶張祿通事吳鳳二比因爭山墾不平久控公廷不能結案時有埔尾庄着董鄭月出爲婉勸調處二比息訟定墾無爭祿等二比悅服聽從鳳等無以爲謝商議月有山頂並山脚埔園一處四至墾址載在契內明白爲墾永免其一九抽的大租以酬其勞此係祿與鳳二比甘願日後各無抑勒反悔生端滋事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合立赦合約字一網並豎立石碑一位永遠付執爲昭

乾隆貳拾伍年叁月 日全立赦免合約字人
業戶 張 祿
代筆人 陳 老
通 事 吳 鳳

■ 台灣總督佐久間在吳鳳廟落成典禮上，親自致祭，頒「殺身成仁」匾額。從此，吳鳳的神權地位確立。

● 按：爲吳鳳建廟，日本是始作俑者。但現今的小學課本却說：「山胞爲了紀念吳鳳，就尊他爲阿里山神，並爲他建築一座神廟，奉祀

他。」

事實上，曹族人民並沒有蓋廟的觀念和技術。曹族人民雖然是台灣原住民九族中，受到漢族文化影響最深的一族，至今却沒有任何一座神廟。

■ 日本文部省圖書局長幣原坦，將吳鳳傳編入教科書小學讀本卷八。下令台灣省各公學校一律採行，並下令學生以歌舞讚頌「偉大的吳鳳」。日本小學課文內容如下：

台灣的番人，在祭典時有獵人首之風，可是只有阿里山的番人早就停止了這個陋習，這是吳鳳的餘蔭。

吳鳳是大約二百年前的人，是阿里山的官員。因為他很疼愛番人，所以被番人所仰慕。吳鳳當官時想革除獵首的惡習，剛好番人在前年所獵人頭有四十幾個，所以叫他們以後每年用一個。

不知不覺已過了四十多年，祭祀用的人頭已沒有了。

番人們就向吳鳳請允許獵人頭，吳鳳勸說因祭祀而殺人不好，就拖延了一年又一年。到第四年時，番人前來說：「再也不能等了。」吳鳳說：「那麼需要人頭的話，明天白天時，就獵取戴紅帽穿紅衣經過這裏的人頭。」

翌日，番人們聚集在辦公室旁，果然來了戴紅帽穿紅衣的人。等候的番人馬上殺了那個人取下頭顱。一看，是吳鳳，番人大聲哭了。

● 於是，番人奉吳鳳為神，在其前發誓以後決不獵人頭，一直到現在。

● 按：以中、日兩種小學課文來比較，構成饒有趣味的對比。或以歷史心理學的眼光來看，可以捉捏兩種統治階層的心理構作。

曾經參與國立編譯館編審工作的梁容若教授說：「打算以我們的觀點，把吳元輝的故事教材化，代替日本小學國語讀本留下的歪曲印象……國定小學國語課本的「吳鳳篇」也是就我的文章刪節編入。」

既然稱為「日本人的歪曲印象」，又何必

繼續教材化？這種欺瞞的漢族沙文主義，絲毫沒有把少數民族的尊嚴放在眼中。現階段少數民族仍沒有取得公正、平等的社會地位，緣由在此種社會心態。

1918 年

■ 連雅堂撰寫《台灣通史》，卷 31，吳鳳列傳。記載如下：「（吳鳳）又作紙人肖己狀、弩目散髮、提長刀騎怒馬。面山立，約家人曰：「番至，吾必決鬥，若鬥吾大呼，則亦呼，趣火相，放爆竹，以佐威。越數日，番酋至，從數十人，奔鳳家，鳳危坐堂上，神氣飛越，酋告曰：「公許我以人，何背約？今不與，我等不歸矣。」鳳叱曰：「蠢奴，吾死亦不與若人！番怒刃鳳，鳳亦格之，終被誅。」

● 按：連雅堂曾經編校過《海音詩》的「鈔本」，也博采地方文獻而寫。

1970 年，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陳其南，在民生報發表：《一則捏造的神話，吳鳳》，曾把連雅堂的〈吳鳳列傳〉與現今的小學課本作一比較，作了如此評論：

連橫所描述的這則故事的主題幾乎與小學課本的完全相反：一則說吳鳳為漢人利益而死的；一則是說為感化番人而犧牲的。一則說番人對吳鳳非常畏懼；一則說是非常敬愛。一則說吳鳳欺騙了番人；一則說吳鳳非常照顧番人改善他們的生活。一則說吳鳳怒罵番人，陰謀襲擊，雖死亦必為厲鬼殲滅番人，而且是與番人格鬥而被殺的；一則說是吳鳳自願犧牲以成仁取義。一則說番人之所以不再殺漢人，是由於漢人的進擊和瘟疫的流行，使得番人以為是吳鳳的死靈作祟；一則說是番人為吳鳳的精神感召。看了這兩則全然不同主題的故事，有如看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不知何者為是了。

1930 年

■ 三浦幸太郎撰寫〈義人吳鳳〉。歌頌吳鳳是「東方基督」。

1931年10月

■ 十月嘉義中學校長三屋靜起草〈吳鳳傳〉，教員北島現映作〈吳鳳戲曲〉。即拍成電影，並通令全省學童，以詩歌、舞蹈讚頌。

1937年

■ 七七抗戰爆發。日本當局恐怕台胞「人心思漢」，曾將吳鳳廟的騎馬塑像由正殿遷藏於內室，禁止台胞同胞祭拜。（據嘉義文獻記載）

● 按：日本人是「偉大吳鳳」的意識型態的塑像者，由於歷史條件改變，也是「偉大吳鳳」的意識型態的破壞者，趙孟能貴之，趙孟亦能賤之。這時候，吳鳳神話所帶來的已經不是救贖，不是「全人類最光輝莊嚴的英雄」，對日本人而言，它是一把刀劍，站在和平救贖的對立面。但這兩種表面上矛盾或對立的東西，其實是統治工具的一體兩面。1945年，台灣光復。日據時期的吳鳳舞台也結束了。

1947年

■ 嘉義市政府吳鳳康樂區建設委員會，編著《台灣偉人吳鳳傳》，並由嘉義市長宓汝卓寫序作歌。蘭記書局老板黃茂盛捐資印贈。

宓汝卓並呈請台灣省主席魏道明表彰吳鳳，並說：「為激發一般公務員捨身從公的熱忱，以吳公為典範，而以其成仁日作為公務員節，實最為適當。」又說：「吳鳳也是蔣總統以力行仁義為中心之力行哲學的實踐者。」

● 按：陳儀政府接收台灣以後，為何立即修吳鳳傳？為何把日本鐵蹄下的半封建時代的產物全盤接收而毫無懷疑？

此外，二二八事變，曹族戰士曾經攻下全省規模最大的嘉義紅毛碑彈藥庫，困困嘉義機場，根據嘉義縣誌記載：「1947年，4月25日，曹族40餘人攜械自首。」「1948年11月28日，曹族為經營何里山林場，提出五項要求，並要求政府放寬民有林限制。」

應該也是思索國府時代「吳鳳神話」的參考資料。否則，我們實在找不到理由，解釋何以「吳鳳神話」在國府時代又復活了。

1950年

■ 3月16日新生報，徐文珊在副刊上撰寫〈西門豹與吳鳳〉。記載如下：

吳鳳身為山地的公務員，山地人民不僅是停在神權時代，而其强悍之性，尤為難治。

於是這位活菩薩決心入地獄，以代替善良的人類去受苦難，這和耶穌為了救人而自己走上十字架是同一心腸，同一行徑。吳鳳這一舉動，早已超過政治家的責任，而進入宗教家的領域。

● 按：徐文珊所言純屬臆測虛言。台灣光復以後，曹族第一任鄉長高一生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日本人投降，已經進入中華民國的憲政時代了，豈可說是：「曹族人民停在神權時代。」

1950年

■ 12月1日，林衡立在《台灣文化季刊》，撰寫〈阿里山獵首風俗之革除〉，有這樣的一段評論：

● 「若夫吳鳳在台灣正史中，並無任何可靠之史實。其事蹟至今且被作為教科書資料，聯由日人以雲林采訪冊、與其他稗史之零星記述，及阿里山番關係通事團帶有戲劇性之策略的行事為基礎而創成者也。」並說：「曹族革除馘首並非吳鳳之功勞！」

● 按：這是中國人針對日本官方留下來的吳鳳神話，第一次提出嚴重的反駁和質疑。

1951年

■ 5月4日公論報，楊雲萍在副刊上寫《吳鳳廟碑記及其他》。記載如下：

「後藤新平之任台灣民政長官（初稱「民政局長」，後改。）是在明治三十一年三月，他的「巡覽阿里山森林」，是在三十七年的。

關於此次的後藤的阿里山「巡覽」，日人尾崎秀真氏，有一篇文章，講到這次的事情，可備參考；尾崎氏說：

明治三十七年，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棲霞先生，視察阿里山之際，余與友人伊能梅蔭（按：即《台灣文化志》著者伊能嘉矩），賀來成軒等一起隨行。從竹頭崎入山，露營於麻（按：當是鹿之誤）蘆產，交力怍，糞箕湖，哆羅鳴，十字路等處而到達阿里山。歸路經過提母撈、達邦兩社，至於公田。一行除長和之外，還有祝殖產局長，長谷川鐵道部長及河谷林學博士等二十餘名，加之隨員、警備員等，組成一百餘名的大部隊。山中的探險，約費數星期的日子，露營的時候，確是有點大規模。

……現在算起來，已經是將及卅年前的事了；長官或是部局長，親自視察蕃界，乃是沒有前例的時代，蕃人的真相，完全還未弄清楚。說到一行取宿於達邦社的公廨時，公廨的首棚上，累累地堆積著五六百來個的燭體，尤其是朱奧族的首棚，和我們的公廨裡面的睡覺地方，同在一處，感覺非常的悽愴；可是嚮導的人，保證說：阿里山番，絕對沒有弑首的事情，請放心不要憂慮云云。一行覺得有趣，質問不要憂慮的理由。質問的結果，每一番社，都一樣地說出吳鳳的事蹟，而且公廨之中，和體觸一起放置圓形的如「讀物石」的所謂「吳鳳石」；番社的青年們，朝夕摩挲著這些石頭，用以追慕吳鳳的遺德，而鍛鍊精神。

後藤長官親聽到這些事情，非常感激。下山到公田莊時，再召喚該地人民，採訪吳鳳的事蹟。聽說吳鳳的廟，在社口莊，乃特遣一行中之伊能梅蔭，到該莊實地調查，後藤氏自己也作過一篇追懷吳鳳的詩。歸北後，命令岡田廳長保存該廟並調查吳鳳的事蹟……（「吳鳳之追憶」。戴大岡春壽著「義人吳鳳」附錄，五十四至六頁）

●按：日人尾崎秀真這一則回憶十分重要，主要是記載後藤新平為何替吳鳳立碑的動機和過程。據筆者做過幾次的田野調查，提出下列

疑點：

第一：所謂的「吳鳳石」，純屬虛構。這種石頭是有，但並非「吳鳳石」。按照曹族人的神話解釋，是天上掉下來的黑石，圓型，供奉在KuBar的木箱當中。KuBar就是曹族的「男子集會所」，也是曹族戰士習武的場所。因此，尾崎秀真穿鑿附會地解釋成：「用以追慕吳鳳的遺德，而鍛鍊精神。」

第二：所謂社口莊的吳鳳廟云云，也屬虛構不實。根據嘉義文獻委員會陳振旺執筆的《義士吳鳳》記載，此文獻雖然以經濟剝削的觀點，來解釋吳鳳被殺的間接原因，同時也把吳鳳被殺視為「殉職而感化之」的義舉。但是，對於吳鳳廟的記載，則說：「居民仰其遺德，即於中埔鄉社口村，立祠祀之。」也就是說，當時在規模上只是中埔鄉漢族老百姓建立的「祠堂」。前面已經說過了曹族人民沒有建廟的技術和觀念。因此，陳振旺又說：「日據時，歷代總督，以其有功於理番政策，尊崇備至。」

■ 蔣介石總統生日，避壽阿里山。嘉義縣長林金生前往貴賓館晉謁。蔣介石垂詢吳鳳故事的情形，林金生乃決定擴建吳鳳廟。於是而有95名立監委員陳情行政院，希望台灣省政府重修吳鳳廟。

1953年

■ 四月十一日兆如先生在中央日報撰寫《關於吳鳳》，指出連雅堂寫的《吳鳳列傳》，有如下缺點：「吳鳳欺騙山人」；「吳鳳被殺以後，還能大呼：吳鳳殺番去矣，幾近神話！」兆如先生建議應該修正連雅堂的錯誤。

■ 11月12日吳鳳廟重修落成。縣長林金生主持盛大典禮，蔣介石總統親題「捨生取義」四字橫匾。

1954年

■ 考試院長賈景德到吳鳳廟參觀旅遊，並撰寫「重修吳鳳廟碑」。碑文上記載：「廟舊有

像，騎馬仗劍，威猛武怒失本真，今易以主。」

● 按：根據賈景德的碑文記載，日據時代的吳鳳形象，威猛武怒；光復以後，吳鳳被改扮成爲中國儒家的「儒衣道巾」的書生形像，也就是後來中央電影公司拍製「阿里山風雲」乙片中，吳鳳已經變成「騎白馬」、「穿紅衣」、「戴紅帽」的儒家老人的形象。

1957年

■ 5月4日，台灣史學者毛一波，以「童怡」筆名，在中央日報副刊撰寫《吳鳳異說》，記載如下：

「薩委克(Saviki)社之主帥帕蘇亞，道數古不堪其殘暴，突襲而滅其數人。尙有以身免者，道數古追之至平地，長驅直入社口庄，圍其公廨，又獲一頭，歸社視之，吳鳳也。懼而棄之。未幾，道數古患天花而死，病毒傳播全社。其時社中不時有似馬之物疾馳，或聞馬鈴之聲，見聞者立斃。衆大懼。凡男子幾病死盡，生殘婦女，紛紛逃避他社。疫隨而蔓延，死者更多，族人益懼，皆以爲由於吳鳳之靈作祟。其時漢人曰：「不可殺人，予汝等以石球，該石球磨滅時，不妨再殺人」，自此永不殺人，不久，天花亦滅，然薩委克社，終成爲廢墟，曹族自此大衰。」

● 按：這一則記載，首次指出殺死吳鳳的曹族戰士，是薩委克社的主帥帕蘇亞·道數古。據筆者做過田野調查所知，Saviki社就是現在的「山美村」；帕蘇亞·道數古，曹語發音應該是：Bar suiya Dosgu，也確有其人。原本山美社的村落地點，在山美平原上。現在已成爲一片荒廢的旱田。那一場瘟疫以後，山美社的曹族人民紛紛逃竄或病死。活下來的人，現在只剩達邦3戶，樂野3戶，山美3戶。至於發生瘟疫的原因，衆說紛紜，猶待查考。但所謂「吳鳳之靈作祟」，只是一種不科學的說法。

根據毛一波先生在文中指出，以上記載係

根據他調查曹族人的傳說整理而成，和筆者的田野調查結果頗爲類似。但，筆者也採集到帕蘇亞·道數古爲何要殺死吳鳳的更具體原因，因爲不屬於《吳鳳神話系譜》範圍，將另文發表，供社會各界參考。(道數古(Dosgu)，就是杜姓這一家族的曹族人)

1962年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台灣省通志稿》，人物誌第三冊義士欄載有〈吳鳳傳〉。記載如下：

「以伊能所作爲依據的。其傳中有云：「時數十番衆，各持弓矢刀矛散佈社口之支廳四周，室內闕無人影，廳戶嚴扃，忽遙見四方一朱衣紅頭巾緩步而來，番衆歡聲四起，競相馳擊，剎那間彼朱體紅頭倒地，身首異處。番衆大喜圍觀歡呼曰：是青年抑壯年？及高舉首級諦視，豈料所殺者乃吳鳳，不覺驚惶失措，拋棄首級……時清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初十日正午也。」

● 按：這項記載，大部份依據日本人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志》而寫。

1963年

■ 1月3日中央日報，墨人在副刊上發表〈吳鳳與文藝片〉。有如下的說法：

「中央電影公司拍攝《阿里山風雲》，…表現了我們民族風格，指出了中國電影的道路。」

1966年

■ 7月28日倪博九在中央日報撰寫〈吳鳳死事考正〉，記載如下：

「台省文獻中惟一有關於吳鳳事蹟的一本書，嘉義縣文獻委員會編的義義文獻專刊創刊號，近人陳振旺所作的義士吳鳳一文。陳氏は嘉義文獻委員會的委員，他……首先承認吳鳳



曹族人民

的事蹟，於文獻無徵。」

「我們遍查現存台灣文獻，如：台灣通志，高拱乾的台灣府志，范咸的重修台灣府志，余文儀的續修台灣府志，劉良璧的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周鍾瑄的諸羅縣志，吳子光的台灣紀事，江日昇的台灣外記，以及碑傳選集，臺灣南部碑文集，都無吳鳳片紙隻字的記載。」

■ 8月2日。台灣史學者毛一波在中央日報副刊，撰寫「吳鳳傳說的演化」，記錄如下：

「關於吳鳳死事前後的傳說，好像很不一致，但在筆者看來，那不過是此一傳說的漸變演化而成。也即是說，這種口碑的傳承，（這在阿里山曹族本身的傳說中亦有之）初則比較簡單化，繼則複雜化，愈變愈奇了。如果真要好好的去研究一番，那些傳說和筆記，內容自然是頗多矛盾的，可說一言難盡。」

1968年

■ 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梁容若撰寫〈嘉義吳鳳巡禮〉。他表示：「打算以我們的觀點，把吳元輝的故事教材化，代替日本小學國語讀本留下來的歪曲印象……國定小學國語課本的〈吳鳳篇〉，也是就我的文章刪節編入。」

1970年

■ 7月28日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陳其南，在民生報發表〈一則捏造的神話，吳鳳〉。記錄如下：

「吳鳳的故事在現在是很不合時宜的。因為漢族和高山族已經是屬於同一個國家的國民了，過去因為生存競爭和文化差異所引起的衝突已成爲歷史，只能當作人類和平共處的痛苦經驗而不應再加以渲染。但我們的編者似乎爲了把吳鳳塑造成民族英雄而不惜篡改歷史，爲了顧慮漢族對山胞的恩情，不惜顛倒是非，這就未免走火入魔了。」

1982年

■ 3月31日，薛化元在「台灣風物」第32卷第4期，撰寫「吳鳳史事探析及評價」。記錄如下：

「就倪贊元記載的吳鳳而言，他爲了維護漢人，不顧生命危險與番人談判，站在漢人的立場而言，確實是值得欽佩的。但是，吳鳳死而未甘，降災異於番人，死者甚多，對番人而言，吳鳳是殘忍的、可畏的，最後也因害怕立誓不再殺漢人，實在說不上是被吳鳳捨生取義精神感動所致。」

1984年

■ 11月11日楊牧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撰寫〈誰殺了吳鳳？〉抄錄如下：

「紅衣紅巾從容就死，正是吳鳳精神最神聖的一角。……他是阿里山的救贖，全中國全人類最光輝莊嚴的英雄。」

1985年

■ 2月18日嘉義縣長涂德銜表示，已經透過中央民代奔走，由觀光局撥發專款，委請中興大學工學院院長漢寶德，規劃吳鳳廟的擴建工程

■ 9月9日省主席邱創煥上午9時到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吳鳳廟，爲吳鳳成仁216週年主持祭典。由立法委員吳延環和蕭天讚開幕剪綵。嘉義縣教會人士和原住民前經示威抗議：「神化吳鳳，醜化山地人！」

■ 9月10日中央日報指出，吳鳳廟的擴建費用一億五千萬，由交通部觀光局、台灣省、嘉義縣各籌三分之一經費。

■ 9月30日，中研院民族所出版「台灣土著族的傳統社會文化與人權現況」。第4章「鄒族社會文化與人權現況」，記錄如下：

「吳鳳鄉的鄒族人從小就必須承受外界漢

人異樣的眼光，其中最爲難堪的是在一般國民小學的課本中，就已明白指出阿里山有一族殺掉民族英雄吳鳳的「番人」。漢人的優勢文化，在承受日人有意的扭曲之下，崇高的突顯出吳鳳的人格，相對的也貶抑了鄒人的人格。

「漢人在竭力讚揚吳鳳高潔勇敢捨生取義的偉大精神之時，一方面中了日人扭曲歷史以造成台灣原住民與漢人糾紛的流毒；另一方面此種自我優勢文化誇耀的意識型態，深刻的刺激與斷傷了鄒人的心靈。至今，鄒人一提及吳鳳還是切齒憤恨的，祖先的傳說不遠，他們相信有證據證明吳鳳也只不過是一名替他所屬的漢人服務的通事，甚至於是一名也會利用政權方便出入山地進行買賣貨物的商賈。」

「在人權思潮普遍覺醒的今天，鄒族人是日益反感吳鳳所代表的意識象徵，年輕一輩會向平地人辯解或唾罵，老一輩的人是至死都不願踏進吳鳳廟一步。」

■ 12月9日內政部民政司長居伯均表示，山地行政會報已決議正式向教育部建議，取消國民小學教科書中頌揚吳鳳的故事，以免加深山胞與平地民衆間的歧見。

1986年

■ 3月31日台大歷史研究所翁佳音，在《台灣風物》發表論文〈吳鳳傳說沿革考〉

● 按：本文立論公允，用力最深，也是有關吳鳳神話的諸多討論文章中，最具有整體批判性的一篇論文，影響極廣。

1987年

■ 5月22日國立編譯館小學教科書「社會科」及「生活與倫理科」編審委員聯席會表示，「生活與倫理科」第一冊，由於新書已印妥，〈捨身取義的吳鳳〉課文已來不及刪除，但將於第七十七年度以其他人物取代「正義」一課中的吳鳳故事。而「社會科」第三冊因尚未付印，有關吳鳳部份，將立即修改某些觀點，但不予刪除。

國際瞭望

南方世界

——人口問題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全球人口的成長趨勢

1985年1月，聯合國秘書長在「世界人口隔年年次報告」中發表的85年初全球人口總數是48億人。根據聯合國專家們對未來的估計，到了公元2000年，這個數字將增至61億人。75年時點的人口總數是40億萬人，算算在25年之間增加了50%。在長期的人類歷史中，如此急激的人口增加，是進入本世紀以來，特別是過去數十年間的突出現象，這一點我們不能忽略。

不過，就世界人口的年增加率來說，60年代前半的2%是個最高峰。到了70年代前半，則稍減為1.9%，後半則更降為1.7%，呈漸

減傾向。聯合國的預計是，到了本世紀末，增加率將再減為1.5%；2025年將跌破1%；到2100年，增加率可望變成零。世界人口屆時將以102億的數字進入靜止狀態。

最近的人口增加率的漸減現象，據說是以「人口大國」的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及其他各國的人口抑制政策逐漸奏效的結果。中國的人口增加率一直到10年前還是2.4%，現在却已經減半為1.2%（根據84年中國政府所發表之資料）。

不過，世界的人口增加狀況，是因地區而異，差別甚大。在北方先進國家，增加率早已降為1%以下，而與此相對，在南方的開發中國家群，則仍然保持著高水準的成長率。亞洲地區除了一部分地方外，多已低於2%，但中南美仍然是2.3%，非洲更是依舊保持3%上下。

人口情形的變化是，自出生率和死亡率同高的「傳統社會型」，經過多產少死的過渡階

的現實 (四)

的南北差異

/ 辛一鳴譯

原刊1986年1月日本《世界》雜誌紀念文集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段，因而達到少產少死的「近代社會型」，這是一般的通論，也是多數人口學者所說的「人口轉換」現象。開發中國家的人口增加率之所以特高，據說是因為處在這種過渡階段的緣故。也就是說，雖然死亡率開始下降了，但因為宗教或習慣等傳統社會的價值觀仍然發揮著影響，使出生率並不跟著下降，仍然維持著人口高度的自然增長。

結果是，先進國和開發中國家間的人口分布，以60年代為分界綫，急激地拉開了距離。南北兩方的人口比例，從本世紀初以來的大約60年間，維持著一比二的狀態。但最近這20年間，北方人口達到了11億3000萬人，而南方却超越了33億，比率變成了一比三。此外，今後人口增加的原動力的15歲以下的少年層所佔比率，在開發中國家是先進國家的五倍弱，約有45%上下。如果這樣下去，到本世紀末，南北人口比例將變為一比四，2025年時則為一比五、南北間的人口差距愈來愈大。

人口問題與糧食問題的連帶關係

人口偏在的現象，和其他南北問題可以說是一體的，是南方世界的一項負荷。

首先是糧食問題。開發中國家的糧食增加總是趕不上人口的增加。因而非洲、中南美洲、和部分亞洲地區，大約有4億5000萬人經常陷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甚至飢餓狀態。這是南方人口中的七分或八分之一的比率。僅用馬爾薩斯的古典理論——人口增加是諸惡之根源——，是無法理解其背景的。通過殖民地支配時代以來的負面遺產的單作經濟，或多國籍企業的市場農業（agribusiness），南方的糧食被擁有經濟力的北方所吸奪。使其本已貧乏的糧食情況更加惡化，這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結



貧民區

構性問題。

對於馬爾薩斯理論有這樣一種批判：「人口不止於是一張嘴，還有兩隻手」，強調人的生產者角色。不過，這種說法在先進國即使是真理，在多數開發中國家，事情卻沒有那麼簡單。因為人口增加率在這些國家是對資本積累的耗損，對走上經濟發展的國家，的確是一種負擔。

人口增加快速，還會招來人口向都市集中、貧民區的擴大、高失業率、貧富差距的擴大、教育條件的降低、生活環境的惡化、生態系統的破壞等等惡性循環。對社會、經濟、政治的各層面都會產生不良影響。

1974年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了首屆世界人口會議。各國政府代表聚集一堂，議論的焦點是「人口抑制乎、開發優先乎」。當時多數開發中國家都主張「人是國力」、「開發是最佳的避妊方法」，把政策重點放在開發上面。但曾幾何時，10年後的1984年，在墨西哥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人口會議中，代表們的論調變為「如不努力解決人口問題，開發政策也將落空」。口號變成「要開發經濟，也要限制人口」，表現出開發中國家的危機感。

貧民區

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急速擁向都市，其結果是造成貧民區日益嚴重的擴大。成群的失業者、環境污染、犯罪、社會不安的增大……。城市貧民區，可以說是社會病理現象的綜合表徵。

slum（貧民窟）這個字，據說是意味着「貪睡」「沈滯的無活動狀態」的英語slumber的語源。也就是說，這句話的背後，有「社會落後者寄身的反社會地帶」這樣的意思。不過，光從這種見地，是不可能把握所謂的貧民區，特別是今天在開發中國家日漸擴大中的貧民區的形成背景和實態。

貧民區是臨時搭建的不良住宅的密集地，在地理上多是城市中心的鬧區和它的周邊地域的接觸部分、或商業地區和工業地區的交錯地帶等，所謂的「地域性格」或利用目的曖昧不明的所在。像橋台下面、河床地、低濕地、公園、墓地、火葬場、傳染病院附近等，一般市民不願意居住的地帶，也容易形成貧民區。因為從城市的消費生活中所排出的「剩餘」，形成了貧民區生活者的主要的生活資源，不能遠離都市中心也是貧民窟不可缺的地理條件。

貧民們從農村流入城市，但那不僅是因為農村人口爆炸的壓力，也是經濟開發政策導入的結果。不僅是當地富農，甚至外國資本都會侵入農村吸收土地，逼使喪失土地的貧農，或因近代化貨幣經濟的滲透而極需現款收入的人們，不得已大量地湧進城市。但城市穩定的就業機會是有限的，且這些人對城市生活也多不具有適應的技術或手段，於是，只好身不由己地流入貧民區。

多數政府都以低成本住宅的建設、強制遷移、歸農運動等試圖消滅貧民區，但因為對雇用機會的擴大或農村生產力的提高這樣根本性的問題一時尚無法解決，所以對都市貧民區總是力不從心，難予根除。

世界主要國家乳兒死亡率與普通出生率的推移

		蒲爾基那法索	阿富汗	愛沙尼亞	塞內加爾	埃及	菲律賓	中國	蘇聯	匈牙利	西德	美國	澳洲	瑞典	日本
乳兒死亡率	1960	250	230	180	180	170	110	170	33	48	34	26	20	17	30
	1981	210	200	150	140	120	50	41	26	21	12	12	10	7	7
普通出生率	1960	49	50	51	48	44	47	39	25	15	18	24	22	14	17
	1981	48	47	48	48	36	34	21	19	13	10	16	16	11	13

死亡率：人口統計上的死亡率，通常以人口一千人中的年間死亡數表示。

乳兒死亡率是出生一千人中未滿一年死亡的乳兒數。

出生率：人口一千人中的年間出生數。

資料：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1981 年統計。

嬰兒死亡率

開發中國家的死亡率，總比先進諸國高。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81年統計，世界上嬰兒死亡率最低的國家是瑞典、日本、芬蘭等，都在0.7%以下。然後是瑞士、挪威、荷蘭、丹麥，這樣的順位。2.5%以下的國家則包括部分東歐國家的歐美國家群。

與此相對，嬰兒死亡率高的國家，是以西非的蒲爾基那法索的21%為首。阿富汗、獅子山、高棉等屬於非洲、中南美洲、亞洲區域中的一大半開發中國家群，都在5%以上。其中的大多數都停留在10%的高水準。出生嬰兒10人之中便有1人以上在1歲未滿前夭折。

不過，歐美先進國家的嬰兒死亡率，在本世紀初葉也和今天的開發中國家一樣的高水準。後來因伙食、飲用水、住宅、環境衛生，以及教育、所得等生活水準的提高，才使嬰兒死亡率驟降下來。保健醫療方面的技術進步，也大有貢獻。

另一方面，在這期間，開發中國家也為了降低嬰兒死亡率而努力過，但成績不彰，仍然

停留在前記水平上。

有關開發中國家無法達到目標的理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編纂的「世界兒童白皮書」（1984年版）中指出，先進國家減低嬰兒死亡率是以經濟、社會的進步為主因，而醫療服務是副因。但在今天的開發中國家，這個主副關係大致是逆轉的。書中進一步提出了如下的分析：

「在開發中國家，像殺蟲劑、抗生素、車輛等新事物的導入和飢餓防止、預防疫苗、防疫等新手段雖然收到了很大效果，但全盤性的開發和生活水準的提昇，只停留在副次性的作用。例如在印度，嬰兒死亡率減低的四分之一，來自使用D D T撲滅瘧疾。像這種模式的改善，遲早總會遇到內在的限界。近代醫療要在短期間普及於全國，在一個經濟貧困的國家是嚴重的負擔。結果是，嬰兒死亡的激減現象，比先進國家更早就停滯下來了，以致還保持着相當的高比率。」

也就是說，對開發中國家的大多數國民來說，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總是趕不上使近代醫療技術發揮效果的水平。寧可說，這中間的差距是愈來愈大。



第三世界飢民

根據世界保健機構的調查，開發中國家的嬰兒死亡的主要原因，有下痢和營養不良、麻疹、呼吸系統疾病、破傷風、瘧疾等。

營養不良同時也是引發其他疾病的要因。還有，懷孕中的母親如果患有營養不良症，即使不是早產兒，而是正常妊期生下來的嬰兒，其體重多不滿 2500 公克。這樣的低體重嬰兒的死亡率，據說高於正常嬰兒數倍。

不用母乳而用奶粉哺餵嬰兒，這樣的流行正在開發中國家的城市地區擴大中。這種育兒法和嬰兒死亡之間的關連也不應被忽視。

先進國家的奶粉製造商常以「吃奶粉能成長活潑聰明的孩子」「母親的乳房不會變形」等口號發動促銷運動，發揮出很大的影響力。在迷人的宣傳文句的灌輸下，開發中國家的不少母親們，雖然本身不缺奶汁，還是從艱困的家計中抽出錢來購買奶粉。但因衛生條件不備，無法保證飲用水的清潔，以這些不潔的水沖泡奶粉哺餵嬰兒，常常帶給嬰兒死亡的危險。

嬰兒幼兒的死亡率若高，必須維持更高的出生率，這是自然律之一。現在還有「孩子是

寶貝」、「上天所賜」這樣的價值觀，和「孩子是將來的勞動力、是老後的安全保障」這樣的實利觀念。多數開發中國家所背負的人口增加問題的背景，就是這些心理因素。

與此相對，在先進諸國已經證明了另外一項事實——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嬰、幼兒的死亡率一下降，人口增加率也同時減少。也就是說，生下來的嬰兒的存活率一提高，自然會抑制出生率。這是一種經驗原則，如何拿來適用在開發中國家的人口問題上面，不失為一重大課題。

爲了達成嬰兒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問題的改善，除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外，包括婦女教育、婦女醫療和衛生的充實等在內的婦女地位的提昇政策，也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綠色革命

直到數年前，多數亞洲國家都是糧食的輸入國。但在這兩三年來，整個情況改觀了。在 1985 年那一年，中國竟然趕過了美國，成爲全球第一的小麥生產國，不僅小麥，連稻米、玉米都有了輸出。從來是飢餓國的代名詞的印度，也因連年豐收，苦於剩餘小麥的缺乏貯藏場所，非正式地向日本打聽可否買些印度小麥贈給非洲。此外，印尼、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國，也都達成了自給自足的目標。

成功的理由除了連年的好氣候外，最重要的還是品種改良的進步，帶來了小麥或稻米的高收穫量。這樣，改良小麥、稻米、玉米的品種，開發出高產量新品種，且把它普及於全國，這個運動業績，就叫做「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的首次成功在墨西哥。1944 年，美國的洛克菲勒財團，應長年來苦於糧食不足的墨西哥政府的要求，爲了改善該國的農業技術，而把一批年輕的農業專家派赴該國，這是綠色革命的起點。後來參加工作的諾曼·波洛格博士（現任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所長），終於成功地栽培出了高產量的小麥新品種

，達成了真正「革命」性的增收。

在日本，爲了提高小麥產量，造出了能支撐重穗的矮種小麥「農林10號」。戰後不久的1947年，美軍的農業顧問到了日本的東北地方，發現這個品種，帶回美國後，以此爲母種，培育出了短稈種的「凱恩茲小麥」。波洛格博士是用這個凱恩茲小麥的遺傳因子爲基礎，進行許多小麥的交配研究，終於育出一種合乎墨西哥風土的新品種。

在未導入這個新品種以前，墨西哥的小麥生產量不過年產30萬噸。新品種普及後的產量是8.7倍的260萬噸。一公頃平均收穫量也達原來的4.3倍。

利用這個情勢，在其他作物方面也推動了品種的改良工作，在同一期間，玉米產量也由350萬噸增加到900萬噸。波洛格博士由於這份功績，被授爲197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受到成功鼓勵的洛克菲勒財團，意圖把綠色革命推向營養不足人口最多的亞洲地區。得到了福特財團的協助，在馬尼拉郊外的洛斯巴尼奧斯創立了「國際稻米研究所」，時在1962年。從各國網羅了優秀的研究人才、收集了數萬種稻米品種。經過了各種各樣的交配試驗後發現，印尼的粗硬長稈種的「貝打」和來自台灣的短稈種「矮腳烏尖」的配合，會產生具有優秀特值的新品種。該新品種被命名爲IR—8，俗稱「奇蹟米」，普及到全世界。

自60年到80年，亞洲熱帶的稻米收成平均增加了40%、產量上升了60%，這都是國際稻米研究所的功績。全世界的稻米中的65%含有IR系統的基因。改良工作後來也不曾停頓過，以這IR—8爲母種，衍生出不少新品種。其中尤以IR—8和六個國家13種品種的交配結果產生出來的IR—36，在1976年開始實驗栽培，因其高產量和耐病蟲害的優點，而被舉爲近年最大的成就。菲律賓首先引進這個新品種，結果到1982年由原來的稻米輸入國變成輸出國，有了十萬噸的剩餘輸出。

但隨着高產量品種的普及，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爲了達到高產目標，需用大量的肥料和水。開發中國家的灌溉設備本來就不周到，多數國家都是所謂的「雨水農業」。爲了推行綠色革命，須要新的農業投資。一向貧困的農民們無力投資，能收到高產量恩惠的只限於富農。於是階級差距愈來愈大。富農中的多數開始使用機械，爲了提高機械化效率，他們覺得需要更大的耕種面積。結果是，貧農多喪失了土地，變成了佃農，甚至變成了無土地的流民。這樣的現象逐漸嚴重化了。

還有，一般說來高產量作物對害蟲的抵抗力較弱，採行單一品種大面積的耕作方式的地方，往往遭受潰滅性的大損害。這種情形導致了農藥的大量使用，却使農村中的新問題——農藥中毒的情況日益嚴重。

附記：

1. 世界人口的變化：

比較信而有徵的數字是1650年左右的5億人。200年後的1850年超過了12億人。再100年後的1950年達到了25億人的概數。達到50億人的時間也已經被估計出來。可見人口倍增的期間是加速的縮短。

2. 貧民區人口知多少：

根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東南亞各國的城市住民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非洲和中南美洲是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爲貧民區住民。印度的孟買地方，全人口約900萬人之中，約450萬人住在貧民區。孟買貧民區的規模是世界有數的。甚至連陋屋都沒有的「路邊生活者」也不少。

海峽瞭望

對岸生活素描

/ 曾聞啓

異科植物間的雜種 培育成功

新華社最近表示：中國在不久前運用遺傳工程學方法，以不同科的植物相互間交配，成功地獲得了雜種 hybrid。這些新出世的雜種系統，包括菸草和菠菜、胡蘿蔔和蘆筍、芋頭和菜豆的雜交新品種。

把異科間植物的雜種培育成功的是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候補研究員吳伯驥帶領的六人小組。他們的實驗開始於 1985 年。吳氏小組是以人工把特定植物的染色體和細胞質，通過細胞壁移到別種植物的細胞內，終於獲得成功，產生了新雜種。一般菸草的焦油含有量是 4.27%，但菸草和菠菜的雜種中的含量却只有 1.78%。在製成紙煙時，使其品質大大獲得改善。中國的

植物學者表示：「這個新技術的操作方法簡單、在普通的實驗室就可以進行，對世界的作物育種領域將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日本菸草產業中央研究所顧問長尾照義氏說：「像這種的研究需要採取人海戰術。在中國是可能的。不過有關這次的成果還得看看酵素方面的資料才能斷定」。

空中纜車鳥瞰萬里 長城

北京郊外的慕田峪，自去年四月起被開放為觀光區後，到了六月開始設置空中纜車，做為空中參觀萬里長城的新節目。

由大陸和香港的兩個企業共同投資 500 萬美元、工程則委給日本纜車公司，由其負責設計、機械製作、和技術指導。工程進行順利、自今年四月

起開始試運轉和從業員的訓練工作。

據報導，纜索全長 723 公尺、全線高低差 251 公尺、纜車走一趟需時 3 分鐘。備有 6 人坐吊籃 58 個，以 12 秒間隔開車。單程，最快 1 小時可以搬運 1800 人。

東北發現丹頂鶴的 故鄉

根據新華社瀋陽電，數千年來在東洋文化圈被認為最名貴的世界稀有鳥類丹頂鶴，在中國東北遼寧省盤錦市雙台河口自然保護區內成群棲息着。

這一消息廣泛地引起了全球鳥類專家的注目。自 5 月 8 日起至 16 日，世界鶴基金會會長亞基波特博士，美國野生動物研究中心所長埃利思氏，日本鶴類專家園田好人等「鶴界」權威人士相繼到此訪問視察。

亞基波特博士興奮地發表



談話說：「我們必須鄭重向全世界發佈消息，鶴的故鄉是中國的盤錦」。

盤錦位於遼河下流的自然保護區，境內有 8 萬公頃的蘆草沼澤地，最適合於丹頂鶴的生息。據說 1986 年的概數大約是 100 隻，到了今年 4 月，只在其中的一區，便發現了 120 隻的丹頂鶴群。

五百年前明代名畫出土

根據最近一期的《文物》雜誌刊載，在江蘇省淮安縣淮城東郊的開口村，最近有一座明代夫婦合葬的墓被發掘，經證明為明代書畫收藏家王鎮（1424～1495）夫婦的墓。墓中藏有明代著名畫家戴浩的「秋江喚渡圖」等 25 幀作品。全部絲毫無損地出土了。其保存情況之良好，使人無法想像這些畫已經埋在土中五個世紀

之久。

有關人士說：「其中也有被認為已經失傳了的作品。這次的發現意義實在重大。」

最初被發現的是塞在王鎮的木仍伊左右兩脇下的卷軸，後來陸續發現多幅作品。大都畫在絹布上面，也有使用畫紙者。

戴浩的「秋江喚渡圖」畫在橫捲紙上面，高 28.1 公分、橫 55.2 公分。此外還包括明除良的「太白騎鯨圖」、李在「萱花圖」、馬軾「秋江鴻雁圖」、夏昶「墨竹圖」、謝環「雲山小景圖」等，全為明代著名畫家的作品。

日本「麪連會」借人民大會堂開大會

日本庶民社會中最富本土色彩的「蕎麥麪店」的全國性團體—日本麪類業團體聯合會

，在 6 月 11 日借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定期會員大會。

本次大會參加人數約千人。該團體的會員總數三萬，會長是野川康昌氏。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借給日本的職業團體召開年會，這是頭一次。

昭和 37 年的 1972 年，中日綜合貿易備忘錄中規定自中國輸入蕎麥原料。初期輸入量約 1400 噸。但近數年來數量激增，去年達 6 1000 噸，約佔日本蕎麥消費量的三分之二。

日麪聯有鑑於這方面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早幾年便提出申請要在北京召開大會。到了去年 10 月才獲得中國當局的同意。麪連會的專務理事塙操氏說：「大會從前都在甚麼觀光勝地吃喝熱鬧一番，我們覺得沒甚麼意義。為了使大會有一定意義，才決定到北京來」。（取材自朝日新聞）

學海探微

身份與立場 (三)

——環繞台灣史研究的諸問題

原著 / 戴國煒

翻譯 / 勞歸

九、庸俗論調的橫行

在如此的真實情況之下，只能看到有關台灣的、粗糙而不正確的印象論橫行於世，的確令人困惑。

這裡讓我介紹一個印象論的惡例。記得是十一、二年前的事情。在《柳田國雄研究》計劃下，由有賀喜左衛門先生、谷川健一氏、宮本馨太郎氏、和本人四個人開了一次座談會。在那次的座談會中，專攻日本史的宮本氏對本人說：「戴先生，歷任的台灣總督中海軍出身的多，所以在殖民地統治方面相當順利，朝鮮方面因為都是陸軍出身，所以毫無政績。」（大意如此），這句話讓我大吃一驚。

五十年之間，台灣歷代總督中的海軍出身者，其實僅有三位。即使是第一位，也就是初代總督的樺山資紀，也不過半途由陸軍移籍海軍的人。另外的兩位是太平洋戰爭前夕的小林躋造，和戰爭發生後的長谷川清。像這樣錯誤的印象論並不是宮本氏一個人所獨有，而這樣誤信着的人並不在少數。所以即使當場糾正宮本氏，問題還是很嚴重地遺留下來。

再介紹一個俗說吧。是十四、五年前的事

情了。記得是在「亞細亞政經學會」會中發生的。某大學的一位M教授，對殖民地支配的成果方面，滔滔不絕地發表着台灣與朝鮮的比較論。他的結論是，因為台灣氣候溫暖，所以搞得順利。好一個地理唯物論！於是乎我質問了。「那麼，比台灣更溫暖、天然資源更豐富的南洋，也就是現在的東南亞一帶，究竟如何呢？光從氣候這一方面來說明台灣，好像不太……」我的話還沒問完，那位司儀先生大概顧慮到他的面子吧，插嘴說等散會後再由兩位做個人討論比較好，草草地宣佈休會了。

這一類俗論、印象論，為什麼這樣輕易地橫行於世呢？我想了這個問題。

依我的想法，第一個原因是認真從事於台灣研究的人太少……。第二個原因，是來自於台灣人這方面的「反應」，間接地支持這些俗論、印象論……。這就是我的判斷。

關於第一個理由，這裡不再重複。簡單地報告一下第二理由。

十、台灣方面的「責任」

在那一篇《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中，我試着把殖民地化前夕的台灣，由以下的三個焦

點加以整理：

1. 寄生式地主制度已相當成熟，形成了具相當厚度的中產階級層。

2. 樟腦、砂糖、茶葉等國際商品，已有相當的產量，並輸出於國際市場。米的產量也已有剩餘，也已進入大陸市場。

3. 以此社會經濟條件為前提與背景，清朝在台灣推行了洋務運動，亦即近代化運動（實施土地調查、鋪設鐵路、海底電纜、引進機械化製糖法等）。

這一番洋務運動的「成果」，後來變成了殖民地化的架構，與日本的殖民地開發事業相結合，對後藤與兒玉的台灣政績發揮了「正面」作用……。

因1945年8月25日的歷史轉機，台灣終於回歸了祖國——中國。

所謂的回歸，也就是自既存的日本支配秩序中脫離，進入於當時正由重慶復員至南京的國民政府（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經濟秩序中的一段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許多摩擦和衝突。當然，主因是國民政府派來的接受機關與官員的失政。終於在回歸後不足一年半的二月底，發生了有名的「二·二八暴動事件」（以1947年2月27日晚間的黑市香菸取締事件為導火線，發展為全島性反政府暴動）。暴動招來了彈壓，有相當數目的台灣人領導者被犧牲了（農民與勞工幾乎沒有參加）。

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共政權成立於北京。由於二·二八事件的後遺症和對中共政權的忌避心理，在海外的台灣中產階級之間，從五〇年代初開始，產生了台灣獨立運動，當時的運動中心在日本。

整個五〇年代中間，邱永漢先生的言論活動（主要以《中央公論》和《文藝春秋》兩雜誌為舞台），便是這個運動的一個反映。還有，凡是對台灣懷有關心的一般日本人，大都會看王有德先生的《台灣》，這也是屬於同一部類的書。

邱、王兩位前輩的「說辭」，日本人聽來當然很順耳。連老學人矢內原先生都無法處理不同邏輯層次的問題，則一般日本讀者無能抗拒邱、王兩位的「蜜語」，那也不足為怪。

當然，即使在邱、王兩者之間，也有行動模式和思考方法上的微妙的差異。不過大致說來，他們都認為台灣是因受過日本的支配而得以近代化。他們也討厭國民黨，認為晚景不長了，但對於可能接踵而來的中共的合併台灣，覺得是更糟糕的事。他們有這樣的共通心情。說實在，這樣的心情並不罕見。在台灣的中上階級，特別是那些曾經從日本的台灣支配價值體系中獲取過「分嗜利益」機會的人們，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變成了「日本秩序與殖民地支配價值體系」的俘虜的中壯年齡層中，是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着這樣的心態的。

不瞞各位說，我有一位堂兄（現已逝世），也是懷有這樣觀念的人物。他是被徵用到海南島的日本陸軍的一員，開始是由於服從命令，後來是因為情性，當日本軍的馬前卒，搞些軍政方面的下層工作。

日本戰敗的結果，當然，具有台灣人身分的他，離開了日本軍隊。海南島的中國人指責他「身為中國人一分子的台灣人，還替日本軍隊做事……」，使他「狼狽」不堪地回到台灣來。他並沒有自覺自己有何「責任」，一念怨恨，參加了二·二八事件。一度繫獄後被援救出來，此後心情苦悶，至死還夢想着台灣獨立。

當然，他是位親日派，有舊識的日本人到台灣訪問，他殷勤招待，各處陪遊、開宴席。

與我堂兄同年代的人們，愈是上流階級，愈不會說中國話——北京話，但日語却很拿手，甚至連母語（屬於中國方言的，一般被稱為台灣話的閩南語及客家話）都說不出口，這是實情。

今天來會的各位中間，一定有不少人曾經訪問過台灣，而遇到過一些日語流利、懷念着日本人的、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在這一類型

的台灣人的心情的「深處」，部份藏有剛才提到過的因素，這一點希望各位能瞭解。

報告過堂兄的事情，我想順便再提一提我的二哥的想法，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二哥大我十歲，還在世的話，今年應該是六十三歲。他早年留學東京，因為唸的是法科，逃不過「學徒從軍」，幹到「曉部隊」——俗稱海賊部隊的軍官。好在日本投降得早，撿回來一命，是個所謂的波茨坦少尉或是中尉。終戰後不但不回台灣，連信都不太肯寫。父親不放心，叫我順道到日本去看看究竟怎樣了。

因為當時我已經申請到了美國大學的獎學金，本來是想到美國去留學的。到了東京見到了他，他却說：「你不要急。先在東京唸兩三年再去美國……。」

我回答說：「我討厭日本人，我不願意留在日本。」他吃了一驚，問我理由。

什麼理由！在殖民地台灣遇到過的日本人的形象太壞了嘛！在校園生活中，經常被同學的日本人辱罵為「清國奴」。特別難過的是挨那些留級的太保日本學生一頓揍。軍事教官、劍道老師、國語（日語）老師等，動不動就開口罵「清國奴」。這種痛苦的受辱記憶，在離終戰僅十年的一九五五年，當然還很鮮明生動地，帶着個人的屈辱感、挫折感，存留在腦海裡。

聽完了我的牢騷，他以平靜的語氣說：

「你的目標是社會科學。可是，你却以個人的體驗而憎恨着日本人，氣度太狹小。我們的確受過日本人的欺凌，我的軍隊生活尤其悲慘。但我們所應憎惡的對象，應該是把日本人驅向作惡的、那種帝國主義的體制和制度才對。一般的日本人，雖然層次稍有不同，也同樣是那種體制的犧牲者。站在個人立場恨那些個別的日本人有什麼意思。連這一點感情上的障礙都克服不了，還想留學做研究嗎？……」很嚴肅地訓戒了一頓。

二哥年齡比邱、王兩位大兩、三歲，我們的家是醫生兼地主，也經營碾米廠，在這方面

和邱、王兩前輩的出身沒有太大差別。可是他對邱、王兩位的論調不滿，常說「這些人太輕浮」，看不起他們。

我想過，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大概是幼年期的教育背景的不同所帶來的吧。我們兄弟都受過祖父的嚴格的管教，祖父是一位漢學家、民族主義者。在我們兄弟姊妹之間，沒有一個進入日本人小學校當共學生（聽說婉拒了日本當局的勸誘）。那些共學生的家庭，多數若非日本當局的買辦、協力者，也是機會主義者。

我的二哥還有如下一段話：「你應該努力去原諒日本與日本人，因為被納進一種體制裏面的個人，只是個可憐蟲。一般說來，個人即使懷有滿腔善意，也做不出什麼。以我來說，我並沒有志願什麼學徒從軍，一切都是強制，如果拒絕到底，一定要抓去坐牢，有心的日本人同學，心情都一樣。那個會真心替日本軍部打仗呢……，那不是毫無意義嗎？」聲調裏還含着怒氣。

不久，五味川先生的《人的條件》成了暢銷書，二哥與我都耽讀了。我把書中主角的梔的苦惱，和二哥的話合在一處，用我自己的方式思考過「戰爭、體制與人」的問題。

十一、個人善意的界限

最近，日本人中間的一些所謂舊台灣關係者，用自費出版等方式，發表了不少「回憶錄」之類的東西。我都儘量收集拜讀著。不過，對於日本人的「善意表現」，我實在有感慨。

一般說來，像教育關係者，都是在充滿善意的回憶中，主張自己當年是如何地拚命努力過。

遺憾的是，在我所看過的範圍內，沒有一篇文章是檢討殖民地體制下的教育的意義和界限的。

六〇年代後半以降，台灣的經濟好轉了，

日、台之間的來往變得頻繁，一些台灣老人招待昔日的日本人「恩師」，變成了風尚。

日本與台灣，同屬於儒教文化圈，重溫師徒故交是好事，也可以說是很平常的事。

不過有人把這類的招待與歡迎，自負為美談，甚至有人趁此而證明前此日本的殖民地教育是善、是成功的文化傳播，故意造成「美麗的誤解」。這樣的事情使我們吃驚。

我的書的讀者裏面，有一位以前的台灣公學校（台灣人子弟的「小學」）教員，對這樣的風氣很慨嘆，寫信給我說：「我也收過邀請信，因為覺得心理上還沒有準備，所以這兩三年之間大概不能成行。如果我去了，我要先向從前那些學生們謝罪，然後向那家以前教過書的學校提供獎學金或者捐贈一些樂器，到時候還請多多助言。」像這樣具有良心的教員，才是日本人的光榮。

歷史告訴我們，無論那一種殖民地體制，不論東洋式西洋式，都是罪惡的體制。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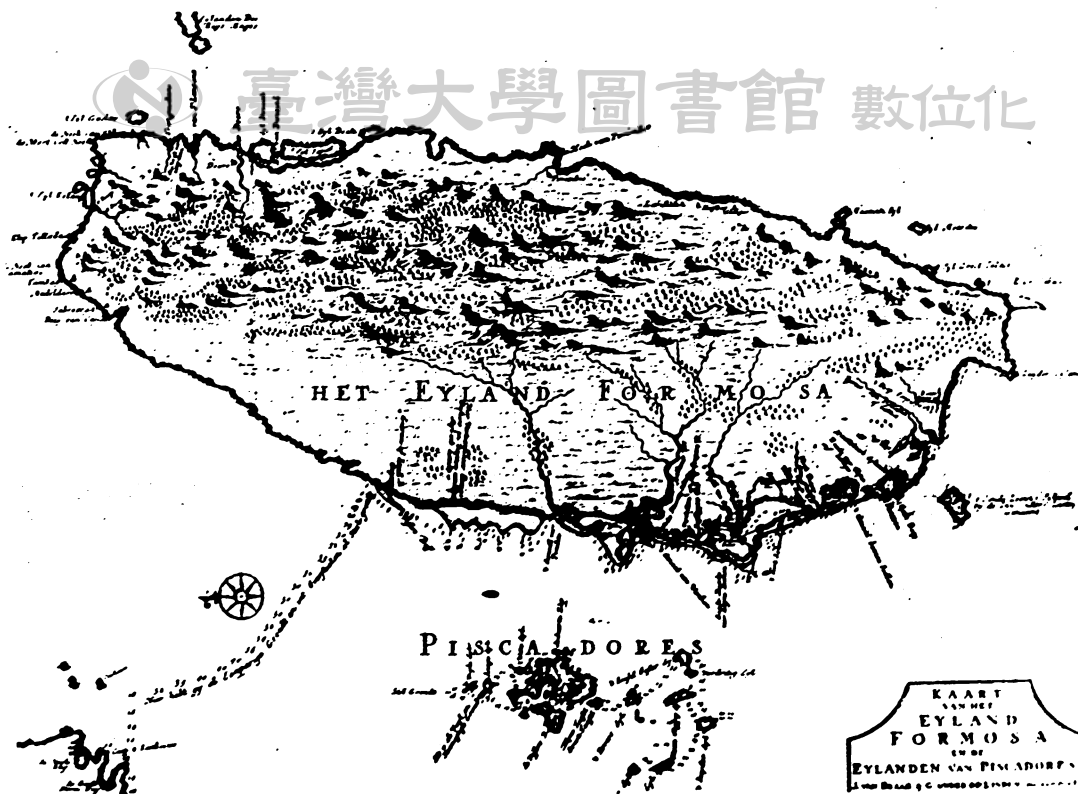
非常令人遺憾的是，這一份瞭解，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浸透到一般的日本人中間，對此本人深懷危懼之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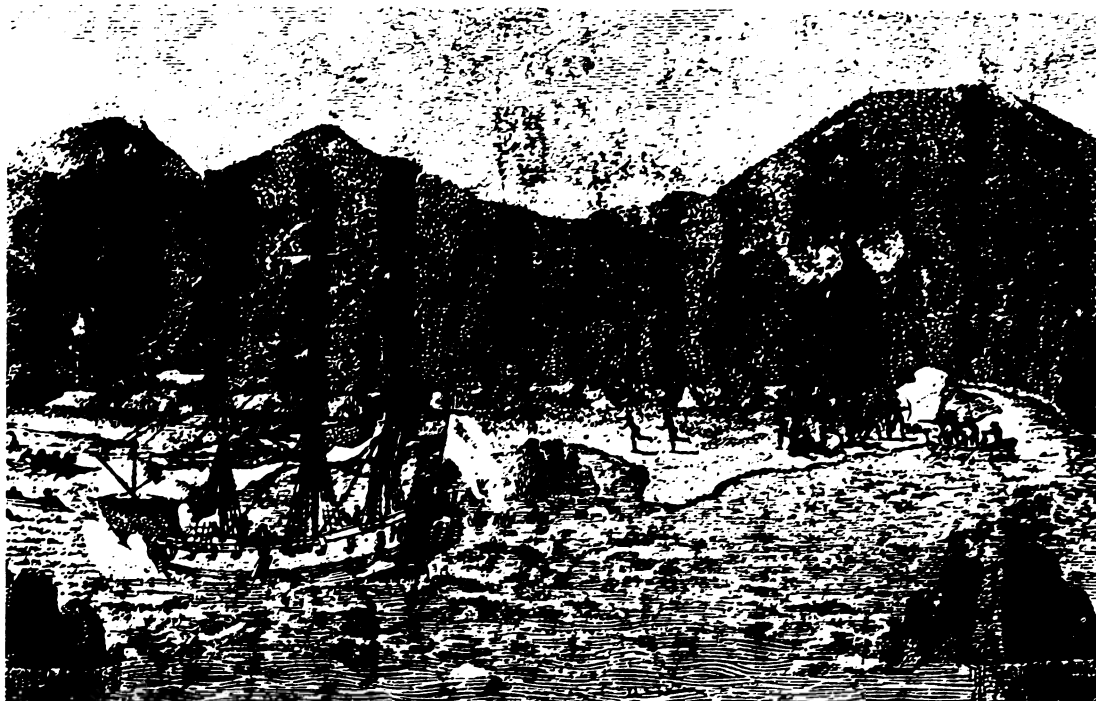
十二、台灣人和朝鮮人

有時候聽到一些對本人有好感的日本朋友說：「戴先生，你們中國人，特別是台灣來的，都很溫和，也很重禮貌，給人印象很好。可是那些朝鮮人，動不動唱反調，不顧情面。」云云。

一般的台灣人，聽到這樣的話就有點飄飄然了，總要趁着對方口氣表示同感，並和那位發牢騷的日本人一起來個「朝鮮人批判」——不過，與其說批判，倒不如說是背後罵人。像這樣的場面，經常會遇見。

有關日本人和朝鮮人之間的「相互厭惡」的問題，已經有很多分析和議論，今天不再提





出。今天我要澄清的是，我對殖民體制下的台灣與朝鮮的差異，以及由此一差異所呈現的各種現象的解釋。

前面我已經說過，殖民地化以前的台灣，早已經有寄生地主制的存在。因此，日本人地主無法進入台灣的農村部門，更不用說生根了。

那麼，朝鮮的情形如何？有東洋拓殖株式會社，日本人地主在相當的範圍內又進入了朝鮮的農村領域。因此，農村的農民階層的兩極分化出現了，在那分化過程中被擠出來的貧窮者，或被帶往日本，或自動到日本討生活。兩地距離近，也有關係。總之，住日朝鮮人的從業範圍廣、人口多，這就是遠因之一。貧民們來到日本後，多數當然只有進入最低的社會階層。民族的偏見以及社會的偏見，更因為來日朝鮮人的職業的種類和所得的低賤而增大了。

朝鮮是整個國家被殖民地化，有李王家與兩班的存在。兩極分化的結果，以朝鮮「共產黨」為首的激進抗日革命運動，頑強地展開了。

當時，台灣也有過「共產黨」。比較弱質，人數也少。台灣不曾存在過獨立的國家體制

。貴族只存在於山地少數民族的「酋長」制社會中。原來台灣是中原—中國大陸國家的國內殖民地。台灣的殖民地化，是把中國邊境上的南海—孤島切斷，納入於日本經濟圈的外緣，這就是全部的事實。在這個過程中，台灣人不能和中國大陸人民共同體驗中國的「近代」的胎動。尤其是，重新被編進日本殖民地體制中的，以地主階層為中心的中上流階層為然。

因為是個孤島，抗日運動在台灣沒有庇護地。但台灣海峽的對岸，至少在形式上還存在着「祖國」，對台灣人來說，無論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是抗日運動的「庇護地」。

台灣的農業生產力，以甘蔗與稻米的連作方式而提高。糖業帶來了就業機會，以寄生地主為核心的中產階級的社會厚度，發揮了維持台灣農村的相對性穩定的作用。來日的台灣人，多數為中產階級出身的留學生、貿易業者。當然，他們所從事的抗日運動，差不多是以溫和的改良主義為中心，台灣人在日本人印象中的形象，自然不致於太惡劣。「有錢的少爺」總是顯得懦弱，甚至讓一般人感覺得有點可愛

的吧。人數方面，最多時也沒有超過五萬人。台灣人的勞動者，在日本幾乎看不到，只有戰爭末期被徵用到軍事產業的少年工和一部分青年工是例外。以上這些因素，才是台灣人與朝鮮人對待日本及日本人的行動方式的本質性差異的由來。我不採庸俗的強調「民族性」差異來說明這種由來。

不過，我的評價是，住日朝鮮人的「好唱反調」，使戰後日本變得「豐裕」了，尤其在文學的領域上，這種「好唱反調」產生了很好的成果，且也繼續地在產生之中。

十三、台灣獨立運動的支撐

台灣與朝鮮之間的差異點，還有兩大項。

其一，不曾聽說過朝鮮有「山地少數民族」。日本有倭奴，台灣有以泰雅族為首的少數先住台灣諸民族——一般被稱為高山族、山地同胞的人們。

其二，據說朝鮮半島上，雖有以意識型態為中心的南北對立，却沒有民族對立。即使有，也不過些許的「地域主義」的對立。

可是，訪問台灣的日本人，有時候會從一些日語流利的台灣人口中，聽到諸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對立、「台灣獨立論」、「國民黨罵倒論」、「中共反對論」等論調。

在朝鮮半島，基於意識型態的持續的對抗狀態，有廣泛的、民族統一的悲願的呼籲。幾乎聽不到分離獨立的論調。

在台灣，當然有國民政府主導下的反共、反中共運動的持續。除此而外，在台灣島「內」之外，還有以台灣人中產階級的滯外子弟為核心的「台獨」運動。

這些人倡「台灣民族論」，反對國民政府，也反對中共。他們主張，台灣民族已行形成，他們不是中國人，因而沒有被中國統一的理由云云。

他們的台灣民族論相當牽強。

台灣島內，的確有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對立。主要的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傷痕」還沒有痊癒，國府體制的民主化遲緩。不過，我認為，那是屬於地域主義對立的層次，而不是民族對立的層次的問題，兩者之間有根本性的差別。

本來，被稱為本省人的九成以上的人們，是在明、清期中，為了開拓新地而由福建、廣東兩省渡過台灣海峽，來到這個國內殖民地的人們的後裔，做為反國府、反中共、反中國的邏輯前提而提出的「台灣民族」，即使環繞着台灣的國內及國際條件已行出現且被容許，為了達成充分的成熟，今後還得經過相當的時間。

想把台灣民族的成立求之於歷史的「痕跡」，不能不說是件毫無道理的事情。

認為台灣民族論太牽強的另一批體制改良主義者，推行着台灣內部的民主化運動。這就是所謂的「黨外」運動的一部分流向。因為時間有限，無法深入詳論。不過我要指出的一點是：受日本的殖民地化和五十年的支配，正是台灣民族論的遠因之一。我希望日本的各位先生瞭解這一點。也希望各位多多地考慮，當民族內部的分裂抗爭到了熱血奔騰的時候，因為是「近親」，一搞不好反而會變成「淒慘」的大悲劇。

十四、山川均氏的『殖民政策下的台灣』

台灣獨立運動是一部分台灣人的心聲、動態，這一點沒有錯。不過給予過高的評價，或者在感情上把它和自己對台灣的「鄉愁」混在一起，我覺得稍有危險。

在矢內原先生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出版前不久，山川均先生的《殖民政策下的台灣》（收於《山川均全集》第七卷·勁草書房）發表了。前者主要的「資料」提供者，是當時東大在籍者的台灣人菁英及其周圍的人們。而

後者的資料來源，是不同於東大菁英分子的台灣人左翼，兩者走在不同的道路。

就如上述，自殖民地時代以來，台灣人的思想活動和政治行動，是具有多面性的。因此，如何掌握台灣的現狀，如何繪出台灣人的一般形象，要完成這樣的課題，是需要相當的努力。對台灣人以偏概全，不去洞察他們曲折、複雜的心理結構，只顧表示輕率的「理解」或「善意」，說不定會招來意想不到的「反撥」，這一點我想必須提醒各位。

十五、日本的亞細亞回歸和台灣模型的提示

剛才我要向各位報告我對研究的信念與態度，結果是把態度的部分說漏了，讓我補充一下。

自六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中期，大約十年的期間，我設籍於亞細亞經濟研究所。

那是整個亞細亞因越戰和文革而燃燒着的時期。日本資本主義一方面留意於那些情勢的發展，一方面全面推動着「新南進政策」和它的亞細亞回歸。美國為了防止越南革命的波及，推動以品種改良為中心的「綠色革命」，在馬尼拉設立了IRRI（國際稻米研究所）。拚命想造出高收穫量的優良品種。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注意的品種之一，是台灣的「蓬萊米」。

在台灣，輸入代替產業的培育初步上了軌道，接着因「加工出口區」的設立而鼓勵勞力密集型的輸出工業，台灣經濟的高度成長，開始受到了世人的注目。

由於這兩者相乘的好形象，做為亞細亞開發中國家的模範，台灣模型遂廣被宣傳，特別是由日、美兩國所提示的台灣模型，很容易把議論帶進對殖民地時期台灣的、沒有立場的評價。

我在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的時候，在身邊經常聽到這樣的議論，漸漸地感覺到一種危懼。

以企業的「進出」為中心的日本的亞細亞回歸，當然地把日本與亞細亞之間的摩擦、日本人與亞細亞人之間的「齟齬」，推向表面化了。

雖然有不少有心的日本人，呼籲大家去理解亞細亞人的「心」，但好像沒有什麼效果。隨著日本的經濟大國化，人們愈來愈習慣於「虛飾」，愈來愈看不見事情的「本質」，不可一世的驕傲的新生代也出現了。

不知不覺之間，我變成了日本與亞細亞之間的「邊際人」了。我的苦惱也愈來愈深。追求如何退止摩擦和「齟齬」的惡化、如何構築亞細亞與日本的芳鄰關係，變成了我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課題了。

我發現，妨礙日本人的亞細亞認識和國際化的要因之一，是日本人沒有真正體會到被殖民、被支配的經驗。

日本是唯一沒有體驗過這種亞洲共有的「病理」的幸運國家，這一點當然是可喜的。可是，被支配是病理，支配人家也是一種病理，本來還是有機會通過這種自己獨有的病理的反省，變「禍」為「福」的。戰後的日本人的確有過這種機會。

可是，現實的風潮却是：對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的「成果」的無條件評價，甚至歌頌。於是，我積極展開了我的言論活動了。《與日本人的對話》（社會思想社，一九七三年）、《邊際人的獨白》（龍溪書舍，一九七六年）等就是這一期間的小小的業績。後來，從這些文章裏面，再選出適切的部份，出了一本文庫本《新亞細亞的構圖——尋求芳鄰關係的出現》（教養文庫、社會思想社，一九七七年）。書中，我試着從更廣泛的視野，向年輕一代的日本人提出了我的呼籲。

十六、「共犯」構造的自我揭發

在前面所提的一連串「工作」裏面，我所

提起的視角有幾個方面，其中最被認為「新奇」的，是對被侵犯這方面的一些責任的指責。

同時我也指出，在侵略與殖民地經營的過程中，被侵犯一方的「共犯構造」，若不經過事後承認與自我揭發，要把它昇華為歷史教訓，並使這個教訓共有化，是非常困難的。

以我戴家為例吧。我們戴家一方面在抗日運動中遭受到血腥的彈壓，在殖民地體制下承受過無限的民族歧視。可是，另一方面，做為被編進殖民地體制下的地主、殖民醫學的使徒，却也有機會積蓄財產。在後一點意義上，我們戴家不但處在「共犯」者的地位，同時也可以說是屬於分嗜殖民地支配利潤「殘渣」的「特權階層」吧。

初期的侵略、統治過程中，「嚮導」都是我們台灣人中間的「自家人」。後來，從「同胞」中間繼續出了買辦和合作者，為分一杯「殘渣」而賣力。

又，殖民主義與侵略戰爭，不用說會帶來物質的破壞和財富的收奪。但更糟的是，它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侵犯者」和「被侵犯者」雙邊的人性加以破壞殆盡。我的提議是，日本的各位先生，經常和亞細亞的民衆一起來反芻這個史實。把侵略戰爭的悲劇、長崎與廣島的悲劇，進而把殖民地支配的歷史教訓，收進自己的歷史裏面，加以正確的定位，大家共同來描繪出光明的遠景。

十七、代結論—— 展望與盼望

以上，拉拉雜雜地講了許多。在我來說，瞭解台灣和台灣人全體的過去的真實，一如瞭解我們台灣關係者的個人來歷，同樣的重要。同時，我也相信，為了把台灣的過去和未來，連接在中、日關係（包括日、台關係），連接在日本與亞細亞的關係，甚至連接在亞洲和平、世界和平上面去思考，這份瞭解工作非常重要。因此，身為日本人的諸位，實在不應該放

在這種「台灣研究的缺陷」狀態。

其次，台灣史不僅是台灣住民全體本身的歷史。同時也是中國史的一部分，在此一意義上，更延伸其脈絡至東亞史、世界史。各部分之間，共有著一種有機關連。如果沒有這樣的掌握，恐怕會失去對亞細亞近、現代的「時代精神」的理解。

根據以上的觀點，我想重新提出下面的幾個課題，和各位共同思考，做為對研究工作的新挑戰的一部分。

一、近日來高唱着「世代不渝的中日友好」的構築。不過，我們要把頭腦冷靜一下，不能光喊口號。我們要分析解明，日本是如何通過台灣支配，而在歷史上強化了對中國人的「偏見」？把這段經緯分解清楚後，再把它變成一種教訓，做為中日友好的一個基礎。

二、在台灣的殖民支配體驗，對爾後的日本對亞細亞的關係方式，扮演了如何的角色，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我希望對其思想、政策的訂定和實施，以及統治技術等方面試予考察和整理。我期待着透過這種課題的完成，來摸索、甚至創出日本與亞細亞之間應有的新的關係方式。

三、住日外國人的過半數是朝鮮人。做為解析住日朝鮮人問題的一個新的視角，解決住日朝鮮人問題的一個途徑，我想對殖民地下的台灣和朝鮮，進行一種比較研究。通過比較研究和分析，相信能得到更多的史實。又，比較研究如有成果，當然也有可能對日本近、現代史的研究帶來新的刺激。在這一點上，務請各位協助。

做為第一步的嚐試，我和姜在彥先生，在《三千里》季刊第四十一號（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號）上面，做過一次題為《殖民地下的台灣與朝鮮》的對談。不久就會出刊了，到時請各位過目。

長時間多煩各位靜聽，謝謝各位。

（本稿係由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之講演記錄加以大幅度訂正而成。）

歷史與人物

日據時代台灣的 無政府主義風潮(一)

——范本梁與新台灣安社

/ 林 涯

前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的一九二〇年代，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鬥爭，除了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處境下，有它們各自的特殊面貌外，在總的資本帝國主義的支配規律下，也有其普遍共通的策略型態。

因為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政策，基本上帶有民族歧視的本質、殖民地社會的民族自覺運動首先變成了必然的共通項目。另一方面，外來的異族壓榨乃透過兩地的階級結構而進行，遂使民族壓迫和經濟剝削滙合成一複式階級關係，形成了殖民地後進社會的階級複雜性和模糊性的理由。

雖然現地社會本身的階級

分化在生產關係的弱質限制下，一時仍處在沉滯緩慢的演變過程中：最下層的工農大眾，在多層重壓下的自覺和反抗，沒落中的地主階級和不平等制約下的工商資產階級的爭權運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多條戰線上的尖兵作用等，仍然顯出了相當多采多姿的運動型態。

主要以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的雙重覺醒為特徵的殖民地運動，於是由溫和的右翼到激烈的左翼，其間顯出了一定的運動光譜。其中就有一種被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狂熱的理想主義與行動主義綜合體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出現。

當時，正值歐洲無政府主義運動在資本先進各國政府的彈壓和自第三國際的競爭壓力

下，逐漸滙入激烈派「工團主義」運動，而獲致新的活動空間的時期。在殖民地政治的苛刻現實中，自有一批不耐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乏力狀態和工農階級鬥爭的組織壓力的知識青年，逐漸和無政府主義的國際宣傳運動取得了連繫，在殖民地反帝聯合鬥爭的體制下，開始了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活動軌跡。

以下便是大約在這個年代中間的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簡單經緯。它的運動年代，大約起自一九二二年的新台灣安社，到一九三二年的台灣勞動互助社的解體，先後持續了十年。

一、新台灣安社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在東京成立的新民會，因會中包括了學生與非學生兩種不同身分的會員，在日常集合上或舉行活動之際多所不便，因此翌年由會中的學生會員另行組織了東京台灣青年會。

此時正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蘇共政權開始著手「歷史上首次的無產者建國實驗」後不久，在全球青年知識分子之間，吹遍了一股研究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的熱風。該台灣青年會自成立之始，便也以研究社會主義學理思想為其主要活動項目之一。

此外，在歐洲，一如上述，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宣傳和勞工運動也正日趨活躍。是以當年台灣留日學生們的熱烈的求知活動中，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和巴枯寧主義，一一列寧的〔我們該做甚麼〕和克魯泡特金的〔告青年書〕，是同時被奉為新的時代標幟的革命理論和實踐號召。台灣青年會因而和東京的其他青年組織，不論其為日本人組織、朝鮮人學生組織、或中國大陸留日學生團體，都取得了相當範圍的研究交流關係。

以當年一位青年會會員來說，同時和共產主義者團體與無政府主義者團體具有個人連繫，乃是極其平常的事情。而在青年會會員內部，自然也逐漸出現以思想傾向的同調而形成的小團體，這也是此類思想團體中極為常見的現象。後來

被稱為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嚆矢」的范本梁，便是在這種時代風潮背景下，自台灣留日學生的思想活動中，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發生了熱烈共鳴的一例。

范本梁與北京安社

范本梁，台灣嘉義人，自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便東渡日本，經東京青山學院（著名的英語教授學校），於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進入上智大學。在學中開始和東京的無政府主義團體發生關係，首先參加了「コスモ俱樂部」（Cosmopolitan Club，世界主義俱樂部），曾在演講會中因「不穩」（日語，意為含有煽動性）演說而受過日警的「檢束」處分。

在和無政府主義者來往的這段期間，他的理論學習進步快速。到了大正十一年的一九二二年，因憧憬當時中國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和蓬勃的學生運動，隻身前赴大陸，進北京大學哲學系為傍聽生。當時在北京的台灣留學生數有卅二名，素來受到中國學生運動影響，在一九二二年初結成了「北京台灣青年會」，發行機關雜誌，其中不乏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同情者，如關錦輝、謝清廉、謝文達等。

北京台灣青年會其時已呼應東京台灣青年會、有聲援東京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活動，一般說來，思想上屬急進者不少。他們曾經替台灣籍留學生取到進入大學正科的權利（台灣留學生因與當時中國學制有異，以前都只能取得傍聽生資格），人數雖不多，却受到北京市教育界的相當重視。如當年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務長胡適，教授李石曾、及著名文人梁啟超、前任司法總長林長民、參議員王勵齊等人，皆列名為北京台灣青年會名譽會員。

范氏在此活躍的運動環境中益發受到鼓勵，不久便參加了北京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兼世界語專家梅景九主持的「北京安社」。到了一九二四年，和許地山（時為燕京大學學生）相識，因許氏居住過台灣，兩人立意以北京台灣留學生為中心組織「新台灣安社」，向北京各界發出了宣言書。然因其時謝清廉、謝文達等人已傾向於共產主義，組織工作遭到困難，最後與北京安社合流，以其機關雜誌〔新台灣〕加入為「北京安社」的系列刊物。

爾後范氏不惜犧牲學業，多方奔走，進行「新台灣安社」的宣傳活動。直到民國十五年三月，國民軍鹿鍾麟部退出北京，張作霖奉軍入關進駐北京後，大事鎮壓學生運動，北京大學師生遭到犧牲者甚眾。范氏避難隱匿數月後，於同年七月潛離北京回台。至此，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第一聲——「新台灣安社」終告結束。

《新台灣》雜誌

有關雜誌〔新台灣〕的刊行，財務方面的困難始終無法克服。如創刊號在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出刊，却基金無以為繼。一直到同年十二月才又發行第二號。第三號改為新聞型，也是因為財務理由，在三個月後才發行。

發刊之初的中心人物，除了范氏本人外，尚有前述的關錦輝、謝清廉、林阿謨等人。印刷則和北京安社機關誌一同交由北京大學出版部負責。每號出五百份左右，密送與在北京、廈門等地台灣留學生；日本東京、京都留日學生，及島內同情者。觀其所載內容，頗能表達出當年巴枯寧主義者的狂熱信念。如第二號登載的新台灣安社實行部的宣言中，有如下一段：

「……欲維持台灣民族之生存，必須驅逐日本強盜。而欲驅逐日本強盜，除暴動革命以外別無他途……茲將我同人極力主張，特意提倡者，由本社實行部訂為該部之事務，列為五條。

(一)、暗殺台灣總督，及其餘官公吏。

(二)、暗殺日本全國性重要人物及官公吏。

(三)、暗殺特務走狗，及欺國賊民之輩。

(四)、暗殺資本家及特權階級。

(五)、破壞敵人之一切設施。

吾人必須反覆實行暗殺、暴動，以期達成台灣民衆革命之成功。」

台灣安社之革命手段

又在其第三號所載「台灣革命運動方法」中如此說：

「將日本人欺凌台灣人的慘狀訴之於大眾，使三百六十萬同胞自覺猛省；殺台灣民衆之兇敵的日本人，打破日本之強盜統治，破壞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與組織，以期實現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自由平等的新台灣，犧牲吾身以供同胞之血肉。

同胞們，不要忘記巴枯寧在里昂受審時所喚出的二事和虛無黨的一語！二事者，一腦中之思想與槍裏的子彈！一一個爆彈的炸裂勝於十萬本書籍的傳播。一語者，『目的肯定手段』」。

文中所謂「目的肯定手段」一語，亦說成「目的淨化手段」。是當年主張以暴力的激烈手段刺殺當政者，破壞國家軍政公共設施的無政府主義者的信條。也因此「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激烈主張，使他們得到了「虛無黨」的通稱。

按「虛無主義」一詞的語源出自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中，主人翁「不承認一切權力，否定所有不被證明的法則」，要求絕對的個人自由的

態度。當時的另一位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把屠格涅夫的個人絕對自由主義加以社會主義化，成為農奴解放後的巴枯寧派運動的先驅。

為了使讀者瞭解這一派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觀和社會觀的梗概，此處再抄錄《新台灣安社宣言》中的首段於後（原件中文，已無從入手。此文乃根據《警察沿革誌》中的日譯加以重翻者）。

安那其的抽象理念

「現在我們大多數台灣民衆所要求，所熱望的是甚麼呢？我們奮鬥的目標又是甚麼呢？我們敢說，那是為了幸福與和平、真理與光明、及正義與自由！

現在大多數台灣民衆，和世界其他弱小民族一樣，熱望能避免無聊，悲苦、迷信、黑暗、暴虐，和壓迫。因為無聊悲苦的生活會抹殺人生的趣味，磨滅人的天性。所以為了和平幸福，要排除無聊與悲苦。

我們為何要求真理與光明？為何排斥迷信與黑暗？那是因為迷信會阻礙人類的創造性，禁閉知能與本性；黑暗會阻礙社會的進步，破壞人文之故。因此，我們若要伸張創造性，發揮知能本性，企圖人文之發達，實現社會之進步，必須拋棄迷信就真理，突破黑暗進入光明。

我們之所以要求正義與自

由，排斥暴虐與壓迫，是因為正義的反面是暴虐，自由的反面即為壓迫之故。我們曾經遭受過無數的暴虐者的強制，無數掠奪者的威嚇壓迫，深知那是不自然而違反人生本旨的行為。因此對現在的我們，正義與自由是不可缺的中心要求，我們必須為正義與自由誓死力鬥。

然而，自從政府剝奪了我們做為人而應該享受的一切自由，資本家獨佔了我們做為人而應該享受的自然財貨，應屬自由的社會變得一片混濁。光明的世界受盡蹂躪，應屬幸福的人生陷入於獸類世界的慘酷狀況中。我們民衆受盡了強暴者的壓迫，受盡了惡毒者的盜奪，數千年來，在所謂英雄者的愚弄和所謂聖賢者的蠱惑下，經過了無寧日無趣味的歷史，直到現代。」

以上這一段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一般論抽象理念。六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然使人覺得情緒語言太多，而分析語言太少。

下面一段論及他們心目中的社會觀。

無政府主義的倫理哲學

「現在人文已開拓，科學漸昌明。現代民衆已知人之為人之價值，和人生興趣之所在。已知社會之連帶責任，已能洞察現代之所謂正義、自由、幸福、和平、真理、光明、平

等、文明，等言辭皆為虛假，目的只在於欺瞞民衆。更知一切自權自利之所以產生、姦淫誘拐之所以發生，頑固偏執之所以發生，禍起蕭牆之所以盛行，欺壓殘暴之所以不止，侵略戰爭之所以不絕，皆起自人我之別，男女之別，宗教、家庭，官民之別，國境之存在等理由。而這些莫非都是國家、政府、官僚、軍閥、貴族等強者的罪惡。是資本家、地主、工場主、銀行家、及集積貨幣的盜賊的罪科。一切都是源自權力之存在，私有財產制度之維持所帶來的必然的罪惡。我們的社會發達史，明確地指出這一事實。

在那沒有政府壓迫、沒有法律束縛、沒有家族權力、沒有資產沒有盜奪的上古社會，是人人共居，共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各盡其所能，各取其所需，擊壤而歌，鼓腹而嬉的世界。這種狀態是完全的自然法則，其間沒有掠奪，沒有欺壓，沒有殘虐、沒有支配、沒有服從、沒有命令。」

然後，又說到這種完美的自然狀態因何受到破壞：

人性觀念論的歷史觀

「然而，少數殘暴懶惰的野人出現了。逞強凌弱掠奪別人，產生了隸男奴女的惡風。至此漁獵時代的聚居被廢，變成了游牧粗農的部落制度，產

生了儲蓄及利息的觀念。懶惰野人好勇、好鬥、侮辱柔弱女子，然，逞勇好殺的男子漸受尊敬。從此開始，男女系統，父子關係漸明，開始有了遺產繼承制度，發生家族制度。人與人之間興起了階級主義，出現部族民族之對立，更發展為國家主義，民族對立變成為國家對立，於是發展到現代怪物之侵略帝國主義……」。

以上這些分析與描述並不嚴密精確。對原始共同體之破壞過程，只歸之於「殘暴懶惰的野人」，不免為過度單純的人性觀念論，並沒有深入於社會結構體的追尋。甚至溢露著幾乎是反文明的情緒。

這篇宣言相當長，不但包含了對無政府主義者所反對的帝國主義與私有財產制度的指摘攻擊，還提到他們各國革命運動的批判。如：

「現時各地所推行的運動，自由人何時能抬頭？這種中，如民族自決運動、印度、菲律賓、朝鮮的獨立運動、日本（內地）的普選運動，女子參政運動，我們台灣的民選議會請願運動等等，皆屬幼稚運動，皆非解決根本問題的運動。這些皆不過所謂之以暴易暴之運動，不過少數意存壟斷的資本家及資產階級，企圖獨佔漁翁之利的野心家，利用群眾革命心理，犧牲可憐的民衆的財貨與血淚，目的只在於自肥私囊。就如同中國之革命，其性質頗不徹底。一桀去而一紂來

國式革命，即使反覆千百回，即使可憐的民衆如何灑血淚，傾家滅親殺子，亦不可能帶來安寧之日，抬頭之餘地。

故此我們斷言，現時各地所推行之各種運動，一切政治活動，皆類同帝國主義之惡辣政策，不過填充少數人慾望，掠奪多數人福利，阻礙科學進步，而絕非帶來人類自由平等理想之運動。……

無政府主義者之理想世界

我們唯有斷然廢除一切權力、一切不自然之私有財產……以暴動清除現代之一切國家、政府、軍閥、官僚、貴族、資本家……秉持暴動無政府主義（廣義之無政府主義）輔佐勞苦的平民大眾，開始猛烈的世界大眾革命，發動猛烈的暴動社會革命。

我們要變少數人國家為多數自由人的國家。變陸海軍人的國家為農工商人自由組織之社會。變資本家橫行之社會為勞動者共有之社會。使軍人變為生產的農工商人。使少數人獨佔之私有財產變為多數人的共同財產。打破萬惡根源的家庭、廢止不自然的婚姻制度。主張自由之獨居生活、尊重各人之自由戀愛。以世界為家，主張無宗教、無迷信。改造一切不公不義、非文明、非科學、非人性的邪說。變一切為斯民之幸福，自由人之福利。」

根據這樣狂熱的破壞與改造意念，最後提出了如下的滾熱的呼籲：

台灣安社的政治呼籲

「同胞諸君！青年有志諸君！社會改革的健將，黑暗世界的良醫的志士諸君！奮起吧！奮起鬥爭的時期來臨了！看那馬克思派赤俄（指紅色俄羅斯）帶上了資本家色彩（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提出中央集權的錯誤主張，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必須斷然奮起。必須大胆以生命為賭注奮鬥！

打破一切權利、推倒一切非科學迷信！

為勞苦民衆之真正幸福與被壓迫者的真正自由而奮鬥！

我們不顧知識、經驗之微小，設立「新台灣安社」，期以糾合全台灣之義士同志，為民衆而爭，為窮人而謀，欲向我們的仇敵進攻，加以殲滅。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我們『新台灣安社』組織之旨趣。」

文末的日期是「世界語紀元卅八年二月八日」。當年的無政府主義者都以世界語正式出世的一八八七年為世界語元年。世界語紀元卅八年正是公元一九二四年，亦即民國十三年，大正十三年。

范本梁之死與台灣安社的落幕

如前述，新台灣安社在北京因資力人力的困難而在實際活動方面無甚可觀。只能說是台灣無政府主義思想運動的一個開端，一種啓發性的初期活動。

這一個運動的靈魂人物范本梁，在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潛回台灣，想把「新台灣安社」秘密在島內重建。却因其在北京時的活動情況已被督府掌握，其動態也在特高組的監視之下，遂不久而被逮捕。全島有十一處個人住所被認為和范氏運動有關聯，遭到日警的嚴重搜索和偵訊。經過初步審問（聞日警曾經用過重刑拷問）後，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罪名送檢。昭和二年年底第一審終結，翌年二月間正式宣判五年懲役。范氏據說因受刑時的內傷，沒能度過那苦役下的五年，後來病死獄中。

根據警方審訊記錄，范氏為了免使戰友們受到波及，把那些「大逆不道」的論文和檄文的責任全由其本人一肩承擔，供說登在『新台灣安社』雜誌上的文章大都由其本人利用衆多筆名撰寫。

前面的宣言文字，雖略嫌冗長，論理組織亦不夠嚴密，論究方式也不夠客觀，但為要窺知當年初創時期的台灣無政府主義者的基本觀念，及進而了解二〇年代巴枯寧主義在東方殖民地社會的思想影響的大概，應有它的史料價值。

待續

讀者來函

基於愛好《前方》的發刊，深知創辦人及好多友人，從南至北，不顧財源拮据，拋頭露面，四方奔走，出錢出力，以期達到前方發行的目的，因此使我這個老頭子，不怕貽笑大方，前後寫下二篇不倫不類的雜感，之後每期熟讀《前方》各篇文章，都是高水準的理論性的文章，使我內心十分慚愧，再也不敢存有動筆之念頭，準備再讀幾年書，以期充實自己的知識。

可是讀了第五期的編後語，發現關有「賈語村言」這個園地，也就是說：要給我們這些小商人、農民也可以說說話，使我十分高興，我們既然生存在這有階級的社會，農工小賈不待說是佔了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辦雜誌若不為這些人說話，憤憤不平之情緒都在我心中積聚不散！較具良知的專家學者文人有時也常為這些一向為社會出盡全力，而收入微薄的兄弟姐妹們說些話，特別是在欲獲得這些大多數人的選票時，才能聽到對這些下層同胞的花言巧語，可是每次的選舉落幕後，就鴉雀無聲！

這回《前方》既開拓這個園地，再度使我鼓起勇氣，並大聲呼喚，為了生存散佈於各角落的我們親愛的販夫走卒，不要自卑，不要凡事依賴他人，《前方》雜誌已為我們開闢一個園地，不要怕生硬的手，寫不出好的文章，寫不出自己

的心理話來，怕被人取笑，有什麼感觸就寫出來，自動地參與「賈語村言」這個園地的寫作陣容，使它壯大我們的聲勢。

農賈之間不被人知的事太多，受屈受冤，有苦難言的事情不勝枚舉，非實際從事這行的人們，即使你有絕佳的才華，寫出來的文章也摸不到我們這批販夫走卒及農夫的癢處！當然，關於農賈之間，有關政府施政法令之得失以及改革，這些非仰賴於同情我們的各方人士不可！

另外借此機會，我曾經回憶到過去坐牢時，那段漫長的歲月裡，許許多多寫不完的遭遇：例如數十個人擠在一間小牢房，終日汗流遍體，夜晚一到，就利用綿毯做為布帆，整夜輪流拉風，才能使疲倦不堪的肉體，困睡片刻，而且不是一月、二月，受此折磨至少都是一年以上，如果牛豬這種強壯的畜類，置於如此場面，我想牠們不到幾十天就會全部死掉。但人的生命力畢竟強於其他動物，我們竟能渡過不是人類應有的虐待！

還有帶腳鍊手銬，終年禁在獨身房，或夏天關在裡面受煎熬，而這獨身房高不及六台尺、寬只有一個人能翻身，屋上都用水泥密封，只有小得很小的小窗口，一天只分你一小半盆水，既要洗臉，又要擦身，並要洗碗筷，刷牙，一條白色毛巾，用不到三兩天，就

變成黃色，有時還要強制擠三四個人，使你們只有蹲著夜間無法睡覺，簡直是活地獄一樣！

還有帶腳鍊手銬，每天帶去強迫勞動，你猜勞動是幹什麼呢？不是耕田種地，也不是造路修橋，或者打掃清潔。是在一個小崗下，長寬不及十多公尺的小塊土地上，用鋤頭翻土，翻來翻去，小崗上站有好多彪形大漢、虎視眈眈，有時冷言冷語，故意惹你們生氣，但我們被折磨多了，知道他們不懷好意，故意要製造事端來加重罪於我們，因此大家以目示意只有極端忍耐，一任其侮辱，經過幾個月之折磨才脫離這個陷阱。

這些苦慘的經過，只是我個人遭受的一點點小事情，若要將全部的不幸遭遇寫出來，不是我的筆力所能做得到的，而且事已過廿多年，也不要為這些不幸遭遇而傷心，也不是要暴露獄方的黑暗，在這高唱民主自由，實行憲政法治喊得震天價響的目前情況下，也許現在的獄政不像從前那樣的暗無天日吧！但願有關當局，及所謂人權方面的諸君子，不要放鬆監督的責任！

為此希望《前方》負責人，再開一個《獄中拾遺》園地，給蒙難的難友，寫出他們的過去，鬆鬆氣，也許對身心有所幫助。就此罷筆。

1987 617 老五

編後語

六月的東亞有着熾熱的政治氣溫，南韓和台灣的親美反共政權都同時面對了如火如荼的人民民主抗爭，也都同樣做出了幅度不等的讓步，本期社論對於這一形勢着重提出了一個看法：人民對自己的力量要有信心，不必在所求將遂之時忽然心生疑懼——既然有力量逼使政府做出讓步的承諾，當然也有力量促使政府履行諾言。而且我們也不以為人民應以既有的一點成果為滿足，還應更加廣泛地團結起來，長期地堅持下去，繼續為一個大多數人皆能享有自由民主的台灣而奮鬥不懈。

從1937年的七七抗戰到現在，剛好經歷了半個世紀，雖然有形的戰爭已於1945年結束，但無形的戰爭却仍在各個領域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繼續着，而當年日本軍人武裝列隊，實彈荷槍所不能達到的目標——經濟掠奪，現在都在身穿西裝，手提公事包的青壯商人手上一一實現了，沒有砲聲硝煙的戰爭、沒有抵抗掙扎的征服，多麼讓人不易察覺。本期

《抗日五十週年專輯》以七篇文章從各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從日本帝國主義復活的精神和物質層面的探討，到對於戰爭結束的質疑，其中，在石塚友子的訪問裡，更可以看出，在一個高度管理化的社會中，即連反體制運動也被納入管理，而成為統治手段的一部份。

百孔千瘡的原住民問題，固然有它經濟掠奪的一面，同時也有它精神侵蝕的一面，這幾乎是一個鐵的規律：所有的外部攻擊都必定有內部瓦解的配合，從原住民問題到帝國主義問題莫不如此。吳鳳做為漢族的「民族英雄」提出來，除彰顯「教化」形象之外，也故意對照出原住民的「野蠻落後」。打擊原住民自信，使他們加速認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方式，從而達到經濟掠奪的目的。《吳鳳神話的系譜》一文，引用詳實的資料，呈現「吳鳳」故事搬運運塑造的過程。

對於「民間哲學」的討論，本期刊出在立峽的《形左實右的民間學者》一文，也是這一系列文章的第五篇。在前四篇文章中，大都偏重於「民間哲學」引伸、落實到台灣社會時，所造成的影響與弊害，比

較偏重於實用的、現實的層面。本文則直接刨挖「民間哲學」的蕪雜根源，比較屬於理論層面，但依作者之意，這也並不是什麼學術文章，而只是戰鬥文章。我們也認為，這一連串對於「民間哲學」的辯難，基本上並不是什麼學術論戰，而只是立場之爭，關於這一點，雙方應該都很清楚。

我們不同意於「民間學者」的理由之一，在於他們絕對否定統獨之辨的必要，統獨問題也許不必今天就談，也許應該理性的談，但做為一個政治問題存在，却是台灣社會的客觀事實，不只是非國民黨的兩派人要談，甚至國民黨也要談——國民黨的「言統實獨」並不可能千年萬世維持下去，為台灣謀出路豈不是台灣人應盡的義務嗎？

「民間哲學」的不統不獨、反官僚的主張，帶有濃厚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這種反對一切政權、反對一切組織結構的安那其，也並不是什麼新事物，甚至在日據下的台灣，也就有了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本期的「名詞淺釋」部份，以及兩篇「歷史與人物」，就是針對「民間學派」的無政府主義傾向而發。